

布尔塞维克

第五卷第一期

虹



布爾塞維克

第五卷
第一期

目錄

卷頭語

中央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我們的任務的決議

中國革命危機中中國共產黨的北方會議

列寧在第一次革命時代怎樣為「轉變」與反對中庸主義而鬥爭

中國的經濟和階級關係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書報評論

中國大革命史應當是這樣寫的吗？

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整

卷頭語

布爾塞維克不同讀者見面已經一年了。中國革命的發展，無疑的需要我們用一切力量來恢復我們黨的理論的指導刊物。

我們希望我們的布爾塞維克能夠在兩個月內同讀者見一次面，然而我們這樣的希望，沒有全黨同志的幫助是不能實現的。

爲馬克斯主義與列甯主義而鬥爭，是我們黨目前最中心任務之一。我們的布爾塞維克必須擔負起這一偉大的任務！

編者 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

中央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 我們的任務的決議

一 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三次「圍剿」失敗之後，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在進攻中得到了空前偉大的勝利。這一勝利是在全中國革命運動急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獲得的，這一勝利更給了全中國的革命運動以有力量的推動，使全中國的革命危機更加尖銳化。

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偉大勝利，即是中國工農民衆對於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勝利，即是中國民衆對於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最有力的回答。這一勝利，使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更形崩潰動搖。這一勝利的繼續發展，無疑的將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

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爲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爲了要使中國數萬萬勞苦民衆繼續遭到壓迫，剝削與屠殺，爲了要使中國完全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中國民衆變爲帝國主義強盜們的奴隸與順民，爲了要造成全中國更大的經濟浩劫與水旱災荒，以至爲了要造成進攻蘇聯的鞏固的後方，自然不能不更瘋狂地向着中國蘇維

埃與紅軍進行新的「圍剿」。

二 國民黨的四次「圍剿」的正式開始，依照全盤「圍剿」計劃，而開始積極行動，是在它出賣了東三省，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國聯調查團詳細「調查了」南京、漢口、平漢路與津浦路之後。在這一「圍剿」開始之前，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中間曾經有過不少的協商與談判。這一「圍剿」的組織者無疑的是世界帝國主義者。

世界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發展前面表示了絕大的恐怖。他們認為如若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現在對於如火如荼的「赤禍」在目前不加以打擊，「那一年之後，共產黨的中國將變為實際的可能。」所以他們主張「必須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他們，必須不顧一切的代價去應付他們。」（見六月十五日大美晚報評論）。爲了實現這一計劃，他們以大批的軍事顧問，大批的軍械去供給「剿赤軍」，他們願意國民黨以停付一年外債的二萬萬元，去做「剿赤」的費用。他們利用一切他們政治的、財政的、軍事的力量，動員國民黨軍閥去一致底進攻蘇區與紅軍。沒有帝國主義這些作用，國民黨的四次「圍剿」是不可能的！

爲了要更進一步表示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對於帝國主義的忠誠，與它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中的清道夫作用，爲了要取得帝國主義對於它的歡心與信任，國民黨必然要更積極的、更兇惡的向中國蘇維埃與紅軍進攻。只有繼續積極的無恥的出賣中國，向中

國反帝國主義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蘇維埃與紅軍進攻，國民黨才能得到帝國主義的擁護，維持它自己的統治。

三 爲了要用一切力量去進攻蘇區與紅軍，爲了要同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做決死的鬥爭，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現在又決定蔣介石爲「鄂豫皖勦匪總司令」，向鄂豫皖與湘鄂西兩蘇區進攻了。蔣介石的中心部隊，現在都向漢口與蚌埠輸送。胡宗南的第一師，已經開到安慶、合肥，徐庭瑤的第四師，則在蚌埠與正陽關一帶。蔣鼎文的第九師，則正在從浙江調往皖西。開到漢口的已有俞濟時的八十一師，上官雲相的四十七師，郝夢齡的五十四師，衛立煌的第十師，蔣伏生的第八十三師。同時川軍除已有三十六團外，還正在不斷的向湘鄂西開拔。總計現在雲集在鄂豫皖與湘鄂西兩蘇區周圍的軍隊有三十師以上。

在長江以南，在閩粵贛湘四省內，南京政府用盡種種方法與粵方妥協，集中兵力，向閩贛、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蘇區進攻。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南京政府會任何應欽爲「閩粵贛剿匪總司令」，陳濟棠爲副司令。在湘粵贛三省邊，何應欽已指定劉建緒爲湘軍總指揮，余漢謀爲粵軍總指揮，陳誠爲贛軍總指揮，協力向湘贛蘇區進攻。十九路軍各師已經開到閩西協同入閩粵軍向閩西蘇區進攻。第八軍的趙觀濤已被任爲「贛東北剿赤總指揮」，向贛東北蘇區進攻。總計目前敵人方面進攻閩粵贛湘的部隊

已在三十五師以上。

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爲了同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做決死的鬪爭，已經動員了它所有的中心部隊向着各個蘇區進行它的四次「圍剿」。

四 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對於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四次「圍剿」，顯然同三次「圍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國主義在這一「圍剿」中的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這已經是十分明顯的事實。廬山會議與北平會議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更進一步的出賣中國，更能得到帝國主義者的助力，去進攻蘇區與紅軍。參加作戰的軍隊，比較三次「圍剿」增加了一倍以上。粵軍、湘軍、以至西北軍（如劉鎮華、商震等軍隊）都被動員，參加戰爭。「圍剿」的範圍也愈是擴大，戰線從廣東一直到河南，從福建安徽一直到湖北四川。國民黨是更其拚命的、殘暴的、兇狠的向着蘇區與紅軍進攻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三次「圍剿」與四次「圍剿」的中間，存在着全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大風暴，擴大到十八省的水災飢荒，空前的國民經濟的浩劫，工農兵以及災民難民的鬥爭的偉大發展，尤其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和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擴大與鞏固。一切這些不能不使這一次的「圍剿」比較第三次也更爲困難了。

四次「圍剿」的最大困難，是在於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與工

農•民•衆•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

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首先表現在它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武斷宣傳範圍的縮小。自「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的真面目、與它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清道夫的作用，是更爲全中國民衆所瞭解了。國民會議、國難會議、以及國民救國會議等的把戲，已經完全宣告破產。對於救濟災民，振興實業，開發水利等等的欺騙，完全爲鐵的事實所粉碎。因此，雖是國民黨現在正在利用一切方法，散佈「發展匪區農業」，「建設匪區道路」，「改善農村經濟」，「撫綏流亡」等的欺騙宣傳，而且主張「大部分要在政治上解決共匪問題」，然而這一切很少能夠在政治上動員羣衆，去進攻蘇區與紅軍了。因爲民衆從切身的經驗中瞭解到出賣中國，造成全中國國民經濟的浩劫與水旱災荒的，完全不是「共匪」，而是國民黨的統治！

正因爲這一因原，所以許多反革命派別如像第三黨，「社會與教育派」等對於這一次的「圍剿」表示懷疑與悲觀。他們認爲「不發展匪區經濟」，不「安定匪區民生」，「匪」不但是「剿」不完，而且將愈「剿」愈多。甚至有人主張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推翻軍閥官僚的統治，建立「民衆武裝，民衆政權，以發展農村經濟。」，以根本消滅「共匪」（見第三黨民衆導報第十五期）。更有人認爲在目前「對外重於對內」，故主張「如共黨肯放棄暴動政策，一致對外，則共黨可以合法存在，紅軍可以改編爲

國軍。』（新創造第一期）。這類武斷宣傳，現在差不多在很多報章雜誌上，都經常的發表出來。他們一致的目的，是在用更聰明的方法在政治上準備進攻蘇區與紅軍，用更狡猾的方法來欺騙民衆，說破壞民生，破壞經濟，幫助帝國主義者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好這樣來維持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這些武斷宣傳，也很少能夠引起民衆的同情，因為事實證明，祇有打倒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我們才談得上經濟建設，真正能同帝國主義實行民族的革命戰爭。

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力量的削弱，其次，表現在它的財政的深刻的破產。即以南京政府每月軍政的經常費而論，即有一千二百餘萬元的不足。在「圍剿」時期，這種費用的大大增加，是毫無疑問的。即如收買十九路軍軍官，把十九路軍兵士運往福建，就須用去五千萬元。那這一費用的浩大，就可想而知了。這種收入的來源，當然除了借債之外，非拚命剝削民衆不可。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無奇不有的苛捐雜稅，正在一天一天增加。一切教育費、堤工費、賑災費等，現在都一齊搜括來，作為「勦匪」之用，甚至爲了「勦匪」更進行着鴉片公賣。

然而全中國的經濟的浩劫、與普及全中國的災荒、以及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豪紳的殘酷的剝削，使全中國的民衆大批失業破產，流離死亡。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國民黨如何敲詐剝削，然而收入的日益減少，已成爲經常的現象。而且全中國四分之一

的人口，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三千萬人口的東三省則已爲國民黨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那裏海關一項的收入，每年就有四千萬元。國民黨財政的毫無出路，已是再明顯沒有的事了。國民黨一切「開源節流」的辦法，只會增加廣大民衆的新的負擔，和他們對於國民黨的憤恨與反抗。

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力量的削弱，第三，表現在國民黨武裝力量的潰崩動搖。因爲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影響，因爲他們本身生活的痛苦，在國民黨軍隊中經常發生士兵反抗官長，要關餉，要清算伙食賬，要改良待遇的鬥爭，大批的譁變投入紅軍的事，已經變成非常普遍的現象，尤其在隣近蘇區的白軍中。工農紅軍在國民黨士兵中有着絕大的影響，他們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同情，是正在增長着。更大規模的兵變潮流還在前面。在國民黨調動的七十萬士兵中間，真能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肯捨着性命，同紅軍作戰的，當然是少數。

最後，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還表現在地主資產階級內部的渙散與衝突。雖是蘇維埃與紅軍的發展，使地主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一致的團結起來，向蘇維埃與紅軍進攻，使他們內部不能發生大規模的軍閥戰爭，而且常常在加緊進攻蘇區與紅軍中來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然而，他們內部的衝突與矛盾還是存在着。在蘇維埃革命怒潮前面他們表示了惶張失措。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他們能夠戰勝工農紅軍與

消滅蘇維埃運動。孫連仲、李鳴鐘、陳調元等部隊的覆滅，已經給了一切「勦赤軍閥」以最大的教訓。他們在「勦匪」中都想犧牲別人，以保存自己的實力。他們內部的指揮，是不統一的。這次蔣介石底出動武漢，並沒有引起各方的擁護，而且寧粵的衝突，正在新的方式中開展起來。

五 然而這次「圍剿」的最大困難，是在於工農民衆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首先是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擴大與鞏固。

自從三次「圍剿」之後，閩贛蘇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與鞏固。贛南的上猶、崇義、南康、信豐，福建的甯化、清流、上杭、武平、龍巖，都加入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版圖。紅軍在作戰中間，擴大了一倍的數量，補充了一三軍團，創造了新的五軍團。在漳州的佔領中間，擊潰了張貞的六團與陳國輝的三團，在軍火上、給養上都得到了極大的補充。

鄂豫皖的紅四軍對於敵人在「九一八」之後所佈置的「圍剿」採取了積極的進攻策略，在鄂東方面，佔領了黃安城，消滅了六十九師趙冠英全部，擊崩了李鳴鐘、蕭之楚、夏斗寅各師。在豫南方面，佔領了商城、固始、潢川等縣，消滅了白軍第二師，擊潰敵人五六師之衆。六安、霍山、霍邱、正陽關的佔領中，把陳調元、岳盛宣、王均等主力，完全消滅。最近在豫南方面又消滅了鄧子舉的新二十師與張鈞的全部。第

四軍已擴大爲四方面軍，人數亦有一倍以上的增加。鄂豫皖蘇區已完全打成一片，得到了絕大的擴大與鞏固。

其他在湘鄂西、在湘贛、在贛東北等蘇維埃與紅軍都有很大的發展與鞏固。紅二軍在鄂中天門、京山、應城一帶，曾經消滅了徐源泉的一旅，肅之楚的一部，繳得了敵人機關槍二十餘架，步槍千餘枝。在六月初，在潛江一帶更擊潰了川軍張邦本、郭勛兩旅，范紹增師全部，奪獲步槍二千五百枝，機關槍三十八架，迫擊砲十五門。

英勇的工農紅軍在與敵人長期的作戰中間，在擊破了帝國主義國民黨三次「圍剿」之後，已經得到了豐富的戰鬥經驗，走上了鐵軍的道路。在各蘇區內，一般的都正確的解決了土地問題，肅清了A B團、改組派與社會民主黨等的反革命，轉變了蘇維埃與紅軍中的工作。加強了無產階級在蘇維埃與紅軍中的領導。黨在羣衆中的權威與信仰是大大的提高了。羣衆對於自己的力量，是更其堅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更給了各蘇區以總的政治上與軍事上的領導。

同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作戰的紅軍，已經不只是江西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紅軍。還有成千成萬的赤衛隊、少先隊、與童子團都加入了戰爭。戰爭的區域，已經不單是江西，而是福建、廣東、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作戰的區域，已經不在蘇區舊的根據地，而在新的蘇區了。紅軍的行動，比較從前更有集中的領導，更能互相呼

應地向敵人進攻！

在全中國的民衆中間，蘇維埃與紅軍的權威，民衆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信仰與擁護是大大的提高了。黨所領導的擁護紅軍勝利的運動，在羣衆中、尤其是工人羣衆中已經得到熱烈的反響。大批的工人，要求到蘇區去，參加革命戰爭。千千萬萬的工農勞苦羣衆很快的瞭解到蘇維埃與紅軍是全中國民衆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蘇維埃政權是他們從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鐵蹄之下解放出來的唯一道路。

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四次「圍剿」中的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同三次「圍剿」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們的力量已經有了百倍的增加。

六 在非蘇區內，反日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進到了更高的階段。這一鬥爭，現在已經不再是對國民黨政府的請願，不再是以學生爲中堅的罷課與示威，而已經是工人的罷工與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進行了。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正在東三省很大的開展起來，這一反日戰爭，當然同時也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與反國民黨的戰爭。

工人階級的罷工、怠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與反對中外資本家的鬥爭正在全中國開展着。鬥爭從輕工業一直擴大到市政、兵工廠、輪船、鐵路與鑛山，從一廠的擴大到幾廠的以至一業的同盟罷工。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是大大的提高了。農民

災民的鬥爭，從抗租抗稅，分糧搶糧，一直到同國民黨軍警與民團的武裝衝突。兵士的鬥爭與譁變的潮流正在加速度的開始。這些鬥爭正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領導之下，發展到游擊戰爭與新的蘇區的創造。陝甘邊蘇區與紅二十六軍的創造，燃燒起了北方蘇維埃的火把！

革命危機在全中國是存在着。在這一革命危機中，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蘇區的擴大與鞏固是在中國共產黨唯一領導之下而成功的。蘇維埃區域內將近一萬萬的工農羣衆，相信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熱烈的擁護着中國共產黨。即在非蘇區內，廣大的羣衆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從切身的經驗中瞭解到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正確，而同情共產黨，擁護共產黨，要求共產黨的領導。

爲全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鬥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雖是在帝國主義國民黨一致壓迫與屠殺的白色恐怖之下進行着堅苦工作，雖是爲一切反革命派別所造謠誣蔑，然而牠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在執行共產國際正確的路線之下，已經大大的擴大與提高了。這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得到勝利的唯一的保障。

全中國洶湧着革命的怒濤，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衝擊着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治底最後的堡壘。這一怒濤，同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發展互相呼應着，從這一怒濤中正在湧現出新的蘇維埃區域！

七 清楚的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之後，我們可以斷定我們不但能夠粉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四次「圍剿」，而且將從新的勝利中取得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我們必須最嚴厲的打擊那些在帝國主義國民黨這一「圍剿」前面，表示惶張失措的，那些無氣節的，對於革命力量沒有信心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機會主義的動搖。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與忽視這一「圍剿」的特殊意義，以為這不過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照例的進攻，以為蘇維埃與紅軍照例可以得到勝利，而不去動員一切力量去反對這一「圍剿」的「左」的機會主義傾向做鬥爭。

我們必須最明確的看到 同帝國主義直接的武裝衝突的階段是在我們的前面。在我們的前面放着最偉大的歷史任務，打倒帝國主義的任務！

國民黨這一次的失敗，必然會使帝國主義者不再相信國民黨有征服「赤禍」的能力，必然會親自出馬，動員它所有的一切海陸軍同蘇維埃與紅軍作戰。帝國主義者在目前已經調動了大批的軍艦與陸戰隊在中國沿海與沿江各口岸，準備着直接的武裝干涉。這種干涉在東三省是早已開始，在其他的區域是同樣會來的。回想到紅軍佔領漳州時，帝國主義軍艦集中於廈門海口的就有三十多艘，那就可知道，帝國主義這些大砲機槍是向着誰瞄準的了。

當然對於帝國主義直接武裝干涉的力量，我們也不能有過份的估計。全世界的資

本主義現在是在普遍的經濟恐慌中間，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有着極大的發展。在西班牙、在智利、已經存在着革命的危機。在德國，波蘭等國家內，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正在成熟着。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與它對於反帝國主義的組織與領導作用的加強，將不能使帝國主義直接武裝干涉中國不遇到極大的困難。而且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還是絲毫的找不到解決與出路。

我們堅決的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的軍械雖不及帝國主義，然而我們有的是廣大的千千萬萬的民衆，這些民衆將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爲了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進行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在長期的艱苦的反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將是勝利者。

但是，無疑的，世界帝國主義是我們更有力的，更兇暴的敵人。要戰勝這一敵人，我們必須要有最大限度的努力與犧牲的決心，而且只有戰勝這一敵人，我們才能創造出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蘇維埃的中國！

八 爲了要粉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四次「圍剿」，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爲了準備同帝國主義直接武裝的衝突與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央認爲在蘇區與非蘇區的黨必須執行下列的戰鬥任務：

一、蘇區的黨必須立刻動員廣大的羣衆，召集羣衆大會與示威游行，解釋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的意義，提出「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一寸蘇區的土地不被國民黨軍隊蹂躪」，「保衛蘇維埃根據地」，「爭取聯系一片的蘇區」，「爭取中國革命在湘鄂贛等省的首先勝利」，「打倒出賣中國、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干涉中國革命」，「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滾出中國去」等口號。號召廣大的工農羣衆加入紅軍、赤衛隊、運輸隊、交通隊、担架隊等，參加大規模的革命戰爭。動員一切力量，來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

二、必須向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消滅敵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擊潰敵人的「圍剿」計劃。各蘇區的紅軍必須更有計劃的互相呼應，互相配合，堅決執行中央最近軍事計劃，以造成佔領南昌與包圍武漢的形勢。但絕對不能以進攻策略，解釋爲軍事的冒險，或不顧一切的拚命主義。

三、盡量擴大與鞏固紅軍，中央區除完成預定計劃外，擴大三分之一。鄂豫皖二分之一，湘鄂西三分之一。湘鄂贛十六軍，贛東北第十軍，必須編足兩師。湘贛二十一軍編足三師。閩西十二軍與贛南二十二軍，必須充實起來。盡量吸收雇農與工人加入紅軍，加強紅軍中工人階級的骨幹，並提高紅軍士兵的政治水平。紅軍優待條例，必須無條件的執行。各軍必須開始城市戰、堡壘與射擊飛機的演習。必須最大

限度的發展地方武裝，有計劃的進行蘇區周圍的遊擊戰爭，以保護蘇區根據地，擾亂敵人移方，擴大蘇區。

四、堅決的轉變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吸收廣大的工農羣衆參加蘇維埃工作，具體的切實的幫助當地民衆解決他們的切身問題，舉行秋耕與秋收運動，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同官僚主義做堅決的鬥爭。建立蘇維埃各委員會的工作。必須徵收土地累進稅與營業稅，統一蘇維埃的財政。堅決實現勞動法，改善工人生活。用一切方法保證蘇維埃中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各蘇區應互派代表交換蘇維埃建設的經驗。

五、更堅決的廣泛的動員羣衆進行反日反帝擁護蘇聯的工作。必須清楚的瞭解到蘇維埃政權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領導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領導者。現在立刻應該準備「八一」工作，更響亮的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武裝保衛中國」，「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必須清楚的告訴羣衆，同帝國主義直接武裝衝突的接近與到來。反帝同盟與蘇聯之友的組織，必須更廣泛的深入羣衆。在「八一」應該舉行盛大的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擁護蘇聯的羣衆大會與示威遊行，舉行各蘇區的反帝同盟與「蘇聯之友」等的代表大會。

蘇維埃不但是蘇區工農革命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且也是非蘇區革命運動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因此各蘇區的黨必須有計劃的選派黨員團員到環繞蘇區周圍的白色區域，

首先就是武漢、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平漢路、南潯路、武長路、株萍路等工人災民與士兵中去建立工作，加緊白色區域工作幹部的訓練，與加強對於已有組織的領導。

在蘇區根據地的周圍，必須創造許多游擊的區域，並加強對於已有游擊隊的領導。對於白軍士兵的工作，應該更有計劃的來進行。

六、非蘇區的黨必須立刻開始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宣傳國民黨在這裏為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清道夫作用，更具體的宣傳蘇維埃與紅軍是唯一反帝國主義的政權與武裝力量。號召羣衆的罷工、關車、飛行集會、車間會議、羣衆大會與示威游行，反對四次「圍剿」。利用蘇維埃與紅軍在羣衆中的深刻影響，組織羣衆對於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積極性。更廣泛的擴大「紅軍之友」，吸收積極的工人分子進去工作。募捐徵調等工作，必須變為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政治運動，應該抓住國民黨借債、取消教育經費、水利賑災費、加捐加稅、鴉片公賣等具體事實組織工人、失業工人、學生、災民難民、城市貧民與鄉村農民反國民黨的鬥爭，把這些鬥爭同反對四次「圍剿」密切的聯繫起來。

七、發動組織與領導洶湧澎湃的罷工浪潮，準備與組織一業的同盟罷工。轉變赤色工會的工作，建立幾個真正有羣衆基礎的產業工會，首先是紗總、海總、鐵總、礦總、市總、五金總。在郵務工會、報界工會、出版業工會中建立革命反對派。真正開

始失業工人的工作。特別注意鐵路、輪船與兵工廠的工作，尤其是在平漢、津浦、滬杭、滬甯、與運兵輪船上的工作。全總海總黨團應該更具體的佈置這些工作。應該有計劃的在那些地方進行破壞。

八、更大規模的有計劃的來進行白軍士兵中的工作，尤其是蔣介石陳濟棠的中心部隊，與十九路軍。領導士兵爲關餉、要求改良待遇等的日常鬥爭，準備有計劃的革命兵變。發展與領導各省的農民災民運動，發展遊擊戰爭，配合譁變士兵，澈底執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蘇維埃區域，來牽制國民黨的軍隊與分散敵人進攻中心蘇區的力量。陝甘省委與江蘇省委，應特別加緊在陝甘遊擊隊與徐海蚌遊擊隊中的工作，採取建立新蘇區的路線。

九、更應千百倍地加緊反日反帝瓜分中國與進攻蘇聯的工作。更具體的依照中央關於「八一反帝戰爭日」的決議，去佈置工作。各地黨、尤其是河北與滿洲的黨，應該動員大批的幹部到東北義勇軍中去，奪取反日戰爭的領導，把這一戰爭同土地革命匯合起來。

十、應該特別加緊揭破反革命派別的欺騙宣傳，指出一切他們的「和平建設消滅共匪」的理論，以及「非戰運動」實際上都是進攻蘇維埃與紅軍，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又一辦法，指出祇有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之後，才能和平建設，才沒有戰爭，祇有革

命的戰爭才能消滅反革命的戰爭。一切這些反革命派別都是國民黨的後備隊與國民黨統治的擁護者。

要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就必須有堅固的、羣衆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必須明顯的看到黨的組織力量遠落在黨的政治影響之後，黨的一切工作遠遠落在革命發展之後。各地的黨必須更廣大的做徵收黨員運動，提出「成千成萬的工人羣衆加入共產黨、回答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爲增加一倍黨員而鬥爭」等口號。必須更澈底的轉變支部工作，黨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提拔新的工人幹部到指導機關中來。加緊對於新黨員的教育，幫助團的工作的建立與轉變、與它的衝鋒季工作計劃的完成。

更無情的打擊對於目前形勢估計不足、與「北方落後論」，對於革命沒有信心、以及消極怠工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的空談，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使這一鬥爭深入到支部中去。必須重複的說，堅固的、羣衆的、布爾塞維克的黨，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唯一保障。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國革命危機中中國共產黨的北方會議

陳文

一

北方會議在全國革命危機的增長中，帝國主義瘋狂般的向蘇聯極露骨的進攻中，國民黨四次向紅軍蘇維埃「圍剿」中，全國極端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召集了，并且順利的完成與結束了。

北方會議是經過了四天的會議，極熱烈極緊張的討論了，政治問題，職工運動，士兵與農民游擊戰爭的幾個重要議程，在中央作了有系統的對於蘇區建設的報告，而結束會議的討論。在會議中通過了「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開展北方游擊運動創造新蘇區」三個重要的決議。會議後并組織各省工作委員會，更具體的討論和佈置各省工作。北方幾個主要省份的省委，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北方會議是勝利的完成了，北方會議的召集與成功，這是更加加速中國革命運動有力的開展與爭取中國革命勝利地完成的速度。

北方會議正確的估計到目前國外國內的政治形勢，指出由於世界經濟恐慌空前的深刻化，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在極端尖銳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個世界的對立，已經決定兩個世界勝利的誰屬——勝利是屬於社會主義的了——因為勝利的社會主義的空前成功，自然更加强在世界革命危機的增長與成熟下的革命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擁護蘇聯，推翻反動統治的鬥爭，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着，高漲着，要求民族解放，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在一切殖民地國家鬥爭着發展着，蘇聯鞏固的存在，成爲爆發革命的火山，成爲革命領導的燈塔，這就不能不使兩個世界空前尖銳的對立，反蘇聯戰爭危險的空前增長，成爲目前國際關係最中心的核心。（不論國際帝國主義間任何協定與同盟，不論軍縮會議一直到洛桑會議，雖然包含着帝國主義相互間極端緊張的矛盾，但主要的中心爲的在相互矛盾中求得對蘇聯進攻的一致，帝國主義者不僅在西方戰線上積極的向蘇聯進攻，同時在東方以日本爲先鋒在滿州造成的事變與事變後組織屯田軍，組織白俄，建立兵工廠與飛機場，成千累萬的軍隊向蘇聯邊境進迫，同樣都是帝國主義一致的反蘇聯戰爭的行動）。在國內由於國民黨統治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總崩潰的浩劫，由於紅軍蘇維埃鞏固發展的勝利，更燃燒起全國「絕不能再照

『舊生活下去』的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從自己爭鬥的經驗中，認識蘇維埃的旗幟，才是真正能從飢寒死亡失業失地痛苦中解救出來的唯一革命的道路；已經統治着全國四分之一的區域與人口的中央蘇維埃政府已成爲全國革命運動中唯一領導者與組織者。在全國革命危機的面前，蘇維埃區域的更加勝利的鞏固與擴大，紅軍的更加壯大與堅強，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澈底的執行與領導，蘇維埃政府法令的實行與威信的提高，特別共產黨正確路線的領導，使蘇維埃政權與紅軍，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就不能不使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與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銳利的對立，成爲目前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特點。然而正因爲蘇維埃政權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就決定了經濟總浩劫與『不能再照舊統治下去』的國民黨的統治必趨於死亡，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半殖民地的統治更加劇激的崩潰。在兩個政權對立中，蘇維埃政權成爲全國革命危機增長最主要的標誌，目前政治生活的中心。因此不能不引導帝國主義國民黨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別對於國內革命運動尤其對於紅軍蘇維埃的反對與更殘酷的四次進攻——各派軍閥不分省界向每個蘇區作四次猛烈的進攻，帝國主義在財政上以致軍事技術上都積極的幫助與指導，成爲最中心的任務，而與反蘇聯戰爭的任務不可分離的聯系着。

然而革命危機在國外的增長與成熟，兩個世界尖銳的對立，中國革命危機的存在與兩個政權嚴重的對抗，在世界上決定了勝利是屬社會主義的世界，在中國階級力量對比

的變動，優勢是在於工農方面的了。

北方會議在整個革命形勢的正確估量之下，嚴重的揭發和指斥在全國革命危機下，北方黨內所謂「北方落後論」的危險與錯誤，指出「北方落後論」的機會主義的實質。

在四中全会後黨內澈底的揭發和反對立三路線對於革命發展錯誤的理論後，北方黨內却在另一極端，發展着曲解着正確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論為北方革命的落後與消沉。如山東黨以為山東是全國革命最落後的地方，陝西黨當着游擊戰爭急激的開展中，却以為羣衆還沒有為土地革命而鬥爭的勇氣，河北黨在廣大羣衆狂熱的作反帝和反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的示威以至與軍警肉搏的鬥爭中，還認為北方反帝是落後於南方的，某些地方羣衆已經為着土地革命的要求而鬥爭時，但仍以為須候各地革命平衡起來後，才能真正的進行土地革命，河南黨在工人自動的組織反日敢死隊，巨萬羣衆自動的作抗日抵貨示威的行動中，反認為河南羣衆反帝鬥爭是消沉的，滿州河北黨對於成千成萬的工農勞苦羣衆與日本帝國主義英勇的作革命的民族戰爭中，却以為這是綠林豪客，或者以為這是國民黨所領導，而置之不問。所有這些都是由於在「北方落後論」的觀點上，去否認革命危機在北方的存在，不相信北方革命運動的高漲，企圖將中國的南部與北方劃成萬里長城的間隔和對立，而將北方放到革命危機在全國存在着的事實以外去。

然而革命的風暴，在中國北方是突飛猛進的發展着。工人罷工的鬥爭，在北方工

人運動洶湧高漲的浪潮中，成爲工人鬥爭的主要武器，在河北有唐山五礦的同盟罷工，天津的北洋地氈，紗廠，市政工人的罷工，在滿州，安東絲廠三次的同盟罷工，兵工廠工人有準備奪取武裝的鬥爭，哈爾濱烟廠，印刷，棉織廠，奉天烟廠紗廠，以及北甯路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在山東大康，四方機廠，富士餘來，烟台繭廠，棗莊礦工工人都捲入到罷工的怒潮中，在河南，京漢路十二個車頭的同盟罷工，孝義兵工廠全部工人的罷工鬥爭，在陝西兵工廠工人的鬥爭，以至北方各地郵務工人的罷工，所有這些，很明顯的表現出北方工人以自己的團結與銳利的武器來答覆資本家的壓迫與進攻，鬥爭是頑強與堅持，反攻是佔着絕大的優勢，而且差不多所有經濟的鬥爭，很快發展成爲政治的鬥爭：唐山五礦工人的捆毆黃色委員，滿州兵工廠工人準備奪取武裝去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屠殺與國民黨軍閥可恥的投降，奉天烟廠，奉山路奉海路工人，包圍警署與軍警肉搏而奪回自己的領袖，奉山路工人在鬥爭中粉碎了黃色工會的面具，河南兵工廠工人以手榴彈與國民黨警衛隊肉搏，打廠長，打走狗去爭取自己的勝利，十二個火車頭的罷工，反抗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壓迫。北方反帝鬥爭的展開，工人更成爲鬥爭中最主要領導的骨幹：河南六河溝礦山工人領導收回日本礦山的鬥爭，開封紗廠工人自動組織反日敢死隊；滿州穆林礦山工人與奉山奉海路工人領導成千成萬的羣衆參加反日的革命民族戰爭，吉海路工人毀壞鐵路打擊日人對義勇軍的進攻，呼海路工人犧牲自己性命反抗國民

黨軍官的退却，河北唐山，山東，青島，濟南的工人反日反國民黨情緒的緊張，山西太原工人一天同盟罷工的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這是說明工人對政治鬭爭的積極性與階級覺悟性的極大的提高。工人鬥爭的蓬勃開展，成爲北方革命運動最有力的標誌。

與工人鬭爭配合着的革命風暴，便是北方農民災民鬥爭的廣大發展，士兵譁變潮流的蓬勃高漲。在滿州自延吉，汪清，暉春，磐石……各縣成千累萬的農民羣衆的抗租抗債分糧吃大戶的鬥爭，莊河，賓縣，海城，南滿的廣大農民的抗捐抗稅，驅逐縣長，包圍縣署，武裝騷動的鬥爭，一直到幾乎滿州許多區域的全部農民英勇的參加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在陝西的蒲城，三原，耀縣的農民包圍縣城，火燒城門，攻破縣城，富平，韓城的農民奪取公安局的槍枝，武裝自己，四次圍攻縣城，與統治階級作殘酷的肉搏，自抗捐抗稅的鬥爭，以至山陽農民自動打起紅軍的旗幟，一直發展到黨所領導的陝甘蘇區的建立。在山東的圪水，博田，青州，壽光，女姑口……等處農民，殺豪紳，攻縣城，抗租抗債抗捐抗稅到處的爆發，河南的礦山，一月有三十六次分糧的鬥爭，濟原等縣農民游擊戰爭的發動，此外紅槍會黑槍會大刀會等等農民組織普遍着北方，這些組織，雖大部在地主豪紳的領導之下，但廣泛的包括破產失地的農民。農民鬥爭在廣大範圍內開展着，震撼了整個北方的統治。士兵的兵變，無論在閻系和馮系，張學良與韓復榘的部隊中，都在醞釀或經常的爆發，陝西一個月七八次的兵變，河南

士兵的經常譁變，特別滿州的白軍幾乎全部投到義勇軍中去進行反日的戰爭，士兵以槍口對長官開放，而公開的找共產黨領導（如山西陝西），到處找紅軍（如陝西的士兵），熱烈的祈求投到紅軍中去。一團一營一連的大批兵變（如滿州陝西），成爲北方白軍中一巨大的一個潮流。

此外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左傾，特別學生鬥爭在北方的洶湧，罷課示威，反對國民黨黨化教育，反對壓迫言論集會自由，反對增加學費等鬥爭，經常走到與軍警的搏擊，（如北平，陝西，山東）。城市貧民的反捐稅的鬥爭，同樣經常在爆發着。

洶湧澎湃的鬥爭怒潮，完全答覆了『北方落後論』的胡說。北方落後論者，是沒有去了解或不願去了解由於北方軍閥長期的壓榨，與不斷的混戰，地主資本家極殘酷的剝削，帝國主義強烈侵略之下所造成的延長到四五年，擴大到北方所有各省的水災與旱荒。在災荒後軍閥地主資本家極端野蠻的榨取，不能不使農村經濟空前的崩潰，工商業激劇的破產，在全國經濟總崩潰的浩劫中，工農生活極端的惡化，失業失地飢寒死亡的慘痛，走到不能再生生活下去的絕地。特別在九一八事變中，在帝國主義轟炸與砲擊下，無數千萬的羣衆，完全走到死亡的絕境，然而國民黨爲着執行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的命令，不僅完全出賣滿州給帝國主義作東方進攻蘇聯的軍事根據地，並且担任由西北進攻蘇聯的任務；同時爲着要保持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與順利瓜分，就不能不向紅軍蘇

區作四次的進攻，因此北方不僅成爲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後防與戰場，同時亦爲國民黨進攻蘇區紅軍榨取『剿匪』財源的一個場所，而更加重北方工農勞苦羣衆的剝削。這不能不喚起北方羣衆的憤怒，反抗與鬥爭的決心，特別由於蘇維埃紅軍的勝利，蘇區工農生活的改良事實，以及陝甘新蘇區的建立更加提高羣衆堅決鬥爭的勇氣與信念。北方羣衆對於蘇區紅軍的熱烈，是普遍的深入，探詢紅軍蘇區的消息，找到到紅軍中去，在工廠農村兵營中都存在着。同時因爲北方直接接壤於蘇聯，蘇聯工人生活的優越，甚至北方工人本身直接的享受（如滿州中東路工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廣大的傳播，蘇聯的威信與信仰，大大的在北方工人中提高，尤其日本帝國主義在滿州的血洗，天津的騷動和轟擊，青島的暴行，工農勞苦羣衆在自己的經驗中認識了蘇聯國家的真實，而熱烈的對蘇聯的擁護，而更增高反帝鬥爭的怒燄。

由於全國經濟的總浩劫，由於工農羣衆生活的惡化，要求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以及由於反動統治階級的崩潰動搖，不能不使革命危機在北方同樣的增長着不能不使革命鬥爭如疾風暴雨般的向前發展。北方落後於南方的胡說，不能不完全暴露其機會主義的實質。

北方會議無情的打擊北方落後論的謊謬，指出北方落後論是企圖否認革命危機在北方的存在，而掩蓋其工作中機會主義的消極，這是在革命發展中最有害和危險的觀點。

會議中一致的接受，并揭發過去黨在鬥爭領導中由於北方落後論所造成的消極怠工，脫離羣衆，以及黨的工作遠遠落在革命形勢發展之後的危險。北方落後論的揭發和糾正，這是轉變北方黨的工作極有力的因素與關鍵。

然而在這裏必須提到當着北方落後論受着無情打擊後，在會議中少數的同志，又在多方面提出所謂「北方特殊論」以爲革命危機的增長，固然同樣在北方存在着，但是北方與南方有許多「特殊」的問題，如滿州代表以爲滿州羣衆的鬥爭，很密切的與反日反國民黨反新國家的聯系，這是特殊的，滿州所處的地位，與他省不同，這是特殊的，陝西代表以爲中央提出的政治決議草案，太一般了，缺少對北方的特殊性，因爲北方是有他特殊的。這種北方特殊論的實質，當然祇是北方落後論另一變相的觀點，同樣的企圖將北方與南方分開與對立，企圖證明北方與南方是有許多例外的不同。事實上各省在鬥爭中工作中雖有其某些特點，但這與整個革命形勢是不能分離的，與黨的總任務是不能對立的。雖然北方還沒有如南方已有廣大的蘇區與紅軍的存在，表現南北的不同，然而這不是「特殊」，這是由於北方黨的領導的「落後」，祇要黨能堅決的去開展和領導羣衆的鬥爭，北方蘇區的創造，已經是具備了極優越的條件的。尤其陝甘蘇區的創造與建立，事實上完全證明這一估量的正確。在全國革命危機的面前，抓緊和發展正在蓬勃的革命運動去創造和爭取蘇維埃政權在北方的勝利，這是北方黨最中心的任務。

很顯然的北方特殊論必須同樣受到無情的打擊，才能肅清北方落後或北方特殊等等機會主義的觀點。

三

革命危機在全國存在着。客觀條件對於黨的工作，是極順利的。革命的風暴存在於北方黨的面前，爆發大風暴的鎖鑰，是掌握在北方黨的手裏，只有黨的積極性堅定性的活躍與發展，才能決定和加緊革命大風暴的爆發的程度與速度。

北方會議估量到北方黨在四中全會後的工作，認為在中央正確的路線的領導之下，黨的工作是獲得了一些成績的；雖然這些成績，是遠遠落在革命形勢發展之後，不能滿意的而且非常不夠的。然而必須估計到北方黨在四中全會後所處的極困難的環境：黨內立三路線、陳獨秀機會主義、羅章龍右派對黨路線的反抗，以至幫助敵人破壞黨的組織（如滿洲、河北），托陳取消派公開的告密（如河北、山東），隱藏在黨內的改組派進行破壞黨的領導與組織（如河南），敵人利用黨的叛徒向黨作殘酷的進攻（如陝西、河北、山東、河南），使北方各省黨的領導機關沒有一省不遭受到破壞，甚至經常遭遇到連綿不斷的破壞與犧牲，然而這樣極困難的環境，北方各省黨都在百折不撓的為黨的路線而鬥爭，艱苦的英勇的在白色恐怖中恢復黨的工作，領導羣衆的鬥爭，而獲得了各

省黨以下的工作成績：

一、陝西黨英勇的堅決的創造了陝甘新蘇區與第二十六軍紅軍的建立；發動與領導梅邑、三原、蒲城、富平等處的農民鬥爭，組織和武裝了農民，領導了反帝和反國民黨的鬥爭（如有名的「二六」事件）；

二、河北黨在不少次數的破壞中恢復并發展了黨的組織，唐山黨的工作與赤色工會組織的恢復與建立，領導了北平廣大羣衆的示威，建立了反帝同盟，組織了唐山五礦的同盟罷工，更加推動羣衆鬪爭有力的發展，

三、山東黨在新近加強了青島、濟南以及重要產業中的工人工作，領導了工人的罷工鬥爭與開展反帝鬥爭，發展擴大了黨的組織，并相當建立了幾個產業工人的支部；

四、河南黨領導了孝義兵工廠的罷工鬥爭，發動濟原等縣的農民游擊運動，黨在組織上開始注意對於反革命派別的鬥爭；將隱藏在黨內的改組派的重要份子肅清出黨的領導機關以外去；

五、滿洲黨雖在機會主義的領導下，黨的工作是很少的成績，但個別的黨員却英勇的參加到東北義勇軍中去領導革命的民族戰爭。

但是，北方會議上嚴重的指出北方黨在四中全會後黨的工作是犯了很多嚴重的錯誤與缺點：

一、首先在蓬勃高漲的反帝鬥爭中，各省黨是犯了左的關門主義的錯誤的。如滿洲黨最初一階段中，只提打倒帝國主義而不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以表示黨與一切反革命派別的不同，陝西黨反帝不反日，河南黨滿洲黨「根本沒有抓住這一反帝鬥爭，作為動員廣大羣衆參加鬥爭，爭取廣大羣衆到我們領導之下來的黨的中心任務。」特別是滿洲對於廣大羣衆都捲人在反帝戰爭的浪潮中，但黨對於反帝的革命民族戰爭的領導，還依然採取左傾的空談，右傾的消極，甚至以為義勇軍是土匪鬍子，或者以為是國民黨的領導（？）而根本置之不問不理，或者企圖去說服國民黨軍官去爭取反帝的領導，以為爭取士兵羣衆是狹隘的路線。在另一方面，則又表現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的投降，如滿洲有些黨的同志，領導羣衆去受國民黨軍官的領導。陝西有的黨部（如蒲城）所領導的反日會，提出『政府不出兵我們不出錢』的條件與口號，或者以為反帝工作是各階級合作的事業（如三原），河南黨要求資本家罷市打倒帝國主義，這些左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沒有堅定的在黨的正確立場上深入到羣衆中去領導反帝鬥爭，沒有澈底注意到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在反帝鬥爭中的實行，更大的去開展反帝鬥爭，特別缺少將黨的立場去揭露反革命派別的面目，沒有在反帝怒潮的高漲中廣泛的建立反帝的組織，爭取反帝鬥爭在黨的全部領導之下來。特別北方各省黨對於動員援助東北義勇軍的革命民族戰爭的工作，非常落後與忽視。

二、反蘇聯戰爭估計的不足，嚴重的表現對於擁護蘇聯工作的消極，如山東黨對於九一八事變的分析，以爲這是日本對南京政府的宣戰，河南黨以爲九一八事變是對蘇聯的進攻與瓜分中國的分析是錯誤的，在這種觀點下，北方黨在武裝擁護蘇聯的宣傳與實際鬥爭的動員，一般的是極端的忽視（特別是滿洲黨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工作）的，黨在組織上很少在羣衆中動員反對反蘇聯戰爭的運動與組織「蘇聯之友」等等具體組織的工作。

三、因爲北方落後論或者北方特殊論的觀點，不能不使北方黨對於擁護紅軍蘇維埃的工作不容許的缺乏。擁護紅軍蘇維埃只是南方黨的任務，或者在北方只是宣傳的口號的觀點，在北方黨是一般的存在着，因此直接接壤於鄂豫皖蘇區的河南的黨，在敵人一次二次三次的圍剿中，沒有任何具體工作的佈置，甚至始終沒有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鄂豫皖蘇區的口號。雖然在北方廣大羣衆中自動的表現對紅軍蘇區的擁護（如陝西農民打起紅軍的旗幟，河南農民變賣田屋自動組織蘇區參觀團；提出加入紅軍是門，加入共產黨是路的口號），但黨對於如何去發動擁護紅軍蘇區的運動，在羣衆中廣泛的組織「紅軍之友」，組織「蘇區參觀團」，動員募捐幫助紅軍，徵調工人農民到紅軍中去的工作，是非常缺乏忽視的。

四、因爲北方黨對於革命形勢估計的不足，因此許多黨部對於組織和領導羣衆的鬥

爭，表現消極與無能。首先對於洶湧的工人罷工的領導，往往以工人無經驗不能罷工的觀點而放棄罷工的領導（如滿洲，河北，河南），或者在鬥爭緊張時而向困難屈服（如河北的保定），或者不願很艱苦的進行準備罷工的工作，進行廠內的活動，而以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的空喊，去代替真正組織罷工領導鬥爭的執行，特別對於反對黃色工會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別的鬥爭的缺乏，對於革命反對派工作的忽視（滿洲，河南幾乎沒有這一工作），對於赤色工會的發展與鞏固工作的不足，在廣大的工人激烈的自發的鬥爭，黨領導鬥爭組織鬥爭是大大的落在工人積極性之後。

在廣大範圍內的農民鬥爭的發展中，黨的領導很多地方極嚴重的存在着富農以至地主路線的危險。河南黨以為游擊戰爭中土地革命只是宣傳的口號，或者以為富農地主中有革命與反革命的不同，陝西黨以為農民還沒有土地革命鬥爭的勇氣，或者土地革命須候各地革命平衡發展後才能發動（如河北），黨內還很多存在着沒有武裝是不能作游擊戰爭的觀點，這些富農地主的路線，成為領導土地革命最危害的障礙，這不能不使黨對農民鬥爭的領導，農民羣衆組織的發展與建立的工作，走到脫離羣衆與機會主義的消極。

對於革命兵變的組織與領導，同樣很多採取消極的觀點，如滿洲黨完全忽視洶湧的兵變潮流的領導，河南黨以開小差的方法去代替革命兵變與士兵工作的執行，北方各省

黨一般的沒有抓緊和注意對於北方主要白軍部隊中的工作，在帝國主義國民黨殘酷的向革命向蘇區紅軍的進攻中，這是不可容許的消極。

五、最後最嚴重的對於黨的組織的鞏固與發展的問題。河南黨在組織上的大大削弱，特別各省黨對於產業工人成份的稀少，在發展組織中表現極嚴重的關門主義。工人熱烈要求加入黨，經過了幾個月的攷察和工作，但黨還需要攷慮而不予加入（如唐山），滿洲黨在洶湧的工人鬥爭潮流中，在半年來發展工人同志的數量，沒有超過一二十人，河南黨在長期的工人鬥爭中，幾乎沒有工人同志的發展，陝西黨在組織上工人成份微弱到極點，即在其他成份上，雇農成份同樣是非常的稀少，黨在產業中的建立黨的堡壘的工作極端的不足。黨的組織幾乎沒有一省不遭受到破壞，與大批幹部的犧牲，而破壞的主要原因，大部由於黨自身對組織的不嚴密（特別對秘密工作的忽視），黨沒有堅決的肅清黨內游移動搖的份子所致，以致北方黨經常處在非常不鞏固的境地，支部生活的薄弱，黨員的流動性，同樣是黨在組織上的嚴重現象。

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對新幹部培養的忽視，黨內兩條戰線鬥爭的不深入，黨內腐朽的自由主義的存在，這是北方黨在組織上最嚴重的現象。

六、反對反革命派別的鬥爭，是非常的不夠，有些黨部甚至完全沒有（如河南），不能抓住一切機會揭破他們的武斷宣傳（特別對於改組派，取消派等等），甚有時反革

命派別的思想反而影響到黨內一部份黨員的思想中來。

北方會議認為這些嚴重的錯誤與缺點，在革命危機的增長中，是最大妨礙黨的工作的開展的。清醒的明白的對於自己的成績和錯誤的量，加強發展已有的成績，糾正所有的錯誤，這是北方黨必須以最大的積極性去執行。

北方會議指出當着會議上對於工作的自我批評時，曾經表現出對於自我批評有不正確的了解，如滿洲代表對於黨的工作錯誤的揭發，幾乎將全部工作的錯誤，推到地方黨部和支部身上去，而對於省委本身領導上的錯誤，隱藏和躲避起來，這是不正確的；而另一方面陝西代表對於自我批評却又走到自殺批評的傾向上（如陝西黨創造了陝甘邊蘇區，還以為黨是革命的罪人的說法），這同樣是不正確的，不正確的自我批評，必致模糊黨的成績與錯誤，這是對於黨的工作上是有妨礙的。

北方會議一致的堅決的在國際和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完成了北方會議，對於北方黨今後工作的方針已經明確的規定下來了，重大的任務是放在北方黨的面前，放在每個黨員的肩上。革命的風暴，是急激的開展着，千百萬的羣衆，是在歡迎着黨的領導，北方會議要求全體同志堅決的一致的動員起來，在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下，到工廠中去，農村中去，兵營中去，一切勞苦羣衆中去，去領導和組織千百萬鬥爭的羣衆，「用一切革命力量來準備三個爭鬥的支流：工人爆發，農民暴動，軍事叛亂，匯合成一個巨流

「，爲創造和擴大北方蘇維埃而鬥爭，去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垂死的統治。無情的打擊黨內悲觀，失望，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同時殘酷的與空喊罷工，奪取政權和玩弄暴動，而放棄日常鬥爭的領導的左傾空談作鬥爭！艱苦的耐心的去進行黨的工作，以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頑強性，去戰勝一切的困難，澈底的去執行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以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迅速完成，去爭取蘇維埃政權在全中國的勝利。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

列寧在第一次革命時代怎樣爲『轉變』與

反對中庸主義而鬥爭？

馬蒂諾夫

——在列寧逝世第八週年講演——

斯達林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編輯部的一封信，不僅於蘇聯共產黨有原則上的重大意義，就是於整個共產國際，也是這樣的。斯達林指出了黨史的戰線上，有不滿意的地方。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呵！我們的合於科學的歷史著作，既沒有深入黨的原則，又有一部分指導蘇聯科學院的工作人員，表現了腐朽的自由主義與不充分的階級防範，於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與被黨所擊敗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企圖把他們的觀點，偷運到歷史著作中。照他們的意見，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尚沒有了解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和左派（盧森堡等）不同；他輕視了中庸主義的危險，他在戰後才改變了他的意見。

托洛斯基這樣誣蔑列寧與布爾塞維克黨，無非想於暗中販賣他們的觀點：現在共產運動的原始，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不是『落後農業國家的產物』，而是左派急進主義

，是先進工業國家的產物；共產主義的一切叛徒，乃得據以倡言蘇聯共產黨，不能要求作共產運動的領袖，社會法西斯蒂乃得據以倡言落後的俄國所完成的十月革命，不能作為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模範。

這種托洛斯基的偷運品，不僅於蘇聯共產黨是危險的，而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兄弟黨，更有莫大的危險，在這些國家內，尚表現着許多左派急進主義的殘餘，尚有人不完全知道左派急進主義雖然於戰前的第二國際內做了不可否認的革命工作，牠現在却做了一個從共產主義過渡到社會民主黨（即反革命）的橋樑。

斯達林的信，在蘇聯共黨內，在歷史戰綫的一切戰士內，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促進了他們詳細地檢查在這戰線上所作的工作，並且要他們改正這方面所犯的許多錯誤。一切兄弟黨，現在應該以同樣的能力，來同樣地完成這一工作。這種自我批評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把列甯在戰前關於革命轉變的鬥爭，即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加以深刻的研究；必須研究列甯怎樣進行反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的鬥爭，研究他怎樣，在實現這一雙重任務中，建立了共產國際的基礎。我們的論文，雖不敢說「盡言所欲」，其目的便是討論這些問題。

x

x

x

列•甯•怎•樣•為•轉•變•而•鬥•爭•

50

一九二六年，斯達林就在他的列甯主義問題的序言中，發揮了這個理論：「列甯是了解與發展不斷革命論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列甯採取了牠的純粹形式，使牠成為他的革命論的基礎之一」。斯達林援引了列甯的說法來作證明。

一九〇五年，列甯寫了以下的一段話：

「我們將要立即從民主革命，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自覺的與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是不斷革命論的信徒。我們不應該停留在半途。……」

不會陷入冒險主義，不會叛變我們的科學信心，也並不是獵取卑鄙的名譽，我們敢說一句話：我們將用一切的力量，幫助全體農民來完成民主革命，因為這使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易於極迅速地進到一個新的更偉大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

經過了十六年，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列甯關於同一論題，寫了：

「第二半國際（或稱第四國際——譯者）的馬克思主義的英雄們，如：考茨基，希爾腓丁，馬爾脫夫，切爾諾夫，希爾葵特，郎魏，麥克唐納，屠拉弟等都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關係。前者轉變為後者。後者於過程中

解決前者的諸問題。牠鞏固前者的工作。鬥爭，只有鬥爭，才能決定用什麼方法實現那個轉變」。

我們更從列甯的處女作『什麼是人民的朋友』中，援引一段論說，證明列甯不僅於戰後，不僅於一九〇五年，而且在一八九四年便提出了轉變的問題。

『當牠的（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同化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觀念，即俄國工人的歷史任務的觀念……那末俄國工人領導一切民主份子，將要打倒專制主義，將要領導俄國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走到公開的政治鬭爭的直接道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列甯常常是主張轉變的，因為他不是自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目標，不僅在推翻沙皇的政權，而且要藉這一方法來達到共產主義革命。

他於同一著作中，寫了：

『……反對一切制度（專制主義，階層制度，反動制度）的鬥爭，是不可缺乏的，因為牠是便利反資產階級的鬥爭的一個手段。……一般的民主要求的實現，是工人所需要的，以便開闢一條道路，來戰勝工人們的主要敵人，即資本』。

列甯更說明推翻資本主義的意義如次：

『工人們應該知道：他們不推翻反動的支柱，便沒有戰勝資產階級的可能，因為那

些支柱存在一天，俄國農業無產階級（列寧暗指那時的貧農），將不能脫離鄙塞的與被壓迫的狀態，只有失望，不能反抗，不能作合理的堅決的鬥爭，而農業無產階級的擁護，又成爲工人階級勝利的不可缺乏的條件。」（什麼是人民的朋友）

列寧從馬克思取得轉變的觀念，不斷革命的觀念。如斯達林所指出的，托洛斯基曲解了這一觀念，而列寧却了解了牠，並且更發展了牠，使牠適應於帝國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在這新時期中，爆發了第一次的俄國革命。列寧進一步地發展了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觀念：他考慮新時期的種種條件，便於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前夜與當中，建立了黨，指導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以便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始與過程中，產生重要條件，便於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列寧的偉大歷史勞績，可以見得列寧在戰前組織布爾塞維克黨的時候，便建立了十月革命與共產國際的基礎。

馬克思對於前世紀後半期的民族戰爭與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適應於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年的一般條件與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特別條件。一九一五年，列寧在他的論文「在外國旗幟下」中，寫了關於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的一般條件的一段話。他爲着避免檢查，用「現代民主」代替「工人的黨」。

「從法國大革命到德法戰爭的第一時期，是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時期。是資產階級向上發展的時期，是一般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運動的時期，是封

建與專制制度迅速崩潰的時期。……那時候，在某幾個先進國家內，現代民主（工人黨）自不能採取真正獨立的與適應於資產階級衰微的行動。參加戰爭的主要階級，便是資產階級。牠蒸蒸日上，只有牠才能夠戰勝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代表這一資產階級的，在各國有生產商品的各有產階層，牠的進步傾向，有程度上的不同，甚至也有革命的」（比如一八五九年意大利資產階級的一部份）。

關於一八五〇年德國的局勢，馬克思在『共產同盟的中央委員會的宣言書』中，寫了：

「民主黨，即小資產階級的黨，逐步地在德國組織起來了，而工人的黨，却失掉了牠的鞏固基礎……因此完全受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指導」。

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年的條件，既如上述，馬克思在那時民族戰爭的過程中，採取了「保護國家」的態度，恰恰保護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一國家，從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的利益觀點看來，是起了比較進步的作用。馬克思鑒於一八五〇年德國的特別狀況，預料德國將有新的政治爆發，萬一革命爆發了，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將不可避免地拿到政權，同時他更看到不斷革命的前途，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在一八五〇年他不能而且也沒有替工人的黨定下（於將來革命的過程中）參加革命政府與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任務。在一八五〇年的條件下，馬克思為事實所

逼迫，只替工人的黨定下了一個任務：和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分裂，建立獨立的祕密的公開的工人黨，其特別目的在反抗把工人黨做資產階級民主黨的學徒，在武裝工人，在使無產階級嚴厲監督叛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在保持極左的革命反對派的態度，一直等到民主黨衰微下來，工人的黨可以推翻他們，這樣便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參閱列甯：『臨時革命政府』，第六卷，俄文版二一〇——一四頁）。

孟塞維克黨人，只依附馬克思的文字，却改變他遺教的精神，改變他的辯證法，并企圖把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向上發展的戰略與策略，適應於帝國主義新時代，即垂死資本主義時代的，並且加以極端的矯揉。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主要地採取了保護國家的態度，即社會愛國者的態度；他們在一九〇五年時代，採取了『極左』的態度，擁護自由資產階級，並沒有號召嚴刻地監督自由資產階級叛賣的策略，並沒有企圖於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提高到較高的階段，提高到無產階級革命，如馬克思所主張，即是說，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列甯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與帝國主義戰爭時代，採取了原則上相反的態度。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列甯見到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是向下發展；見到俄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半封建專制主義的掩護下，是比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的更加成熟，那時德國的大工業，幾乎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運動，也不怎樣

嚴重；俄國社會民主黨，即工人階級的黨。在革命的前夜，便立於一切革命黨的前鋒，開始衝入鬥爭。列寧并見到俄國革命，可以變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俄國無產階級，可變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九〇二年他於『做什麼』中寫了。

『現在歷史替我們定下一個當前的任務，這一任務是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當前任務中最革命的一個；這任務的完成，即是說，摧毀歐亞反動的最有力的支柱，便可以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因為這些理由，列寧向前展望，却不向後迴顧，在火星報開始的時期，便與尚未形成的孟塞維克對立起來，採取了不作自由黨的尾巴的態度，採取了反抗自由黨態度，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爭取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對於小資產階級羣衆的領導。孟塞維克的候補者，蒲列哈諾夫與亞赫爾拉得說及『無產階級領導』的開始。亞赫爾拉得替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了一個可笑的定義，污辱了這一真正定義。所以孟塞維克等到一九〇五革命出現時，便離開亞赫爾拉得的觀點，拒絕他所說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列寧從開始就真正地採取了無產階級領導的觀點，并且把這一問題提高到更高的理論水平線。

因為對於領導有不同的見解，所以列寧與蒲列哈諾夫於一九〇二年製定黨綱時，開始了原則上的鬥爭，那時他們兩人尙在同一組織內合作，共同編輯火星報。列寧和蒲

列哈諾夫的意見相反，說爲着無產階級領導的實現，爲着以無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羣衆，我們的黨不應該放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相反的，應該加緊兩者間的鬥爭，以便保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擴大與深入。列甯批評蒲氏的草案：

「這個草案，不是無產階級反抗確定的資本主義的緊急狀態的鬥爭綱領，而是奉一般資本主義爲神明的經濟綱領」。

列甯說到：「俄國無產階級的黨，應該在牠的綱領中，毫不隱諱地指斥俄國的資本主義，向牠宣戰」。

在和札蘇尼豈的討論中，列甯寫了：

「顯然地要拉攏一切小生產者。但是我們必要知道那是一個特種階級；雖然和無產階級有極多的連系，但他們總自成爲一個階級。」

應該首先把無產階級分開，並且以後明白宣佈：無產階級邀請個個與解放個個。

我同意以後二字，却要求首先二字。

我們俄國的工人與被剝削羣衆，痛苦極了，却沒有引起大衆運動，因爲「少數」工廠工人沒有開始鬥爭，沒有開始階級鬥爭。而且祇有那個「少數」才能担保大衆運動的前進，發展與擴大。在俄國，批評家指斥社會民主黨不喜歡農民，社會革命黨宣稱必須以一切工人與被剝削者的鬥爭觀念代替階級鬥爭的觀念（俄國革命通訊第二號），

我們在俄國應該首先用唯一階級鬥爭（即唯一無產階級）的明確定義，把我們和無賴子分開，然後宣佈我們邀請個個，我們做一切，擴大到一切」。

列寧注重「首先」與「以後」，并非在時間上把「分開」與「領導」分成兩個相續的階段。在火星報出版的開始，列寧便定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任務與連帶的任務：即組織於全民有關係的刊物。所謂「首先」與「以後」，是指空間說的，「分開」與「領導」在綱領中所佔的地位，是依照其重要性來決定的。依照列寧的意思，無產階級的分開，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根本條件，因為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條件。

這恰巧因為列寧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分開」與反對資產階級的影響深入俄國社會民主黨，認為是必須的，認為是戰勝農奴制度的殘餘所必須的，認為於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同樣必須的，認為「分開」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的國際鬥爭的一部分。這一鬥爭，列寧鑒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把牠比作「山岳」與「平原」間的鬥爭。列寧批評蒲列哈諾夫的綱領草案，說：

「這是真的（被剝削勞苦羣衆的痛苦加多了），但是把無產階級的痛苦和小生產者的痛苦混爲一談，是錯誤的。……並且在目前，隨着小生產者鬥爭的惡化，又來了平原社會主義者與山岳社會主義者的鬥爭的惡化，却不可把一切惡化混淆起來」（列寧全

集，二卷，七九頁——俄文版）。

列寧提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的問題，把這問題密切地連系到黨內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侵入的鬥爭；在把小資產階級羣衆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解放出來以後，使他們不再爲那種資產階級影響所克服。列寧須要建立的是強硬的單純一致的黨。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寫了：

「雅各派是不可分離地連系到無產階級的組織，知道他的階級利益，他便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

爲什麼列寧建立這樣的黨，薰染着雅各式不可克服的精神呢？因爲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經過最完整的最深刻的資產階級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列寧自開始即教育俄國無產階級來作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教育布爾塞維克黨，來轉變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使他成爲社會主義革命，使他成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這是一切機會主義者所不了解的，他們只知道俄國是歐洲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不知道俄國從二十世紀開始起便變成了歐洲最革命的國家。

那時西歐是否有一個社會民主黨，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對於黨抱有與列寧相同的觀點呢？顯然沒有。列寧在寫以上援引的幾句話的時候，第二國際內開始了格斯第派與覺勒西斯主義，正統馬克思主義與柏斯坦因主義的鬥爭。但是考茨基與柏柏

爾，雖然反抗柏斯坦因與俄爾馬，却不想驅逐他們出黨。列寧關於黨的組織原則問題，決意和孟塞維克分裂，知道這是原則上不同的問題。等到分裂實現，不僅孟塞維克，而且左派盧森堡與托洛斯基，都高呼反對雅各主義，反對布郎基主義，反對列寧與布爾塞維克的獨裁傾向。

隨着來的問題，便是列寧爲着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一九〇二年列寧在他的「做什麼」內，寫了一段關於組織一切同事者圍繞火星報的話

「這一組織，必須準備一切：一面救全黨在革命最低落時候的榮譽與傳統，一面準備與實現全民暴動」（列寧全集第四卷五七一頁社會國際版）。

那時德國一切社會民主黨，援引恩格斯在「法國階級鬥爭」序言中的說法，倡言暴動時期已經過去了，其實這種說法，早被他們自家曲解了。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盧森堡與巴爾勿，那時創立一種理論，說現在武裝暴動的鬥爭，應該讓位於純粹無產階級鬥爭的方法：同盟罷工。自從一九〇二年分裂以後，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批評，即反對列寧口號的批評，不僅限於那一點。他們都激烈地指摘列寧，宣佈由中央規定暴動，便是布郎基主義。孟塞維克派的馬蒂諾夫，在他的「兩個專政」中，說布爾塞維克企圖奪取政權，企圖於資產階級革命中建立他們的專政；這和社會民主黨對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的觀念是相反的；倘若成功，便會歸結到黨的完全破產。在黨的

第三次大會，列甯接受了馬蒂諾夫的挑釁，宣佈了真要於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建立革命的工農專政。問題尚不止此。關於組織武裝暴動的問題，布爾塞維克一直向前進展，和一般傾向相反。我們要知道那時第二國際所屬的政黨，只有布爾塞維克是敢於提出組織武裝暴動的問題，敢於解決那個問題，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只存在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政綱中，是第二國際所屬的其他的一切社會民主黨政綱中所沒有的。因此，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領袖，做了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領袖的前鋒，正如馬克思雖然生長於落後的德國，却做了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領袖。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根本問題，連系於列甯為革命轉變而鬭爭的問題。這就是一九〇五年列甯提出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兩個策略』的問題。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的一切主要分別，都集中於這個問題。

孟塞維克說：俄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性的，那末自由資產階級，應該負起『主要動力』的任務，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在於擁護與鼓勵自由資產階級，自下而上地推動牠，却不要現出共產主義的赤色鬼臉來嚇壞了牠。他們說，社民黨在整個革命中的任務，在於保持極左的反對派態度，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在把資產階級中的民主分子提攆到政權，這樣，革命便可步步前進。謝謝這一逐步前進，政權就可落到社民黨的手

裏。但是社民黨可以不企圖政權，除非革命已發展到西歐的先進各國，除非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已經達到相當的成熟。孟塞維克說，俄國社民黨絕對不可參加革命的政權，因為一參加政權，便不能不實現社會主義，而俄國是經濟落後的國家，那一實現所需要的國內條件，尙未具備。總括一句，那一策略，把社會民主黨的任务，減低到擁護自由資產階級與立憲民主黨。

列寧極端反對孟塞維克關於俄國資產階級的那種觀念。他說資產階級革命有「兩種」。

「土地問題，成爲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決定那一革命的民族特點」。但是俄國的土地問題，可用兩種方式來解決。

「把大地主的封建剝削，慢慢地轉變爲農業資產階級的剝削，把農民羣衆轉變爲無產階級，便可以廢除農奴……」。另一方法，我們稱他做資本主義發展的美國方法，和普魯士的方法不同。這一方法同樣要求以暴力摧毀舊地主制度……但是這一摧毀，不是爲着農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是爲着農民羣衆的利益」。

列寧主張採用農民革命的方法，祇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才能完成農民革命。孟塞維克不懂得資產階級革命（農民革命），不懂得反革命在資產階級內的來源。他們認爲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工具，他們認爲資產階級退出革命，

那就要削弱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們和自由資產階級勾結，而後者又復和大地主與沙皇勾結，這樣便斷送了俄國的農民革命。

布爾塞維克打算用什麼方法和什麼階級力量聯合，來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呢？他們在轉變的各階段所定的計劃是怎樣的呢？斯達林在一九二六年第四次聯邦共產黨代表大會答覆了那一問題。他說：

「在第一個時期，布爾塞維克說：和整個農民合作來反抗沙皇與大地主，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來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第二個時期，布爾塞維克說：和貧農合作，反抗資產階級與富農，使中農中立，來執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第三個時期，即是我們現在經過的時期，布爾塞維克說：和貧農合作，和中農結成堅固的聯盟，反抗我們城鄉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以求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

十月革命，勝利地達到這一轉變的整個路線。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規定了這一路線，却因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實現。列甯在一九一七年認為轉變的路線，比一九〇五年更迅速更容易，因為十月革命的當兒，俄國與國際的形勢比一九〇五年大大地不同了。斯達林在他的著作「在十月的路上」的序言中，寫了：

「有三個國外條件，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比較地容易打破帝國主義的鎖鍊、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第一，十月革命，開始於兩個帝國主義集團拚命決鬥的時期。第二

，十月革命爆發於帝國主義戰爭的過程中……這一事實，於十月革命有最重大的意義，因為牠給予十月革命一個有力的原素來贊助和平，使臨時政府的推翻可能地連繫到可怖戰爭的終了……。第三，在歐洲存在一種有力的工人運動，在西方與東方山持續的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革命危機也成熟了。」

這三個特點，都是一九〇五年所沒有的。此外尚有許多國內的順利條件，我們只舉出在中最重要的一個。一九一七年四月，列甯曾經說過，俄國革命產生了兩重政權，算是達到了高峯。自從二月革命以後，蘇維埃代表工農民主專政，可是蘇維埃內工農組織的自覺與精神，不很充分，加以小資產階級的調和派如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從中作祟，蘇維埃乃將其政權讓予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自從工農專政和資產階級政府混合以後，於是和平問題土地問題，都不能在二月的時期解決，祇能在十月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才得到解決。

一九〇五年 列甯預料革命的轉變，將要遇到許多困難，在一九一七却沒有遇見牠。列甯在一九〇五年所指出的主要困難，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恐怕有一大部分的中農，會要走到反革命。列甯的這一預言，如斯達林所說，不能和托洛斯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農民將要脫離的預言混為一談。現在托洛斯基主義者恰巧援引列甯關於中農脫離的預言，來證明列甯在一九〇五年並沒有想到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

革命的可能。

這一推論，是對於列甯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侮辱。列甯明明地說過：「我們依照我們的力量，依照有覺悟的與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立刻開始從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列甯常常指出威脅革命的困難與危險，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在黨的與羣衆的內部散布失望與悲觀的種子，不是像孟塞維克所說的：「值不得努力去開始」，也不像盧森堡所說的：「與其開始、不若走向失敗」。他指出困難的目的，在於驚醒黨內與無產羣衆內的大熱潮，深信黨與牠所領導的羣衆，能夠克服絕大的困難。列甯不僅指出困難，而且指出黨必須克服牠的道路。一九〇五年列甯對於克服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有一大部分中農脫離的危險，採取了什麼見解呢？他在斯德哥爾摩黨的代表大會說過，防阻帝制回後的絕對担保，端在若干先進國家內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至於相對的担保，也是有的，在於擴大革命，在於完成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後目的。

相對的担保，在於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以民衆的力量，摧毀大地主與沙皇的官僚；在於以工農專政拔除農奴制度的一切根株，在於以工農專政根本地清理土地乃至於沒收牠。

列甯在斯德哥爾摩黨的代表大會上說了：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差不多一定地（至少很可能地）要引起歐洲內部

的許多政治紛擾，大大地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

歐洲的政治紛擾，怎樣可以反應到俄國中農的行爲呢？ 列寧說過：

「商品的小生產，徘徊在勞資的中間。他和工人階級合作，反抗農奴制度與政治專制。但是同時他想鞏固他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的有產地位。因為這個原故，倘若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條件是很順利的（比如工業的繁榮，土地改革後國內市場的擴大等等），那末商品的小生產者，將必掉轉頭來，反抗爲社會主義鬭爭的無產階級。」

可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農民反抗無產階級的鬥爭，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順利條件下與在工業繁榮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但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若能在老大資本主義的歐洲，在立於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歐洲，引起許多政治的爆發，那末俄國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條件是不順利的。在世界革命危機的條件下，歐洲自不能貢獻什麼機會，來造成一種條件，便利於俄國工業的繁榮。 列寧在他的論文「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中，在一九〇五年，便想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

「牠（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將要想到——因爲牠應該想到，除非是不可救藥的腐儒——在歐洲偉大的經驗以後，在俄國工人階級偉大的能爆發以後，我們可以成功地在無教育的與卑微的羣衆面前點燃閃爍的革命火燄，可以成功地實現一切民主改革，實現我

們最低限度政綱的全部；可以成功地使俄國革命成爲不止幾個月而是幾年長的運動，這一運動不是從政府搶來幾個無意味的讓步，而是完全地推翻牠。假如能夠這樣的：……那末俄國革命的火花，將要蔓延到歐洲；被資產階級反動所壓迫的歐洲工人，將要自動起來，顯示我們如何做法；歐洲的革命潮流，將要影響到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期成爲幾十年的革命的時期，那時……我們將有許多機會說到「那時」所做的，我們將不再在被咒罵的黨遠的日內瓦說話，我們將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街道上向千百萬的工人，向俄國的自由集合的勞苦羣衆說話。」（全集第七卷第二二四頁巴黎社會學院版）

所以列甯在第一次革命的時期，預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勝利以後，暫時的失敗與退却是可能的。同時他深信，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廣泛與牠的主要動力（無產階級）的權威，將要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激起有力的反應，激起種種政治騷動，甚至激起社會主義的革命（註），這種種將要幫助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解決一切困難。

〔註〕關於這一點，列甯和恩格斯一致，後者說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一個定律。

列甯在一九〇五年對於俄國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是怎樣的，他是怎樣爲這一轉變而鬥爭的。他首先計算到國內的革命主要動力，估計到他自己的布爾塞維克

黨，勇敢地替這個黨定下了英勇的任務，堅決地要把俄國的無產階級變成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先鋒。

第二國際內是否另外有一個黨把這一問題提高到這樣高的水平綫呢？是否另外有一個黨具體地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牠是否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採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呢？沒有。當列甫與布爾塞維克黨開闢直接的道路，經過工農的民主專政，走向無產階級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那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因為缺乏革命的形勢，僅僅爭取普選為直接的政治任務。革命形勢的缺乏，又加以數十年的沉靜與停滯，妨害了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的最好馬克斯主義領袖的精神。

因為這一原故，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領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間的激烈討論，沒有瞭解牠的真實意義，採取了中立的態度。他們認為是派別的爭論，并指斥列甫是分裂者。柏柏爾認定那種討論是幼稚病。考茨基對於討論，却予以較多的考慮。一九〇六年，蒲列哈諾夫拿起俄國革命是否是資產階級性的，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應否擁護資產階級民主來反對反動的問題，就問於國外的社會民主黨，那時第二國際內社會民主黨的大多數，都贊成孟塞維克。只有考茨基在他的論文『俄國革命的動力』中，接近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因為他依照列甫與布爾塞維克的說法，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內容的問題和動力的問題混為一談；並且和布爾塞維克一致承認：俄國

革命的唯一動力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在俄國的現階段，只有工農在革命的整個過程中才能於利益上有堅固的結合。但是考茨基和布爾塞維克相反，沒有提出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

左派對於俄國革命內兩個策略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的態度呢？他們無疑的很關心俄國的革命，他們部分地參加了這一革命（如波蘭），他們在自己的黨內（如德國與波蘭）起了革命的作用，尤其在戰前努力地反對了中庸主義。但是他們關於「無產階級依靠農民」的問題，採取了近於托洛斯基中庸主義的態度。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是馬克斯不斷革命論的曲解了的變相，在那時已經被列甯充分地打擊了。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如斯達林所指出的，是基於兩重的估量不足：不相信俄國革命的國內動力。『到現在只提出了不斷革命論的一個形態，即不相信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其實還有另一個形態，即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

托洛斯基不相信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因此他實際地幫助了自由工黨的政策，適如列甯所說。自由工黨的政策，在否認農民的作用下，拒絕調動農民來革命。

此外，托洛斯基不相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能夠維持其對農民的領導，所以在一九〇六年寫了：

「俄國的工人階級，倘若得不到歐洲無產階級的政府的直接擁護，將不能維持牠的

政權。……這是毫無疑義的。」

托洛斯基既是兩重地不相信俄國革命的國內動力，所以他在一九〇五年，雖然散布「左」的革命論調，畢竟不和布爾塞維克而和孟塞維克攜手前進，參加了孟塞維克中央機關報『開始』的編輯部（他的不斷革命論、是從巴爾勿剽竊來的）。

這樣，布爾塞維克領導了俄國的革命，但是違反了整個第二國際的趨向，那時中庸主義尚沒有依照這趨向來形成。

這樣，布爾塞維克在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了一些主要條件，便於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時第二國際的領袖們，甚至在中庸主義形成以前，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未來曲』。考茨基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寫了這一句：「我們安心地讓將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吧」。

還有兩個重要問題：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殖民地問題的態度，民族自決乃至分離的口號，帝國主義戰爭中布爾塞維克的失敗主義的口號，可惜限於篇幅，不能詳加討論。這些口號，指出了解決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辦法，大大地戟刺了先進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展開，戟刺了俄國革命的發展與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戟刺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的展開。那些口號指出了先進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的聯合戰線。

在這些問題的當中，只有布爾塞維克反對一切社會民主黨，其中包括着托洛斯基的「左」派中庸主義者與以盧森堡爲領袖的左派。這些口號，不僅是由布爾塞維克在帝國主義戰的前夜或當中提出來的。關於民族自決乃至分離的口號，曾經於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舉行了一個反對盧森堡所指導的波蘭社會民主黨的鬥爭。在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時，布爾塞維克就已經提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失敗主義，同時連繫到保護革命的戰爭與反虛偽和平主義的鬥爭。

最後，我們可以確定以下不可爭辯的事實。直接連繫到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與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諸問題，恰好是共產國際和第二國際分家的問題，是戰前由布爾塞維克提出來的，是布爾塞維克形成政團以後提出來的。恰好因爲這個原故，布爾塞維克才和孟塞維克分家。恰好因爲這個原故，布爾塞維克才領導一個堅強的鬥爭，不僅反對孟塞維克，而且反對巴爾勿與托洛斯基的中庸派，反對盧森堡等的左派。

由這點看來，布爾塞維克——是第二國際最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是現代國際無產階級運動最左的趨向——是否於戰前輕視了第二國際內的中庸主義呢？說他們於戰前輕視了中庸主義，是否是可恥的誣蔑呢？而且還不止此：「左」右機會主義者，用同樣的方法，曲解了中庸主義的觀念與其產生的歷史。

列甯怎樣反對中庸主義？

斯達林同志在關於列寧主義的原則的討論中，定下了列甯主義對於戰前第二國際的態度：

「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到列甯，是第二國際內機會主義支配的時代。更恰切地說，不僅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支配，而且是有力的支配。就形式說，第二國際是由『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正統派』考茨基等所領導。……小資產階級性的機會主義者，投降於資產階級。至於『正統派』呢，他們投降於機會主義者，以便保持和後者的一致，以便保持黨內的和平。……而且那時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和平的時期，是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的可怕的矛盾，還沒有十分暴露出來，那時第二國際的各政黨，正在發展前進，再沒有想到革命，沒有想到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想到羣衆的革命教育：……」

但是我們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即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必須修正第二國際的整個工作：……沒有這一初步的工作，便不能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那一清除第二國際的糞穢的榮譽，便屬於列甯主義」。

從火星報時期到戰前，列甯是否看見了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或是輕視了牠，如托

洛斯基派所武斷的呢？托派提出這個問題，簡直是笨拙與蓄意中傷。祇有列甯與布爾塞維克，在第一次革命的過程中，提出許多重要問題，緊密地聯系到轉變那一革命為無產階級革命。這些問題，揭破了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使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袖們望而却步。

列甯反對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觀點：「無產階級不能而且不應該奪取政權，倘若牠不佔多數」。列甯反對這一觀點，便連帶地反對了第二國際的同意這種觀點的領袖們。他反對孟塞維克傾向自發論的機會主義與附和主義，並且同時反對了第二國際的「生產動力說」——這一學說在敘述與解釋盡人皆知的事實。列甯反對孟塞維克的說法：「不能組織革命，革命祇是自發的」。列甯反對孟塞維克為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而辯護，再由這一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他反對忽視農民問題的態度。他對於黨的觀點，主張要有雅各派的堅硬性，主張不和機會主義沆瀣一氣，這是第二國際與孟塞維克的思想與實際都不相同的。我們還可以舉出戰前第二國際與孟塞維克所共有的機會主義觀點，曾經被列甯反對過。

列甯關於機會主義，曾經說過：

「只顧目前的利益而忘記主要的觀點，只為暫時的成功而鬥爭，毫不想到將來的後果，放棄將來而注重現在——這一切或者是從『忠實的』利益出發的，但是這是機會主

義，永遠是機會主義，或者是『忠實的』機會主義，是最危險的機會主義』（列甯，國家與革命）

關於列甯在戰前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策略，斯達林說過：

「這一策略，在決定無產階級進攻的主要方向，在決定革命某一階段中革命力量的佈置，在努力執行那一計劃，直到整個階段過去而後止」。（斯達林，列甯主義問題）

戰前的時期，一方面表現着俄國的革命局勢，另一方面表現着西歐尤其是德國內比較安定的局勢。列甯首先猛烈地反對俄國的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以及附着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孟塞維克與托洛斯基。因為後者的行動發生於革命中的國家；假若在這時候能夠無情地打擊俄國的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這決不是狹隘的民族精神，如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所誣蔑，而是執行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策略之一，即「首先打擊國內的敵人」的策略。同時西歐機會主義的錯誤，在俄國表現得特別厲害，直接妨害革命的進展，而且俄國革命又有國際的意義，所以必須首先打擊俄國的中庸主義與機會主義。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指出了國際無產階級的道路。無情地打擊孟塞維克，便是等於教訓整個第二國際如何準備革命，如何組織革命，同時把機會主義驅逐於工黨以外。

同時列甯積極地擁護第二國際反對機會主義，柏斯丹主義，爵勒斯主義，同時却批

評牠在鬥爭中的動搖與態度的含混。他首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強烈地批評主張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斯蒂盧威。斯蒂盧威的著作中，包含着若干不正確的傾向，那時却不因此認為牠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獨有列寧寫了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反映到資產階級的文獻」，來批評那部著作。

因為策略的理由，列寧在他反對西方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表現了相當的慎重，直到中庸主義的形成與對右派的結合。

自命為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柏柏爾等，和直接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却有不同的地方：直到一九〇七年，他們不以小資產階級與貴族工人而以無產階級的大多數為社會基礎。他們仍被生長於合法主義領域內的機會主義所渲染。

「習慣的力量，比較和平的發展，民族的偏見，害怕突然的變化，不相信那些變化——這一切起了加強機會主義（以貴族工人為基礎）與對這個（顯然指着中庸主義）的虛偽調協與懦怯調協的作用」。（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第十三卷，一七〇與一六七頁）。

直到一九〇七年，列寧對於「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先生們表現慎重，其理由有二個：

第一，那時西歐，尤其是德國，於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完成了所謂停滯與和

平的時期。那時主要的目的，在聯合無產階級的力量，準備將來的革命鬥爭。自命爲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柏柏爾、考茨基等，算是完成了和平时期的任務。他們從事於羣衆的革命教育，說明了革命鬥爭的不可避免，打擊了彰明顯著的機會主義者。

列甯姑念他們在和平時期內也做了一部分有用的工作，所以對他們採取慎重的態度，只要他們不和機會主義者同流合污，並且要他們向左轉，以便和他們合力打擊機會主義。

從一九一三年以後，列甯決絕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與整個第二國際內的機會主義者實行分家，不過那時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剛才出現，他找不着幫手來致命地打擊柏柏爾與考茨基。

「列甯怎樣辦呢？布爾塞維克又怎樣辦呢？倘使第二國際內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很脆弱的，在思想沒有組織沒有準備，甚至怕提出分家的口號」。（斯達林，「布爾塞維克主義史的幾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第六號，第四頁）列甯在他的論文「第三國際的週年」內，寫道：

「戰前工人運動中的主要分化，好像是分爲社會黨與無政府黨。那不僅是形式，而且是事實。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在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以前的長時期內，都具備客觀革命的形勢。那時要慢慢地作革命的準備。社會黨開始了準備。無政府黨沒有了解這一任務」。

列寧對柏柏爾與考茨基採取慎重態度的第二個動機，便是他預先見到只要西歐的革命形勢成熟，和機會主義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在一九〇八年說：

「我們現在祇想像到的，現在僅於實際上在工人運動中某幾局部問題（如和修正派的策略不同，因此和修正派分裂）中表現着的，將來定受工人階級更廣泛的注意，當無產階級革命滲透一切爭論性的問題，集中一切不同的意見於直接影響羣衆行爲的諸問題，逼迫於艱苦的鬥爭中分開朋友和仇敵，并拋棄不好的同盟軍以便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第十二卷）

列寧對柏柏爾與考茨基的慎重批評，彷彿像馬克思於一八六五年對拉薩爾的態度。那時馬克思對拉薩爾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的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都認識得非常清楚，却沒有公開地干涉他，因為他在那時方在完成建立德國內獨立工黨的基礎的重要歷史工作，使工黨和自由資產階級分開。直到拉薩爾與其信徒開始和俾士麥吊膀子，馬克思才用全力來公開地予以打擊。

列寧對柏柏爾的態度，也和馬克思對拉薩爾的差不多，直到領導德國無產階級的柏柏爾在基本問題上和右派結合爲止。列寧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馬克思主義」黨與柏斯丹主義翼，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企圖把兩者分開，使前者走向左邊，使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戰前，列寧曾在這一領域內進行了兩條戰線的

鬥爭：贊成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西歐無政府黨與俄國社會革命黨以「左派」資格批評整個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整體的，同時反對德國右派機會主義者攻擊德國社會民主黨常常是個改良主義黨，來這樣證明他們的機會主義與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是對的。

一九一五年列甯又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巴蒂勒索夫的極右取消主義，反對托洛斯基的「左派」中庸主義。

一九一五年巴蒂勒索夫寫了一個綱領論文「兩個時代的界線」，對於一八七〇年——一九一四年四十五年內的社會民主黨表示異常的悲觀，和托洛斯基一九一四年所出版的小冊子「戰爭與國際」的論調大致相同。

巴蒂勒索夫說，在那一時期的過程中，整個工人運動，充滿了進化論的精神與民族的狹隘性。他無非是想藉這種說法，來轉變到民族自由主義，來集中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反對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列甯寫了「在外國旗幟下」來答覆他，指出必須以辯證法來研究工人運動史，來研究和平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列甯顯然沒有否認和平時期的存在與這一時期加於西歐社會民主黨與俄國少數黨的影響。巴蒂勒索夫與托洛斯基認定那時期的社會民主黨是整體的，沒有內部的矛盾發展着，列甯却反對這種見解。

「我們知道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在那一時期，沒有一個大資本主義國家，不感覺到社會民主黨內兩個相反的潮流的鬭爭。那個時期雖是一般地和平，但是每個大國內

的那種鬥爭是非常嚴重的，幾乎達到分裂的程度。那兩個相反的潮流，表現於生活的各種領域中，表現於現代民主的各問題中：如對資產階級的態度，和自由主義的聯盟，通過預算上的經費，對殖民政策的態度，經濟鬥爭的性質，工會的中立性，等等」。（列寧，第十八卷，一九二九版，一一二頁）

後來列寧指出兩個互鬥的潮流中之一，漸漸變成了確定的機會主義，首先依賴小資產階級，依賴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官吏，最後差不多只依賴工人階級的貴族與官僚。他更指出這一形成了的機會主義方向，事前注定了社會民主黨在大戰中的叛賣行爲，而巴蒂索夫與托洛斯基却指摘社會民主黨的整個歷史是完全一致的。

列寧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機會主義，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所以在火星報的時代，他說到那些「正統派」對機會主義者作了太多的外交（太客氣了），不知道好的爭論勝於壞的和平。

列寧與布爾塞維克，都察覺第二國際「正統派」的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激烈地打擊布爾塞維克，便是對整個的第二國際進攻。正統派不堅決地進攻彰明較著的機會主義者，而列寧則希望以俄國革命的經驗，布爾塞維克的模範，與他們對俄國機會主義進攻的「熱」——希望用這種種來改正「正統派」的機會主義的路線。等到正統派表現不可救藥，列寧乃打擊他們，揭破中庸派投降公開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在某一時期，考茨基與柏柏爾，雖然避免關於國家與社會革命的問題，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過沒有和他們分家；他們兩人在和平時期內爲第二國際做了有用的工作，例如宣傳社會主義，建立與擴大無產階級的組織，準備無產階級實現牠的歷史任務，因此列寧對於他們兩人的批評，表現充分的慎重。等到他們形成中庸主義，和右派結合，『在思想上以無產階級的利益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斯達林所說，等到第二國際變成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利益結合的政黨，投降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愛國派與社會和平派，那末列寧便不客氣了。柏柏爾出席於一九〇三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赤色大會與一九〇四年第二國際的亞姆斯丹大會，向機會主義者作了最後的進攻，到此時爲止，列寧猶稱他爲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最有威權，最爲工人所愛護，此後列寧便激烈批評他。

從一九〇七年起，社會民主黨的領導，開始迅速地崩潰了。到一九一〇年，牠已變成了中庸主義。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的『政治總同盟罷工』內，證實了這點。『在一九一〇年黨的大會（會址在馬得堡），才開始形成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派。……從一九一〇年起，黨的每次大會的大多數，都起來反對極左的革命急劇性。現在已成爲定規。牠方面，從那時，也開始舉行許多大會，却沒有反對右派分子』。

考茨基遂由中庸主義變成叛徒。

列寧發覺了第二國際內的中庸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也發現了同樣的中庸主義。他是揭破中庸主義的社會基礎的第一個人。他斥責政治行爲中所表現的中庸主義。

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在斯達格舉行大會，列寧在殖民地問題與反帝鬥爭問題中，發覺了強烈的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的傾向。佔有殖民地的強國的代表，大多數贊成殖民政策。列寧發出了一個警告。他寫着：

「在歐洲工人運動內，發現了一個否定特點，於無產階級的命運是有大大的妨害的。……大規模的殖民政策，將必部分地轉移歐洲無產階級和社會的關係，使全社會不爲牠的勞動但爲殖民地被奴隸的土人的勞動所維持。……這些條件在某幾國內供給物質與經濟基礎，來腐化無產階級。……必須認識這個弊害，了解牠的原因，以便教育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向機會主義進攻。」（列寧，第十二卷，第二分冊，第三三—三八頁）。

關於反對軍國主義的問題，出席大會的德法代表團，都替保護祖國的觀點辯護。

法代表要求總罷工來制止侵法的戰爭，但德代表擔保德國沒有進攻的意思。列寧領導俄國的代表，成功地揭破了第二國際的領袖的機會主義企圖。

柏柏爾在大會上提出一個決議案，別寧說牠等於拒絕擔負反軍國主義的義務（指德

國社會民主黨拒絕擔負這一義務)。盧森堡提出列寧起草的修正案，主張於宣戰後，各國社會民主黨應該鼓動民衆，推翻資本階級的統治。列寧說修正案雖是正確的，但是不可把牠只認爲應用和平方法而否認鬥爭方法。列寧就在這幾句話內明白地判斷了柏柏爾的政策。

在一九一〇年的科奔海格大會中，列寧於馬克思主義者吳蒙投降機會主義者額爾蒙的際遇，確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存在着一個危機。

「一般地說，德國人不能堅決地遵照國際大會內的原則路線。他們在國際內所掌握的領導權，已經是旁落了。吳蒙對額爾蒙的無能，僅僅又復表現着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危機，所謂危機，便是不可避免地對機會主義的投降。」（列寧，第十四卷，三六二頁）。

恰在一九一〇年列寧說這段話的時候，他却在一特種場合中，阻止機會主義者以考茨基的名義掩飾他們的無恥。須知那時考茨基尙被稱爲「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斯路斯基就利用這點來指摘列寧，說他輕視了考茨基的中庸主義。

考茨基本是一個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時而偏左，時而偏右。一九一〇年關於總罷工的問題，考茨基與盧森堡發生了一個爭論。考茨基提出著名的疲勞政策來反對推翻政策。在這一爭論中，考茨基表現了中庸主義，却保持馬克思主義的面具，說他

不是一般地認暴動政策。他說俄國一九〇五年的暴動是正確的，暴動也可以適用於德國，只要德國有革命形勢。不過那時德國沒有革命形勢，所以暴動不是合用的。

那時孟塞維克也加入爭論，利用考茨基的威權來擁護他們的取消主義。托洛斯基與馬爾多夫都大做其文章，登載於新時代。馬爾多夫援引考茨基，指出孟塞維克於一九〇五年舉行總罷工是正確的，那時自由派同情於總罷工而且擁護牠。他說布爾塞維克把疲勞政策轉變為暴動，致使革命失敗。這樣，馬爾多夫與托洛斯基，利用考茨基與盧森堡的爭論，來污辱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列寧決定答覆這一污蔑。馬赫勒夫斯基同志，和列寧商議後，也在新時代上登載一篇論文，指出孟塞維克企圖藉考茨基作掩護是不行的，因為考茨基承認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暴動是合理的。不料想托洛斯基派的斯路斯基，就抓住馬赫勒夫斯基和列寧商量的文章，來做唯一的論據，以證明列寧於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一年尚且相信柏爾爾與考茨基。

自從一九一〇年的下半年起，考茨基確實變成一個中庸主義者。列寧說他是腐朽的機會主義者。在籌備巴塞爾大會時，列寧寫了一封信給蒲列哈諾夫，說「考茨基永遠放棄革命的總罷工」。他要蒲列哈諾夫把信轉給大會，說布爾塞維克「決計和考茨基分家，考茨基的論文，顯然代表德國人與國人的正式意見」。這便是等於向第二國際的一切主要政黨宣戰。

列寧緊密地留心於機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庸派」投降的發展，并且指出其根源。他在一九〇七年見到各大國的機會主義代表對於殖民地問題的態度，指出以殖民地豐厚利潤為基礎而發展的工人貴族的出現。他在一九一二年指出議會黨團的社會根源，一方面是工人選舉權受限制，另一面是工黨中非無產階級份子善於以議會為專門職業。一九一四年，他在勒根演說的際遇，揭破德國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的中心。

× × ×
這樣看來，列寧確用了最有效的方法來反對第二國際的中庸主義，却不是用的激劇的方法。列寧見到以盧森堡為領袖的德國左派分子，在反中庸派的鬥爭中，表現了革命的功績；所以關於國際問題與俄國問題，列寧願意和他們合作，對於他們反中庸派的鬥爭，也設法援助。他們關於黨的問題，自發問題以及暴動，農民，民族等問題所犯的半孟塞維克錯誤，列寧加以耐心的說明。但是列寧對於左派反中庸主義而不和機會主義分裂的辦法，表示不滿。列寧在一九一二年致喀平斯基的信中，說了「讓柏柏爾和機會主義者辦外交，祇要那是必須的（？？？）」（按這問號是列寧加上的），致關於我們，這是不合的」。

列寧和俄國的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分裂了。他慶賀荷蘭，意大利，保加利亞的分裂，但在戰前以及在戰爭時期，他都沒有能夠辦到引導德國的左派走向同樣的道路。

甚至在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德國的左派認爲建立新國際的時機尚早。至關於盧森堡，他在一九一八年還沒有皈依十月革命。她出獄以後才走到列寧旗幟底下。可惜盧森堡同化列寧主義與十月革命教訓的過程，被他的早死所截斷。

一九一八年的九月，盧森堡在獄內寫了一個小冊子，首先說到列寧的黨是俄國唯一的政黨，只有牠才了解革命初期的真正利益，但是他也說到布爾塞維克所犯的一些「錯誤」：

一、馬上分配土地給農民，會要使農業社會化感受困難，因爲農民得到土地，就竭力反對一切社會主義的企圖。

二、布爾塞維克的「民族自決」的口號，實際上意味着俄國國家的崩潰。

三、布爾塞維克設立憲會議是多餘的，說由普選出來的任何代表會議在革命過程中是無用的，這種說法殊不合理。蘇維埃政權底下的選舉權，代表布爾塞維克專政論的顯著產物。

四、布爾塞維克，僅承認政府的附和者有自由，而「自由常常是思想不同者的自由」。

盧森堡反對布爾塞維克關於十月革命的政策論調，和孟塞維克的觀點不謀而合，但是也有一個分別。孟塞維克在原則上拒絕十月社會革命，認定牠是烏托邦的冒險行

動，而盧森堡認定十月革命的完成是不朽的功勞，不過對於十月革命的政策加以攻擊罷了。他並且說明政策的錯誤也可以原諒的，因為十月革命是在一個落後國家內完成的，而且沒有得到德國無產階級的擁護。

盧森堡所得的結論，完全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不謀而合：在俄國，問題只能提出，不能解決。

在一九一八年的九月，盧森堡尚堅持他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對於十月革命的判斷，是孟塞維克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的混合物。他的錯誤，來自他的自發無產階級革命與資本主義自動崩潰的理論，來自「和平時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傳統。

德國十一月的革命，轟開了他的眼睛。他在革命的浪潮下，鍛鍊了他自己，開始反對夏德曼哈斯，考茨基的叛賣，開始了解並且應用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與列寧主義。這樣，他摹倣了布爾塞維克的政策。

盧森堡在革命的烽火中，改正了他以前的錯誤觀點。例如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卅日舉行的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內，演說要組織工兵代表會議的蘇維埃，並且在紅旗報上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便是改正他批評布爾塞維克放棄普選權的錯誤。

他在十二月一日斯巴達大同盟的會議上，排斥國民會議的召集，並且在紅旗報上提

出打倒國民會議的口號——這是否認他批評布爾塞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合理。

關於民族問題，他也改正了他以前反對民族分立與自決的錯誤。

關於自由問題，他認為反動派不能享有信口雌黃的自由。他并且主張以鐵腕擊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對抗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暴力。（參閱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報告）。

盧森堡對農民問題的態度，却只接收列甯主義的一半。沒有農業便不能實現社會主義。至於號召農業無產階級與貧農來反對農民，這是不合列甯主義的，因為農業無產階級與貧農，已經是農民的大多數，而且列甯的策略，亦只講到使中農中立。

盧森堡對於列甯主義的了解，自然是不完備的，可是列甯對他的態度，一面擁護他，另一面批評他，也是完全有理由的。這一批評，在戰前與戰爭期間都沒有成功地改正他的路線。但是自從德國革命爆發以後，列甯的批評與十月革命的模楷，才把盧森堡帶到共產主義營壘中來。

列甯打擊西歐機會主義的政黨，一面採用行動，模楷與嚴刻的批評，另一面却用誘勸（說服）的方法。他在俄國的鬥爭是成功的，但是在歐洲却不是這樣的。這是由於歐洲革命形勢的發展是遲緩的緣故。經過世界大戰，十月革命，資本主義的危機，也開始使西歐革命的形勢，追趕俄國革命的發展了。

（完）

中國的經濟和階級關係

何史文

——對於方亦如的批評——

中國經濟性質的問題，已經是四五年來的辯論的對象。國際革命家的領導機關以及中國最革命的先進階級的政黨，對於這個問題早就有了原則上的明顯而清楚的答案。這個理論上的鬥爭，現在已經是實際的階級鬥爭的延長和開展。革命階級的政治代表之中，誰也沒有這樣同閒情別致再去和階級敵人討論的了。現在已經不是討論什麼沒有解釋清楚的問題，而是理論上的階級戰爭。

自然，這並不是說中國革命的一切問題，經濟問題也在其內，都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根本用不着研究，也不是說實行着理論上的鬥爭，反對着社會民主主義——而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形式在現在正是托洛斯基主義——就不需要對於這個問題同時加以深刻的研究。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列寧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區別，正在於列寧特別着重理論的作用，反對一切輕視理論的機會主義的傾向。然而理論的重要正在於牠是行動的方針；脫離行動的理論只是學究主義——也是機會主義的表現，這是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的。

中國經濟性質的辯論之中，最近又發現了方亦如的一篇文章『中國經濟問題』（『研究』雜誌第一期）。方亦如，據我們所知道的，並不屬於托洛斯基主義的組織，他並且在自己的文章裏面表示願意反對托洛斯基主義。但是，他的文章暴露了他是個學究主義的『英雄』。他似乎埋怨反托洛斯基者的『忽視』理論，這當然是他這個學究主義者的成見，完全不合於事實的。而且正因為這個緣故，他自己走到了投降社會民主主義——托洛斯基主義。

『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要做無產階級的思想上的代表，在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鬥爭之中去反對那些阻礙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的現實的敵人。在這個條件之下，理論的和實際的工作合併起來成爲一個工作，這種工作，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領袖李白克納希德（註）說得清楚：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研究、宣傳、組織）（列寧文集第一卷第二三六頁）。

〔註〕這裏說的『社會民主黨』還是歐戰以前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這個李白克納希德是加爾李白克納德的父親。

可見理論和實際的聯繫應當怎樣的密切！而且最主要的條件，正是反對阻礙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現實的敵人。而方亦如呢？他的着重理論，恰好是放過敵人而去幹那學究主義式的『研究』。他的注意只在於找着一個公律，去適用於一

切社會：要適用於有階級的社會，也要適用於無階級的社會。也甚至於認為用階級關係去考察社會的經濟性質是庸俗的辦法！照他的意思，這彷彿是太不科學了！

方亦如說：

「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來決定經濟制度，等於拿有機細胞的存在來決定動物的種類，一樣滑稽。」

反對他們這種意見的人，也曾發表過另一種主張。……他們認為剝削關係是決定經濟形式的。……最近還有人主張直截了當用階級關係來決定經濟制度的，這自然是登峯造極了。用剝削關係，來決定經濟制度，第一不妥當的地方，就是牠不能適用於無階級社會。而最重要的，還是剝削關係是一種分配關係，生產品中剩餘勞動生產品的分配形式。……生產關係中的一種——剝削關係，絕不能夠作為決定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素。決定社會經濟形式的，不是分配關係，也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生產方法是決定經濟制度的東西。……人與生產工具結合的形式，就是生產方法。」（「研究」雜誌第一期第一五——一六頁）這裏，我們可以發見方亦如的許多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糊塗「學說」。

第一，他把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隔離起來。固然，他也知道：「人們根據一定的

生產方法，就互相結成具體的生產關係」，然而，他根本忘記了生產方法的決定社會的經濟制度，是要經過生產關係的。請看馬克思說的話：

「生產的社會關係是同着生產的物質資料的發展，同着生產力的變更而變更的。生產的許多關係的總和形成所謂社會關係，形成所謂社會，而且這是形成一定的歷史的發展階段之上的社會，帶着一定的只有這一種社會所特有的性質」。（馬克思：「僱傭勞動和資本」）

而方亦如却只說：「經濟性質的判定，就以生產方法為指針」。彷彿問題只在於追究到最後的決定社會基礎的是什麼，而完全不管這裏的所謂「決定」是要表現在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的。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科學不同的地方。方亦如的學究主義使他只看見所謂「科學的定義」的詞句上的重要，而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物質的生產關係的作用是不關重要的。這是根本不了解唯物辯證法的。因此——

第二，牠把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割開來，切斷了這兩種關係之間的辯證法的聯繫。他了解馬克思所說的「生產的許多關係」，正是指着這些關係說的。他說人與生產工具結合的形式，這是人經過技術而和自然界發生一定的關係，這就是生產方法，至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生產關係，以及其中的一種剝削關係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照他這種說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和生產方法沒有聯系似的，至多也不過是被生產方法所規定的一種社會關係，是消極的原素，而決不是『決定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素』。而馬克思說：

『紡織機器不過是織布用的一種機器罷了，只有在某些條件之下牠才成爲資本。沒有這些條件，牠就並不是資本，這彷彿單有黃金還並不是錢，單有糖還并不是糖的價錢。』

人在生產的時候不但對於自然界發生一定的關係，而且互相之間發生一定的關係。他們只有在這些社會關係的範圍之內，方才有對於自然界的互相行動——就是他們的生產』。(同上)

第三，方亦如同樣機械的把分配關係和生產關係分割開來。他僅僅只認爲分配關係是生產關係之中的一種，而不了解分配關係是生產關係的另一方面，而且對於階級社會這是很重要的方面，因爲他密切的和階級關係聯結着，牠最明顯的表現着階級關係，最直接的決定着革命的任務。不但如此，方亦如還只了解分配關係是剩餘的勞動生產品的分配形式，而不知道分配關係包含着生產工具的分配，而且包含在生產過程的本身之中。所以方亦如對於分配關係的錯誤的觀念，足以使他的理論鬥爭完全和實際的階級鬥爭脫離關係。馬克思對於分配關係的說明是：

「分配的最表面的意義是生產品的分配，這樣，分配和生產的關係是很疎遠的，彷彿對於生產是獨立的。然而分配成爲生產品的分配之前，第一，牠是生產工具；第二，他更進一步的決定這種關係——把社會之中的各份子分配於各種不同的生產（把各個人歸到一定的生產關係方面）。可見生產品的分配正是這種分配的結果，——這種分配是包含在生產過程的本身之中的，而且是規定這生產組織的。……分配關係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係的歷史性質，分配關係不過表現生產關係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分配，和那些從別種生產方法發生出來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每一種分配方式同着牠所根據的，牠所適合的生產方式而消滅」。

（馬克思：資本論卷三）

馬克思主義對於生產和分配的聯繫是看得極重要的，祇有根據辯證法去了解這些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的作用，方才能夠認清社會的經濟性質。像方亦如那種布哈林式的機械主義的了解，自然不能夠不走到極大的錯誤。他事實上是投降了「反革命的先鋒隊」。

但是，他的態度彷彿是個嚴厲的審判官，他的判決辭是：——原告方面（托洛斯基主義）「用商品的存在和普及來決定經濟制度」，固然不對，而被告方面（列甯主義）的反駁，說「要用剝削方式和階級關係來決定經濟性質」，也是不對；應當說「人與生

產工具結合的方式——就是生產方法，是直接決定經濟性質的範疇」。其實，原告方面的任曙本來也是說：「祇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來說明經濟性質」。方亦如不過是遵照任曙的指示，說明生產方法決定經濟性質，經濟性質又決定剝削方式。方亦如究竟是站在被告方面嗎，還是站在原告方面？！

× × ×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極明證的說明：

「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界之間的過程，牠的簡單的要素在社會發展的一切方式之中都是一樣的。然而，這種過程的每一個歷史上的一定方式，都在使牠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方式向前發展。這種歷史方式達到了某種的成熟程度之後，就要消滅，而讓更高級的方式。這種危機時期的到來，暴露於分配方式——也就是同這些分配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歷史上的一定方式——與生產力，生產能力，生產能力的動力的發展，這兩方面的矛盾和對立特別來得廣泛和深刻。那時候，就要爆發生產的物質發展和牠的社會方式之間的衝突」。（資本論卷三）

這裏，可以明顯的看見馬克思學說的焦點并不在於簡單的指出什麼是決定經濟性質的範疇，而在於發見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怎樣經過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而表現出來，並且發見生產過程的本身之中怎樣發展着內部的矛盾和對立，怎樣發展到社會方式的變

更——革命的爆發。分配關係和生產關係之中，最主要的正是階級關係。每一個社會裏面，都有某種的勞動過程的歷史方式，就是方亦如所謂人和生產工具結合的方式；但是，這種勞動過程的物質基礎（生產力），必然要產生相當的社會方式，就是生產工具的分配，照着生產工具的分配而形成的階級關係——馬克所謂『把各個人歸到一定的生產關係』。凡是階級社會的階級關係，都是剝削方式聯繫的。剝削關係決不是僅僅表現於『剩餘勞動生產品的分配』的，牠還表現於生產工具的分配，生產資料的分配。封建關係的表現難道僅僅在於地主佔有農民的『剩餘勞動生產品』？難道不是表現於地主階級的佔有土地——當時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難道只表現於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而不是主要的還在於資本家階級佔有一切生產資料嗎？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正在於說明了這種階級關係的變更的過程，指導階級鬥爭的『真正的口號』。封建制度之下的生產關係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桎梏，那就要爆發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桎梏，那就要爆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的任務正在於消滅舊的生產關係。中國經濟性質的問題的中心，也就在於解決對於革命任務的爭論，爭論的真正內容是：中國封建的生產關係是不是還佔着優勢？封建勢力是不是仍舊佔着統治地位？革命的當前的任務是不是土地革命——消滅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

政權，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方亦如對於中國經濟的爭論，却沒有明白的回答這些問題，而實際上始終暴露了他否認封建勢力的統治。

自然，中國經濟性質的爭論之中，托洛斯基派以及自命爲非托派的孫倬章等等往往有意的無意的夾七夾八的胡纏：有些人說列甯主義者完全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些人甚至於說列甯主義者『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問題當然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中國經濟裏面，是封建關係佔着優勢，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着優勢？

列甯主義說：『這種中世紀式的情形之中，統治的力量是封建殘餘的勢力，是地主的勢力，是地主性的官僚，軍事的以及非軍事的官僚的勢力，他們很特別的和商業資本結合了起來』（斯大林）。封建的地主和商業資本的結合還保存着中國的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關係，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維持着封建殘餘，雖然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已經相當的發展，但是這種階級關係比較起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來，還並沒有取得優勢。

而托洛斯基主義說：中國的地主也是資產階級，中國的統治力量是資產階級；中國已經沒有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差不多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也是無關重要的了，所以現在已經是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佔着絕對的優勢。

方亦如怎麼說呢？他彷彿又是審判官，他說兩邊都不對：

「主張中國資本主義統治論者，如任曙，嚴靈峯，孫倬章諸先生，總是費盡全力，想證明現在中國已經是十足的資本主義，而封建關係只是一點遺影。而主張中國封建制度統治論者，却定要證明到鄉村領導城市，十足的封建黃金時代。據我看來，要正確的把握住封建勢力在現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却用不着誇大其「統治」地位的」。

固然不錯——「鄉村領導城市」的說法完全是立三主義的機會主義，沒有絲毫列寧主義的臭味。但是，方亦如自己又怎麼「把握住封建勢力的作用」呢？他說：

「遺留的封建經濟只在臨死掙扎……單說封建經濟支配中國經濟，也失於太重視牠的作用。幼稚的民族資本是不能支配中國經濟的……單說資本主義支配中國經濟，——這是忽略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質。……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早已用牠偉大的力量，「內在地」支配了中國經濟」。

這樣，方亦如以為既然不是封建殘餘的勢力，也不是中國資本主義，而是帝國主義的「在華經濟」佔着優勢。這算得什麼答案！這不是回答問題，而是迴避問題。

問題本來在於中國在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支配之下，經濟上是封建殘餘佔優勢還是資本主義？而他的「回答」是：——帝國主義！不但如此，他還說：帝國主義「內在地

「支配中國經濟，雖然他申明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應當和中國的民族工業資本分別看待，然而他在這裏完全忽略了階級關係的問題。在階級關係方面來說，他的答案其實是和托派一樣。托派說中國幾乎沒有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他也說不應當重視封建勢力的「統治」作用。他至多不過和孫傳章一樣，企圖對於托洛斯基主義提出一點「修正」罷了。他在這裏企圖做『審判官』，而事實上又是投降托洛斯基主義。

方亦如和托洛斯基派一樣，在階級關係上完全不了解中國現實生活裏的辯證法。

中國現實生活裏，存在着兩種的階級關係：一種是地主對農民的階級關係，一種是城鄉資產階級對城鄉工人階級的階級關係，這兩種階級關係極複雜的互相錯綜着。而且因為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經過軍閥的政治借款和控制稅務機關的手段，經過買辦和商業高利貸資本，在經濟上也維持着中國的封建勢力；又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半封建式的土地關係密切的聯繫着——所以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更加表顯牠的優勢。這並不妨礙中國社會之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化和對抗一天天的劇烈起來。而且因為無產階級的鬥爭，因為廣大的半無產階級的極端窮困化，而農民基本羣衆和地主官僚階級的對抗更加尖銳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民權革命之中也更加容易實現，更加有保障，更加成為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一個有利的條件。對於民權革命之中農民羣衆的革命

作用的輕視，甚至於否認，是托洛斯基主義的特點。中國經濟性質的爭論之中，對於托洛斯基派的立場，最主要的就在於抓住這個問題的中心，去問他們，而且一定要逼住了他們的問。究竟你們承認不承認中國有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這正是必須用階級關係來做中的理由。而方亦如却以為這是「庸俗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難怪方亦如要投降托洛斯基主義了。

列甯說：

「農民——反對着農奴制度、反對着農奴主的地主以及替他們服務的國家——仍舊是一個階級，這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而正是農奴制度社會的階級，就是等級式的階級（註）。我們的鄉村裏既還有多少保存着這種農奴制度社會所特有的「農民」和特權的地主之間的階級對抗，那麼，工人階級的政黨，沒有疑問的就應當有多少站在「農民」方面，贊助他們的鬥爭，推動他們去鬪爭——去反對一切農奴制度的殘餘。

我們把「農民」這個字眼放在括弧裏面，為的是要表明這裏存在着毫無疑問的矛盾：在現代社會裏，農民自然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然而誰要覺得這個矛盾來得奇怪，那他就忘記了這個矛盾並不是捏造出來的，並不是教條上的，而是俄國實際生活本身的矛盾。這不是空想出來的，而是活的辯證法的方法……。」（列

甯文集第九卷第二七五——二七六頁

〔註〕 這裡列甯自己註明農奴制和封建制之下的等級是有相同的意義的。

中國現在的實際生活裏有沒有這種『矛盾』呢？當然有的。農民羣衆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是要由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鬥爭去領導的。無產階級必須清楚的了解小農羣衆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要求，推翻封建關係的土地革命的要求，這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的具體的內容。而方亦如却認爲中國自耕農佃農等的經濟『是封建制度的遺物』！這事實上也是否認封建關係內部的矛盾和階級對抗。他表面上雖然反對托派，實際上是從另一個極端不否認『農民』的作用。至於托洛斯基派，那麼托洛斯基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早就表現在他對於俄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態度。

列甯說：

『托洛斯基認爲，「農民分化了，分成許多階層了，因此，他們的革命的可能性日益減少了……。」』

整個的十年——偉大的十年——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證明了俄國革命是有兩種階級路線，也祇有兩種階級路線。農民的分化加強了他們內部的階級鬥爭，驚醒了許多政治上睡覺的份子，使鄉村的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的無產階級（……）

：）。然而「農民」和馬卡洛夫，羅曼洛夫，赫沃斯托夫（註）之間的對抗加強了，生長了，劇烈了。這樣明顯的真理，就是托洛斯基。巴黎寫的幾十篇文章的幾千句話，也是不能夠推翻牠的了。托洛斯基事實上是在幫助俄國的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這些政治家是在「否認」農民的作用的名義之下表現不願意引導農民起來革命！

而這正是現在的問題的焦點。無產階級鬥爭着，並且將要澈底鬥爭着——爭取政權，爭取共和，爭取沒收土地，就是要吸引農民，要盡量發揮他們的革命力量。要使「非無產階級的」羣衆來參加鬥爭——爲着從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俄皇制度）之下解放資產階級的俄國。而這種資產階級俄國的脫離俄皇制度，脫離地主的土地權力而解放，無產階級立刻就要利用起來——並不是爲着幫助富裕的農民反對農村工人的鬪爭，而是爲着同滿洲無產階級聯盟而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

（列甯文集第十三卷第二一〇——二一四頁）

〔註〕馬卡洛夫等是指着地主階級說的。

中國的托洛斯基派對於自己的領袖和主義，是很忠實的。他們很努力的要想「證明」中國的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佔優勢，像孫倬章那樣甚至於說中國的佃農也都是資本家（見讀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他們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他們說中國

「將來的」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他們主張托氏的『不斷革命論』。所有這些「左傾」空談的目的，完全是在於掩飾他們的孟塞維克主義和反革命的實質：取消土地革命，取消民權革命，反對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勝利，反對工農民權獨裁，否認現在的革命高漲——來辯護他們的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他們事實上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為他們否認中國『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所以對於推翻地主的農民羣衆，對於這些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羣衆，要竭力的反對，甚至於跟着統治階級罵他們是匪徒流寇。因為這樣，他們也就反對工人的革命鬥爭！自然，他們將來也一定是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敵人。

方亦如的立場怎麼樣呢？他站在否認階級關係是決定經濟性質的範疇的立場上，勢必至於投降托洛斯基主義。他說：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論是中資或外資，當然是促使封建經濟的崩壞的。牠們是成反比例的。資本主義發展一步，封建經濟就破壞一步。可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這樣機械。資本主義，不論是『從外鑲』或『從內在』的原因而發生，總之是在封建社會內漸漸的發達起來的」……

原來方亦如和托派的分別，只在「漸漸的」這一個字眼！他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根本不了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半封建的土地關係的聯繫。照他的意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一步，中國的封建經濟就破壞一步。這樣，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竟是反封建的極偉大的進步的力量了。同樣，中國「資本主義更是革命的力量了。托派說，中外資本主義已經推翻了封建制度。而方亦如說，不要心急，中外資本主義是要這樣漸漸的一步一步的推翻封建制度呢。

因此，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照他說來，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時期的封建社會」。這等於沒有回答問題。中國的封建制度當然是在衰落，而且不止是在衰落，而是已經開始崩潰，已經有許多省份裏面被農民的土地革命所推翻。問題是在於推翻封建關係的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農民羣衆，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中國當然是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當然要開展中國的商品經濟等等……問題是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維持中國的封建關係的，還是「推翻封建關係」的！

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反動，就是在經濟上也更加適應着帝國主義的殖民化的政策，適應着軍閥官僚的壟斷政策。雖然中國的小工業資本家繼續着種種發展的企圖，——這是在一般情形之下自然的現象，然而總的發展傾向是：中國工業的大破產，民族資產階級的非民族化——買辦化。而

且，中國民族工業受着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受着帝國主義軍閥的箝制和搗亂，受着廣大的幾千萬幾萬萬羣衆窮困化的影響而找不着市場——受着購買力降低的巨大的限制，所以一天天的移出自己的資本，放到田地上去，放到都市的地皮上去，放到包捐包稅的公債上去，這種民族工業資產階級的非工業化——投機化，封建地主化的過程，是可以以用鐵一般的統計數字來證明的。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固然發展着資本主義的關係，然而這些資本的積累，極大部分是加強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投機式資本的。這並沒有改變對於農民的封建式的剝削，反而更加加重這種剝削。產階級的收買田地，並不是拿來經營資本主義的農場，而極大多數且繼續封建式的租佃關係。這樣，中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密切聯繫的，他們不特絲毫爲什麼『推翻封建制度』的力量！『農民』和地主的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仍舊保存着，加緊着；在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的結合之下，這種階級對抗而且特別的尖銳化。

『中國鄉村裏，這種最初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很特別的和封建的統治結合起來，和地主的統治結合起來，並且還從地主方面採取對於農民的十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軍閥制度，督軍省長，現在的惡魔強盜似的一切種種軍事官僚和非軍事官僚——就是中國這種特別情形的上層建築。而帝國主義贊助並且鞏固這種封建官僚的整部機器。』（斯達林和中大學生的談話——一九一七年五月）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表現於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銀行，鐵路，輪船，礦山，工廠……這是早就指出的重要問題，並用不着方亦如來發見什麼「新大陸」，說什麼不應當「把帝國主義的在華經濟擠斥於中國經濟結構之外」。問題就在於帝國主義經過這些經濟命脈，主要的是開展着中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而阻礙着中國的工業化，而且，還在竭力的維持着，鞏固着中國的封建官僚。怎麼能夠說「外資的資本主義」是在「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漸漸的」消滅封建制度呢！

關於商業資本和工業化的關係，最好看一看馬克斯說的話以及列甯的解釋：

「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程度却成爲反比例」（資本論卷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發展得越厲害，工業資本（資本主義生產）就發展越薄弱，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列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既然贊助着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結合的中國軍閥制度，也就阻礙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托洛斯基派用商品經濟來決定中國封建殘餘已經不是統治的力量——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爲他們根本上就是反馬克斯列甯主義的。他把帝國主義和民族工業資本主義「一視同仁」，把商業資本認爲是和封建殘餘不能并存的東西。而方亦如也根本不了解商業資本和工業化的關係，因此，事實上跟着托派反對「封建統治論」！

x

x

x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是臨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場力的在殖民地上找尋自己的「出路」——商品的銷場，原料的供給，「多餘資本」的容納。尤其是「多餘資本」的輸出，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可是，這個「出路」對於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死路。因為帝國主義擴大着中國的商品經濟，極端劇烈的加強了幾萬萬小農和手工業的破產過程，就造成了廣大的出賣勞動力的後備軍；同時，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一小部份的最初積聚的資本（官僚的，買辦的，商人的，地主的……）不會不投入小小的工業裏去；而且帝國主義自己所需要的交通事業（鐵路輪船等等），原料採取的工業（礦業）以及原料改製的工業，隨後，還有一些消費品的輕工業也因爲利用廉價勞動而發生出來。這樣，中國就發生了無產階級，以及極其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還有很多的脫離生產工具而又賣不出自己的勞動力的貧民羣衆。這是帝國主義自己造出來掘牠墳墓的中國無產階級。而帝國主義「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所造出來的中國資產階級，却是非常之微弱的——工業資產階級不但很少，而且和封建關係密切的聯系着。中國的工人和資本家的階級對抗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就是一切被雇用的工人，從嚴格的工廠無產階級一直到苦力雇農，以至於部份的依賴工資生活的半無產階級，形成了中國的工人階級，而同時，雇用工人的人之中，却只有最小部份可以算做嚴格的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外國帝國主義，官廳，軍閥，以及臨時僱用苦力的商人等等

……要佔着雇用工人的人的極大部份。勞動和資本的階級對抗是在極端的劇烈起來，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却受着了巨大的束縛，尤其是民族工業的獨立發展被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嚴厲的阻礙着。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工業資本）發展的矛盾。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客觀上也不能不一方面把中國一部份一部份的抓進自己的經濟機體裏去，做牠的附庸，別方面正就因此而造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

中國的社會，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只能夠保存着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維持着封建勢力結合商業資本的中世紀式的剝削關係，適應着帝國主義的需要而開展資本主義的關係，雖然因此而引起了一些工業資本的發展，可是，封建殘餘的勢力仍舊佔着優勢。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前途，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就只有殖民地化的道路：就是列強帝國主義互相搶奪着，分配着中國，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主要的是保持封建勢力，只在形式上改換一些，使牠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而工業的發展是只能夠在帝國主義所容忍的範圍之內的。這種前途，必然的引起極劇烈的經濟恐慌，直到現在的全國國民經濟崩潰的情形。幾萬萬羣衆的飢餓，死亡，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保持自己的收入的代價。

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的基本羣衆的土地革命，徹底的完成民權革命的任務——解放中

國，推翻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建立工農民權獨裁，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而中國無產階級的特殊地位，他的領導權，一般的國際和國內的條件，都足以保障「革命轉變」的鬥爭的勝利，而開闢中國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道路。

托洛斯基派反對列寧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和「革命轉變」的學說。這正因為他們不但否認中國有「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並且否認無產階級的力量和領導權。方亦如的論調只是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

至於中國農民羣衆和地主階級的鬥爭之中，現在半地主的富農和一般富農已經在反革命方面，無產階級就要堅決的領導農民羣衆去反對富農，那麼，這正是保障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有利的條件，而並沒有「取消」什麼民權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取消」農民羣衆和地主的階級對抗。而且這正可以有利的影響到革命轉變的速度。

一九三二，五，二一。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席上莫洛托夫報告——

九八

一 過去一年中的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

同志們！照例年終，我們應將一年的結果總結一下。一九三一年在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的結果，都給與我們以重大的教訓。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遭遇了極危險，和與日俱深的危機。這些國家表現了更進一步的衰落，他們限制生產，停止建設的活動，千百萬的飢餓的工人們，被驅逐到街市中來。

同時在蘇聯中，經濟的發展，生產的增加，仍舊繼續着空前的速度向前進展。在這一時期中，產業會向前邁進一極大步。建設工作不僅在舊有的並且在新建設的經濟部門中，都有發展。城市和農村中羣衆的生活亦改善不少。

資本主義國家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發展道路之不同，也更明顯。資本道路是危機，經濟衰落，和民衆極端的困苦；而社會主義的道路，是生長，經濟發展，和城市及農村廣大羣衆地位根本的改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目觀千百萬失業工人

的隊伍，城市及農村中飢餓襁褓的羣衆，正在一天一天的增加。而在蘇聯，我們已消除了失業問題，並終結了農村中勞動羣衆的分化和貧窮。

今試摘錄最近幾天柏林一個資產階級科學團體所發表關於去年事件的推測的一文以資參考。

商情研究社對於一九三一年第三季商業發展的觀察，一般的說明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別說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加緊，係通幣及信托危機的結果。

這篇文章寫道：

「佔全世界貿易的大半數（百分之五十四）的三十九個國家，發生了通幣的危機，或是立時受了這個危機的恐嚇。因為信托界中危機加緊的結果，以致最近幾月來世界經濟地位，更形衰落。除蘇聯外，一切國家的工業生產，繼續低落。指數由六月中之八三。三，降到十月中的七九。四（係以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百）」。試將其對於一九三一年第三季的觀察，摘錄如下：

「因為這樣重新低落的結果，世界貿易致降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線」。就是說，降到二十年以前的水平。「幾乎所有歐洲各國的進口貿易，都降低了（此係指第二季和第三季的比較，V.M.註）。祇有蘇聯，能夠增加了他的進口貿易，甚至超過前一年的較高的水平線」。

「第三季，除蘇聯以外，各國經濟的活動都更向後退。……」「美國也是大受聯帶的銀行和信托危機的影響。在最近將來，亦無改善的希望。……」「人們不能憶料，這種後退可以停止的」。

關於英法及其他國家的情勢，還可摘錄出同樣的詞句來。

最後請更摘錄關於一九三一年德國經濟形勢最重要的數目字。

①德國工業生產降落到一八九〇年的水平，就是說降到四十年前的形勢。

②在德國整個工業生產中，重工業從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九降到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五，這是毀壞了工業和整個國家經濟的基礎。

③新建設中的投資今年只有四十五萬萬馬克，而一九二八年却有八十九萬萬馬克。最後三年來的投降資，一年中似一年，這使得德國的經濟要停滯好幾年。

④德國工人人口的收入，今年較之去年要少六十萬萬馬克。如將德國工人和雇員的薪金總計起來，那末從一九二九年的四百三十萬萬馬克，降到一九三一年的三百三十萬萬馬克到三百四十萬萬馬克。這就是說，兩年中減少了九萬萬到十萬萬馬克。

⑤德國國家收入，從一九二八年的七百五十四萬萬馬克，降到去年的五百五十萬萬馬克。

報紙上揭載現時德國工人的物質生活情形，舉例一二。至於所揭載的，

都是最近幾天的事實。

「一家木廠，有一個四十一歲的高等技術工人，他已經結了婚，並有三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九歲，另一個十一歲。在一九三〇年夏季，他每星期可以獲得七十馬克，以後他的工資便日見低落，現已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另外，每星期只能做二十四小時的工。因此，每星期工資只有二十六到二十八個馬克。除去房租，只剩下十二到十四馬克，以維持五口之家的食物，燈火，燃料，衣服等項用途。他的結果，顯而易見的是，舉家只有忍飢受寒」。

另外一個例子：

一個皮工（他是一些僥倖仍能完全受雇的工人之一），去年每星期能獲六十馬克，但是現在只有四十八馬克。他已結婚並須供給他的跛腳的父親。除去房租和一些強迫繳納的捐款等，只剩二十馬克一星期以維持三個人的生活。（*Jawegsta* 報十二月九日載）。

這一類和相似的例子，無疑義的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兩個工人的生活情形——木工和皮工，——是現在德國千百萬工人的例子，其實也不僅在德國，就是其他國家中，也是一樣的情形。人們應記着，在德國及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有千百萬的失業工人，他們受到為數極微的救濟濟，甚至常時一點救濟也得不到。

上面所引的例子，充分的表現德國經濟衰落的发展，及危機反映到工人羣衆中，而使他們感受極端貧窮到何種可怕的程度。不僅德國——一個戰敗的國家——的國家經濟和民衆，已被危機毀壞到這種淒慘地位，就是其他一切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順着這同樣的低落的路徑。

我再引證一些最近說到南美洲一個大國巴西情形的報告。巴西有四千二百萬人口，三千萬人民正在慢慢的死於飢餓。巴西公共衛生局局長彭羅宣稱，「這三千萬人民是死於飢餓，梅毒和瘧疾」。巴西是世界的咖啡供給者，現因市場萎縮，也受到極悲慘的危機。結果一個工人整個的家庭受雇於咖啡場，而其工資，每月降低到十六先令。糖廠紡織工廠及皮鞋廠的工資，一天只有六辨士或一先令。

幾十個資本主義國家都發生危機。歐美或世界任何一部分，沒有一個國家內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不陷在經濟危機當中，結果工人羣衆，沒有不感受到貧窮的恐嚇。這便是一九三一年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果。

我們國家內的工人們，很難想像到千百萬工人的家庭，現在是處在這種可怕的情狀下面。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情形，和蘇聯的工人們生活情形，區別是太大了。對於蘇聯內的多數工人，不能用統計圖表數目字等材料，來傳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事件，使得他們得着一個適當的概念。特別對於我們的青年人們。他們向來經歷過在嚴重經濟

危機的環境中，那種可怕的生活情形。我們要使得他們了解這種情形，較為適當的辦法，是用資本主義統治下，工人現時生活的實際狀況來向他們說明。

在蘇聯去年因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使得我們國家經濟得到更進一步的改善。此地的工人生活，因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力之強有力的增長，而一年一年的改善。

過去三年是五年計劃初實施的幾年我們的工業生產已獲得下列的發展（採集各部門工業的材料並不完全）。

一九二九年生產增加三十二萬萬九千六百萬羅布，一九三〇年增加三十六萬萬三千五百萬羅布，一九三一年則增加到四十一萬萬三千九百萬羅布。假使我們把工業生產，整個的收入計算起來，那末，一九三一年，就超過四十八萬萬羅布。

這幾年工人家庭收入增加的數目，也很值得一說的。數目字表示出工人家庭每月的收入，從一九二九年初的八十九個羅布，增加到一九三一年終的一百四十六羅布。

這就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僅是去年，工資平均增加百分之十八。鎔鐵工業和礦業的工資，一九三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六。鐵路和水上運輸工人工資增加特別的高（增加百分十五到五十）。還須說到的，即一九三二年開始，學校教師及醫生等薪金，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到二十五，並且這類勞動的工資，還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

最後有關於一九三一年的結果，便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工人活動力之異常的增高

，却是很重要。這可由工廠作坊蘇維埃地產及集體農場中的社會主義競賽，和衝鋒隊運動的增加表現出來。在今年年終時，衝鋒隊的組織，計二十萬組，而工業中工人的隊員有三百五十萬。

一九三一年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比較，事實的本身已經說明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經濟地位，異常降低，以致許多改善資本主義發展的預言，都歸泡影。

再者特別重要的，便是一九三一年的結果，並不能給與一九三二年資本主義國家，以任何佳兆。不僅是不能預示他們可以從危機中振拔出來，並且却巧相反的，危機是更形深入，而工人們生活情形，是愈變愈壞。

我們有許多關於這一點的最近的事實，是值得一提的。現在很快的已打破社會民主黨中資產階級的奴才們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成功幻想，第二國際的領袖，如希而佛定一類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已破壞無餘。又如他們所謂「左傾」的領袖，如委士鮑益爾一流却企圖使他們自己，能適合工人們的口味，於是對於最近成熟的事件，而加以種種似是而非的曲解，如下列所舉的一類說話：

「看呀！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動搖了」，「大解決的時間已經接近了」等等。正像昨天他們所說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一樣，今天他們又叫出「左傾的」動搖的資本主義的語句來，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想借此以愚弄工人們，阻止工人們真正和資本

主義作賊。

當然不是的！當一般資產階級的領袖們都喊出這樣的呼聲，難道鮑益爾還不應該說動搖的資本主義這一類話嗎？不久，英格蘭銀行總理諾曼發表他給法蘭西銀行行長毛壽的一封信。諾曼在這一封信中說道：

「除非採劇烈的方法，那末，整個文明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年中便要崩壞。我希望這一預示在將來回憶的時候，可以實現」。

我們來實現這一層，好讓他去回憶。（聽衆大笑）

另一方面，在蘇聯一切事件都是繁榮的。當資本主義基礎的裂痕，一天一天擴大的時候，而在蘇聯國內，一九二一年，我們便可看到社會主義基礎的完成。在這一年，社會主義建設部門，不僅在城市，即在鄉村中，都顯出很重要的作用。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便很鞏固的建設好了。

但是我們應當記着列甯的說話，就是我們不可讓成功把我們弄昏了。

真的，蘇聯中社會主義成功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可是，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人，應當記着列甯在他五十歲的那一天說的那一句話，他說：「不應當使我們的黨，成爲自誇自大的黨」。列甯教我們不要看到已獲得的成功，即認爲滿足。我們還應當用加倍的無產階級的小心，和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去克服那些階級的敵人，仍然有不少的抵

抗的表現。

二 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

發展蘇聯國家經濟的五年計劃，是一九二九年春季最後採用的。一九二九年是執行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工人階級完成了第一年的五年計劃的任務，結果引起工人羣衆的熱忱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第二年的五年計劃的任務，同樣的又執行了。同時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我們便開始了不應五年，而是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信心。

去年是五年計劃的第三年，在我們經濟建設中，又得着新的驚人的成功。

(一) 工業方面五年計劃的執行

一九三一年在許多工業部門中已完成了五年計劃。在一些極大的工業部門中，如石油、電氣機械、曳引機的製造及工廠建設已於二年半到三年中即執行了五年計劃中的規定。報紙上已發表了關於這一類的報告。另外還要提到的，即我們列甯格勒，大工業中心，實際上也完成了五年計劃中的工業製造。

現在我們可以把三年中對於五年計劃執行的結果總結一下。

我們看到工業生產的任務方面（根據不完全的材料），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二

九年），已執行了百分之一〇六，第二年（一九三〇年）百分之一〇七，第三年（一九三一年）百分之一一三。縱然在今年，有許多工業部門，并未能完成他們的生產計劃，但是我們已獲得這樣的結果了。從這些不完全的材料中，我們看到在這三年，不僅已完成了五年計劃中的工業生產計劃，並且還超過了。至於超過五年計劃規定任務的範圍，是一年增加一年（六%、七%及一三%之比）。

這三年中對於執行五年計劃獲得的結果，便使我們決定了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任務。結果可以較第五次蘇聯會議所決定的計劃早一年成功。即是說在四年內我們工業生產便可達到五年計劃最末一年所定的標準。

末一年（第五年），規定工業生產共值二百零四萬萬五千五百萬盧布。我們現在知道，一九三一年工業生產，已值二百二十一萬萬五千九百萬盧布（統計不完全），這已達到百分之七三。所以縱然我們對於進展的工業生產計算並不完全（例如計算時發展很快的整個食品工業即未計算在內），但是在一九三二年要完成五年計劃，只須較去年在工業生產方面增加八十二萬萬一千六百萬，就是說一九三二年我們應增加百分之三四·七，可是同時我們的計劃，却應增加八十五萬萬盧布，就是應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這便是說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的經濟計劃，不僅是完成五年計劃中第五年的工

業生產任務（即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四·七），並且還要超過五年計劃的任務，即是較一九三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六。這表示工業生產要較之戰前增加了差不多有四倍。在輕工業方面，一九三二年恐怕要較五年計劃所規定的第五年的生產計劃要落後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在重工業中我們却較五年計劃末一年的生產計劃，要超過許多。

此地所提的工業生產的數目字，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只包括五年計劃中一部份的工業（按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價格計算）。這些數目字不包括整個的工業生產，例如一部份的木材，肉類，磨穀菜蔬，水菓牛油，家禽的蕃養，咖啡的代替品，酒和酒精類等各種的工業生產，都不包括在內。假使我們要把整個工業生產都包括在內，那末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生產的數目字大得多。

最近對於整個工業生產的計算，表明一九三一年計值二百七十四萬萬盧布，一九三二年計值三百七十五萬萬盧布。縱然我們沒有精確的計算只將五年計劃末一年的整個生產加以大極的數字，可是我們必然的得着一個無可辯駁的結論，即是一九三二年的計劃，在工業生產方面，結果要超過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

說到工業投資，我們很快的執行了。五年計劃五年中整個投資的總數，係一百三十五萬萬盧布。

而在三年中工業方面的投資計算起來，已達一百二十三萬萬盧布，這便是說頭三年

中投資的數目，差不多已抵得上整個五年中所擬定的投資總數。（並且現在所計算的三年投資數目字還不完全）。四年中工業各部門的投資（數字不完全）將達到一百二十三萬萬盧布，那末，雖然我們的計算不完全，可是四年中的投資，已達到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九五〇。

假使我們把頭三年的投資總數的一百六十萬萬，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一百零七萬萬盧布，那末，四年中投資的總數，便達到二百六十七萬萬盧布。這便達到五年計劃中投資總數的百分之二〇〇。這是最後勝利的保證，社會主義偉大前途的保證。

爲提起人們重視這一點起見，我們便應迴憶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整個工業方面的投資，只有四十四萬萬六千萬盧布。雖說這個數字也不大準確，但是人們一定應承認，現在投資較之戰前大得多。

五年計劃中整個的投資 對於國家經濟的社會主義部門，規定爲四百七十萬萬盧布，但按之一九三二年的計劃，那末四年中的投資的總數已達到五百四十萬萬盧布，所以投資方面，我們已超過百分之十六。

一九三二年的計劃，係按照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而集中力量在一些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如冶金工業，燃料工業（特別是煤）機器製造，特別注重的是鐵路運輸的機器製造。

先從冶金說起，一九三一年我們在生產任務方面是落後的，並且還反映到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二年的計劃，着重在鐵的生產，但是還不能完成整個五年計劃。

按照計劃 冶鐵工業從一九三一年五百萬噸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九百萬噸。這個計劃很注重到冶鐵工廠 去年的經驗表示出，我們并未能着重全力在冶鐵工廠的建設。對於還在建設中的企業方面的幹部和技術的供給，往往仰仗於已經工作的企業 這是不能允許的。

冶鐵工廠生產的增加，已規定於整個計劃中，但為完成這一個任務，必須利用全黨的力量。可是我們不僅要完成這一任務，並且必須超過這一任務。

一九三二年冶鐵業的投資，也曾成立一很大的計劃。冶鐵業的投資，將近二十萬萬盧布。至在其他工業部門，向未有投資如此之巨的。我們準備在今年建築二十四個鎔鐵爐。這真是一個極偉大的任務。我們想這些新鎔鐵爐更要引起別個國家中冶鐵工業的衰落。雖是資本主義國家較我們的冶鐵工業為優勝，但在一九三一年，僅在美國（從一月到九月）便停熄了二十九個鎔鐵爐，法國停熄了二十四個，德國停熄了十四個。而在蘇聯，恰巧相反，一九三二年，却有二十四個新的鎔鐵爐開工。（聽眾鼓掌）

一九三二年煤的生產計劃，係九千萬噸煤。我們認董納斯和庫斯納斯為主要的煤

的生產區域。但同時也注意其他區域，特別是烏拉爾和靠近莫斯科的區域。一定要在最近期間，使靠近莫斯科的煤區能夠成爲莫斯科主要的燃料供給場所。

一九三一年，我們已特別注重於燃料問題（煤和石油等等）。蘇聯一切的工廠和國內很遼遠的區域，却對於董納斯煤的產量的增加，抱有極大的興趣。煤的生產機械化，是包括在一些大經濟任務之中，可是這一方面的發展，還是不夠。董納斯現在還有三分之一的斫煤機器未曾應用。勞動生產量的增加，還是慢到不可容忍的程度。結果，對於技術的嫻熟，我們還是不能滿意。

幾天前「工業化 Sa Industrializatsiya」報上曾登載今年在董納斯工作很勤的科希委同志的一篇文章。科希委同志特別注意到勞動者的生活和組織的問題，是很正確的。他指出他的注意焦點，即在礦山中，和供給礦山機械的工廠中對於機械化執行，都不充分。他又說到煤的運輸機械化，較之斫煤的機械化，更形落後。按照他的意見，機械化的發展，可以把董納斯礦山中的工人，從一九三二年計劃裏所規定的四十萬人中減少五萬到十萬，那末，對於改良工人的生活，更要容易實現些。如果工人的生活和組織（消除缺乏個人負責任的缺點和實現工資的劃一。）不能改善，我們便不能達到生產計劃中的目的。

九三一年，董納斯有幾個很努力於採用煤的生產機械化的同志，他們幾個人的名

字，已傳播全國。如伊皮范契夫，卡特希夫，科鎖羅夫，黎伯哈德和菲律摩羅夫以及幾個著名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他們已獲得列甯獎勵，因為他們是實行機械化的先鋒隊，所以董納斯的工人們提升他們做很負責的工作。將來這些要升遷的工人們，一定可以得着適合於新式技術，和加速執行生產計劃的一些應有的幫助。

在農業和交通以及一些其他工業中機械化的問題，還是極重要的。我們應當承認，在這一方面，我們有些時候的進步，還是很慢。我們評判木材工業土煤的生產等等方面的機械化施行的程度，應當按照機械代替手工的發展速度，勞動生產力的實際增加，和生產計劃的執行狀況去評判。

鑄造工業，燃料生產，運輸機關的供給等等，還是需要我們機器工業有更進步的和更適合的發展。

機器的製造，在五年計劃頭三年中，已有長足的發展。沒有其他一部門的工業，有機器製造這樣發展得快的。我們拿引擎機關，渦輪，鋼鐵廠，斫煤機器，輪船上所用的狄賽爾發動機，大無綫電站，起重機等等部門的機器生產，便足以說明他發展的速度。這在技術熟練方面，是蘇聯工人階級最重要的收穫。

斯達林格勒和卡科夫引擎機關製造廠的情況，是特別可以引以為訓的。斯達林格勒的引擎工廠，在開始的幾個月中，曾經遇着很大的困難。最高經濟委

員會會屢次的去加以援助，而全黨也很快的去幫助建設這個工廠。結果，最後幾個月
中，這些困難都克服了，而斯達林格勒引擎廠，每天不斷的能出產一〇〇到一一〇個引
擎機關。卡科夫工廠，竭力引用斯達林格勒的經驗，後來不僅在最短的十五個月中，
完成工廠的建設，並且在引擎機關製造的技術熟練方面，也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模範。

斯達林工廠，在開工後頭六個月中，共供給了三百五十六個引擎機關，而卡科夫在
開工後第二個月，便完成了三百八十六個引擎機關。這便證明斯達林格勒的經驗，我
們並沒有放棄掉，並且我們對於技術熟練的學習，反得着很大的成功。

技術熟練的鬥爭，對執行五年計劃，是很重要的。整個的社會主義建設，便大半
靠在這一方面成功。

從前我們在技術熟練方面，還是依靠外國的人才，這在次等的經濟建設工作中，最
常時看到的。但在最近幾年來，却有了很顯著的變動。在一些重要工業部門中，我
們所不能仰仗資本主義國家，而在技術方面，可以獨立了。如引擎製造，鋼鐵廠，便
可證明我們對於技術熟練的進步，已達到何等的程度。現在我們特別的是需要鍊鑄高
等鋼鐵的技術的熟練，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不致遭遇何等難以克服的障礙。

在這三年中五年計劃的執行，並沒有虛費時間。可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們應對於
訓練青年，和發展整個技術的熟練，更要有進一步的。

因爲在整個國家經濟中，工業居於首要的地位，他的作用很大，所以我對四年中執行五年計劃的問題，而對工業方面說的很詳細。一切國家經濟部門的發展，都依靠着工業，依靠着五金燃料機器工廠和工具等。

(二) 農業方面五年計劃的執行

如技術方面沒有轉變，如沒有引擎機，播種機，收穫機，犁田機，和打穀機等，那末，整個農業的轉變，是不可能的。我們在這三年中，執行五年計劃時，對於這農業機器製造方面，成功很大。除供給小規模私人農場方面所應用的舊式機器外，農業機器的製造，曾獲得很好的進步，並達到超過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一般速度。在一九三二年，我們的農業應採用新式機器，所有新引擎機，計一百萬匹馬力以上（我們斯達林格勒，蒲鐵羅夫和卡科夫工廠裏所製造的引擎，還不包含在內），另外我們所應當製造的農業機器，內中大部分都是穀類棉花蘿蔔蒜薯等的收穫機，總值計九萬萬盧布。

在農業轉變時期中，機械站和引擎站所占的地位是很重大的。在五年計劃執行的頭三年中，機械站和引擎站，是集體農場中最普遍和最需要的組織。

在一九二九年，馬克艾維斯雖同志在烏克蘭謝維清科蘇維埃農場纔開始組織機械站和引擎站，并推廣到各地。到五年計劃執行的第三年，因引擎聯合總站的設立，各地的機器站和引擎站便有了一千四百處。一九三二年，更要設立一千七百處。因此到

五年計劃執行的第四年，我們便有三千一百處機械和引擎站。蘇聯有二千五百區，那末，這三千一百所的機械引擎站，可以滿足每區一切重要集體農場地段的需要。

構成鞏固的技術基礎，並在聯合總站指導下面的機械引擎站的驚人的發展，已如上述。雖然，在實行方面有許多缺點，可是機械引擎站在提高農業生產中，總是具有重大的作用的，並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將來還有更大任務。

機械引擎站的過去工作經驗，在經濟建設中，已開始佔有他的地位。

在去年，約有二百所刈草的機械站，已經成立起來，並證明他們的組織是很有利益的。現根據機械引擎站的經驗，我們承認伐木的機械站的建立，也很需要。在最近將來，我們並要組織摩托化的漁站。在這些特殊的經濟部門中，都可以利用農場機械引擎站的經驗，當然同時，我們要注意到各區域各生產部門的特殊狀況。

機械引擎站的組織建立是表現國家組織和合作社的集體農場之間的關係重要，而站在便利和加速小農羣衆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便更重要了。

集體牛乳場的建立，因有國家的幫助，曾獲得很好的結果。這方面，還需要國家的援助，和集體牛乳場本身的努力。

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口號，實現到何種程度呢？我們知道，說到農業集體化，我們已老早超過五年計劃第五年的計劃。按照五年計劃，在五年中百分之二〇的農民

田地，應集體農場化。可是在五年計劃的執行第三年末，我們已聯合所有農田百分之六〇到集體農場中來。那末我們第三年年末已超過整個五年計劃百分之三百。在重要的產穀農區集體農場化差不多已近完成，無疑義的，到一九三二年，在整個蘇聯的集體農場化都將完成。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已指出我們應集中注意於集體農場有組織的經濟的鞏固，和農民公社及阿特爾中有組織的工作。我們不要忘記集體農場非常迅速的發展中，有好幾百萬的新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還不能夠克服他們小有產者的習慣和眼光。所以應用社會主義教育去教育他們，並應使一般集體農場的農民羣衆，能保證他們自己執行集體農場對國家的責任，——最主要的是交付農產品。這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在農村中的中心任務。

說到蘇維埃農場的發展，我們同樣的也已經超過五年計劃的規定。穀類生產網牲畜飼養網以及一些工業原料植物的種植，都發展得很快。在整個國家集體農場化的當中，蘇維埃農場所起的作用很大，變成爲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唯一組織者。我們必須堅決的肅清穀物托拉斯和糖類托拉斯的蘇維埃農場中工作遲緩的大毛病。同時對於蘇維埃農場供給問題的機會主義者的動搖，也必須加以最堅決的反抗。

對於五年計劃規定的擴大種耕面積的任務，已執行到何種程度呢？五年計劃規定

在第五年末必須耕種一萬萬四千一百公頃的田地，而這一個任務在頭三年我們執行了。

我們現在耕種的田地，有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公頃，而一九三二年計劃，更要增加一萬萬四千一百萬公頃。這證明了四年中便完成五年計劃。

穀類的種植，到一九三二年我們還較原來計劃要落後一些（我們只達到計劃的百分之九五），不過謝謝集體農場發展的成功，我們國內的穀物供給問題，已解決了。但在另一方面，在執行五年計劃的第四年，我們已超過所規定的關於工業原料種植的計劃（計超過百分之三三）。但是我們必須補充說明的就是我們不僅應注意耕種面積的擴大，並且應注意到收穫的鬥爭——增加收穫量，和收穫組織的工作。

我們雖說已解決國內穀物的供給問題，同時原料植物的種植也超過原定計劃，可是牲畜飼畜還是落後。

我們現在必須集中特別力量，去增進牲畜的飼養因為這和建立鞏固的草料根據地問題有聯繫，同時我們更應加速的發展工業原料的種植，所以增加蘇聯的穀類的生產，還是我們整個工作中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另外在今年許多農業區域，如瓦爾加河中部和下流區域，烏拉爾，克河克斯坦，和西比利亞西部所發生的旱災，已喚起我們對於這類自然災害鬥爭的注意。十年前西部和北部因旱災而受害的農民有好幾百萬之多，當時我們的力量還不夠和這種自然災害做

鬥爭，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用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付與蘇維埃政權以反抗天災的任務。

最後，我要說到農業的投資。在一九三二年，農業的投資要從三六萬萬羅布增加到四三萬六千萬羅布。這個增加資本的計劃，保證四年中我們已大大的超過五年計劃中投資的提議（計超過百分之六五）。

從上面我所說過的話裏面看起來，蘇聯無產階級對於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不僅已完成並且還超過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任務。一九三二年的經濟計劃，不是說要在五年中而是要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

（三）運輸方面五年計劃的執行

我們對執行五年運輸計劃有些地方還是落後。在頭三年中，還有許多任務未能完成。

在一九三一年，全黨都努力和運輸工業中所發現的一些大錯誤鬥爭。特別是對於工業組織方面，如機關車和客貨車的處理缺少個人的負責和不同等的工作付給同等工資等。另外我們現在應鞏固技術的根據，進行改造運輸工業，特別是改造鐵道運輸的重要任務。

在一九三二年，大規模的運輸工業的建設，即將完成。除去從今年起採用動力較大的機關車，載重力較大的客貨車，電力機關車，油發動機，和自動聯結機關外，對於

火車運輸一些重要部門急於改善的關鍵要點，即平素所謂「細微工作」，也極應注意。

在一九三二年鐵道，水路運輸，道路建築，航空等項投資計值三十三萬三千萬盧布以上。在鐵路方面的投資，係集中於發展自莫斯科到唐霸興和自唐霸興到各處的路線以及莫斯科——莫格利托哥斯基——庫斯納羅克的路線。

(四) 勞動人口，工作和生活狀況方面的五年計劃

說到蘇聯工人羣衆的地位，我們在四年中已大大的超過了五年計劃的規定。

首先我要說到國際經濟組織中所雇用的工人數目的增加。按五年計劃，第五年所雇用的工人爲一千五百八十萬，在一九三一年，我們所雇用的工人已超過此數三百萬，即達到一千八百七十萬人。一九三二年按諸計劃更將增加到二千一百萬人，這就是說四年中我們超過原計劃百分之三三。

工業中雇用的人數，原定爲四百萬工人，但在第三年末，已達到五百四十萬人。

在第四年，結果將增加到六百二十萬人。說到幹部的僱用，四年中將超過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五二。這便是說明蘇聯的最強健的擁護者——工人階級——增加得飛快，而工人階級在我們國家的整個生命上所負的重任，也是一天增加似一天。

爲說明蘇聯工人和僱員的生活狀況改善起見，我只稍說出三件事實來。即是工廠中工人的工資，勞動保險，和工作時間。在這三方面，我們已超過五年計劃的規定。

按五年計劃，最末一年整個工資準備金爲一百五十七萬萬盧布，事實上在一九三一年我們的工資準備金已達到二百一十一萬萬盧布。至一九三二年，更將增加到二百六十八萬萬盧布。結果四年中我們已超過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工資準備金到百分之七十一。這些數目，已經證明工資的增加。

五年計劃規定最末一年的勞動保險的預算，爲十九萬萬五千萬盧布。事實上在一九三一年我們的勞動保險已達到二十五萬萬盧布。三年中已超過了五年計劃的規定。明年勞動保險的預算，將達到三十四萬萬九千萬盧布。可算我們要超過原定計劃的兩倍。

五年計劃，本規定最後一年實行七小時工作制，事實上在第四年，我們已完成整個工業中七小時制的採用。

最後提到工人居住的房屋的建築，和工人公社的經濟。在一九三一年這個問題的進行，已開始表現有很大的發展。最先的發展是在赤都莫斯科。現在我們知道，除莫斯科外，明年在列甯格勒和其他一些工業區域，也要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建築。

公社經濟對改善工人人口的生活狀況有重大的重要，已毫無疑義。我們的任務是去監督這些任務的執行，以及準備去發展在全蘇聯各都市中工人住宅的建築。

農村中勞動農民的福利設備的驚人發展已成爲無須證明的事實。集體農場化和肅

清富農階級，已替貧農和中農，開拓出新的生活改善的區域。把農村中的勞動羣衆從貧苦和黑暗中拯救出來，實係歷史上第一次的事件。這便開始消滅了城市和農村的矛盾。

(五) 五年計劃的總結果和我們的敵人

因經濟發展的結果，蘇聯整個的國家收入，獲得驚人的增加。

在資本主義國家因經濟危機，而國家收入有極可怕的低落。但在蘇聯國家的收入却大大的增加。這個事實上，已加重的說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區別的所在。我們國家收入的增加，便可由五年計劃執行的第四年，已達到第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數量這個事實來說明。在一九三二年，蘇聯國家收入要超過四百九十萬萬盧布，而國家收入中社會主義部門的比重，要超過百分之九〇，但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只百分之七一。

此地我必需說到國家預算的概況。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時，關於這一個問題，還須提出一個特殊的報告。五年計劃預定整個五年中國家預算為五百三十八萬萬以上。事實上，到第二年的時候，我們的預算已超過四百八十萬萬盧布。我們假使加上三一萬萬盧布的運輸建設費，在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到一九二二年的百七十四萬萬盧布的預算案上，那末，我們在四年中，已執行五年計劃到百分之一四六（即四年中的七

百八十六萬萬盧布和五年計劃的五百三十八萬萬盧布之比)。

這些都是些不可辯駁的事實。地球上沒有一個力量，可以從社會主義史上，和實際無產階級史上，把這些事實消滅去的。

但是一般考茨基信徒們却是另外一個想法。在去年考茨基寫了一本「布爾塞維克的停滯」，他現在還英勇地擁護他的這本著作。現在摘錄考茨基最近的關於五年計劃的作品上幾段話，也足說明考茨基派的意見。例如他寫道：

「五年計劃的成功，也不過是俄國的物質生產力得着相當的改善，正像資本主義世界過去十年中的合理化一樣。」(考茨基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展望登在社會雜誌第十一期的四百二十九頁)

人們一定會承認拿蘇聯的五年計劃的成功，去和資本主義企業中奴隸勞動者的合理化比較，臉皮是多厚。但考茨基還不認這樣的比較為滿足。他又寫道：

「自一九一八年來，俄國無產階級已一年一年的陷落下去，他們不是接近社會主義，而是往後愈退愈遠。」(同書四百三十六頁)

無論誰，也不會這樣的無恥！考茨基這樣的榜樣，是表明他理論上的活動，已不能保障他的愚蠢和政治的卑污，起碼是在他晚年。一位著名的美國著作家辛克萊很有理由的在他的文章裏批評考茨基的「布爾塞維克的展望」。他寫道：

「這本書我名之爲對於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屈服，和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危險。」

但考茨基很固執他的觀點，並重述已被逐出蘇聯的俄國孟塞維克反革命的攻擊。這般孟塞維克不過是一些反革命的萬事通，他們叫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爲國家資本主義。

好的，可是資本主義，甚至國家資本主義，却是沒有資本家呵！沒有一個資本家能夠相信——我們且不談工人——在任何國家中，當那般資產階級和地主已同孟塞維克黨徒一樣被驅逐出境了，而國家資本主義却還能在這個國家存在着。可是不管這些，那般孟塞維克還是不顧羞恥的在那裏高談蘇聯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也不問在工人階級中有千百萬的工人正在可怕的發展他們社會主義的競賽，也不問千百萬農民的田地的集體農場化，也不問肅清富農階級。真的蘇聯採用七小時工作制，是不是被認爲國家社會主義的最好理由呢！不僅爲批駁這一些狂妄卑鄙說蘇聯是國家社會主義，我們纔提到這一點，實在我們還有其他理由。

當我有時說到這一問題時，而提及考茨基的反革命攻擊，這是因爲這一般大人先生們，是執行蘇聯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敵人們的命令。他們的命令，包括要污辱社會主義，和毀壞世界工人對蘇聯的信任。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正需要這類論調，以準備

攻擊蘇聯和武裝干涉蘇聯的地位。

我們也可從考茨基這一本『布爾塞維克的展望』書中看出這一點。考茨基用以下論調，直接號召干涉蘇聯：

『俄國民主制的採行，不僅對世界工業開放了他的市場，並且很快的要擴大他的市場到很廣大的範圍。……過程是這樣的發動的，那末結果，便可引導着去解決目前一切近代工業國家所遭遇的可怕的危機。……不幸的是這個市場如在布爾塞維克主義掌握中一天，便仍舊是一個無關重要的地方。』

考茨基這種的宣言的意義，是很清楚的，考茨基是準備竭他所有的餘力以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爲的是外國資本可以自由統治我們國家的新市場，並強迫我們的工人們在他們的束縛之下。

不論考茨基和其他的帝國主義的奴僕們如何的努力，但這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我們國家的生命由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是反對資本主義。

可是事實是幫助我們的。這些事實都是反對資本主義和贊助社會主義的。因布爾塞維克黨和工人羣衆的努力，五年計劃四年便將完成了。

爲爭取我們的勝利，我們應毫不憐恤的和不拘任何形式的機會主義鬥爭。我們應增加我們的工作，以便四年完成五年計劃，以回答機會主義的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疑慮。

同時，並實現一九三二年所定的計劃。我們應遵照斯達林同志對於實現黨所規定的經濟任務所說的話。斯達林同志說：

「事實上，生產計劃是正在創造新生命的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生活和實際活動的綜合體。我們計劃的實體，包含着活動的人們，你、我、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工
作，我們對新式工作方面的準備，和我們對執行計劃的決心。我們有沒有決心呢？我們是有的。好，那末，我們生產的計劃可以並將要完成了」。

這是斯達林同志在決定一九三一年計劃的時候說的。這對於一九三二年的計劃，還是很能應用的。這個計劃的政治重大意義即是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

對一九三二年計劃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我們是已經有了。可是我們，工人階級和他們領袖有沒有執行這個計劃的決心呢？是的，我們有這個決心。我們已充滿了這種決心，我們要執行這個計劃。（鼓掌歡呼）

三 目前的任務

要完成一九三二年的任務，和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我們應當做些什麼呢？這個問題可以簡單的答覆：我們應增加工廠礦坑鐵道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中的勞動生產力。列甯常時指示給我們，勞動生產力最後決定社會新秩序的勝利。

在現時，提及上年這方面不滿意的結果，我們必須特別記牢這種說話。一九三一年工業方面的生產力只增加百分之六·六，這是非常不夠，并且離開原定計劃太遠。結果，許多地方，不但沒有達到所規定的生產數量并且相反的。預先規定的數量反顯其多。我們實在不能容忍這種情形。在一九三二年，我們必須發展鬥爭以增加工業農業和運輸的勞動生產力。這爲防止舊事重演起見，實在是很重要的。在去年運輸工業中，減少我們成功的成分，是不容忽視的。這些事實，使我們必須發展鬥爭，反對在工作組織和管理中所發生的一切大錯誤。

說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說明下列的目前基本任務：（一）在工業蘇維埃農場和運輸中的組織工作，（二）集體農場中的組織工作；（三）貨物流通的發展，（四）商業會計制度的執行；（五）對於工作執行的監督。

一、組織工作的問題：黨在去年便很嚴肅的提出了這個問題。事實上，他是我們經濟組織的基本問題。內中最重要的的是反對個人對機器和機器裝置缺少負責和反對工資平等的鬥爭，並且還從工人自動的增加生產力，轉變到有組織的增加生產力。

個人缺少負責的害處，在鐵路運輸中看得最清楚。

消滅個人對機關車缺乏負責的弊病，在運輸委員會所管轄的所有的機關車中曾發生很好效果。機關車的損壞數量也一天減少似一天，而客貨車因機關車損壞致中途缺少

機關車的情形也減少了。爲減少個人缺少負責起見，每一機關特指定由兩個工人——一個司機一個火夫——負責。現在各處尙未能充分執行，可是我們一定要完全的執行這一個辦法。

不僅是運輸委員會，即在其他經濟組織中，也發現個人缺乏負責的弊病，我們可到處碰到對機器用具工廠及生產中的某一部份任務，缺乏個人的負責。缺乏個人負責，成了一種特別的現象。去年在進行不停止的工作過的時候，許多是執行錯了的。

現在大家都曉得這個弊病，自然在進行反對缺乏個人負責的鬥爭中，當較易着力。我們應堅決執行我們的議案。

在另一方面，工資平等的施行，有許多大毛病。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壓力，還是很強。這種壓力，足以削弱熟練幹部的利益，而我們現在正缺少這些幹部。所以反對工資平等，主張工資應按數量和質量去定，這是現在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假使不取消工資平等，結果將無從獲得高等熟練工人。並且假使對於一些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如若沒有特別的提升的制度，那我們工廠中的工作組織，便不能改善。工人不時的變動，也不能消除。工業中和其經濟部門中的勞動生產力也不能真正的增加。有組織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反對個人缺乏負責和反對工資平等的鬥爭。這是我們工業農業運輸和畜牧等生產中的最應注意的問題。

我們距離正確的有組織的工作有多遠呢？只看糖廠的榜樣便知道了。常時檢視糖廠的糖業托拉斯主席委丁楚夫同志的結論是：「糖廠沒有分成各部門，有些部份的生產，係按照甘蔗數量的多寡而定的。」

「糖廠對於糖的生產，縱然到生產手續終結時，都沒有記賬的。對於工作也沒有計算，對於生產的增加，也不積極負責進行，工人們也不為增加糖的生產而鬥爭。」

「糖廠對於甘蔗的收穫，沒有定出計劃，即對於運輸甘蔗到廠內去，也沒有規定出若何辦法。」

同時人們可以經過特別調查，更描寫出糖業中許多不好的景象來，可是我所敘述的事實，已足表示出糖業中的缺點。我們都知道，應採用猛厲的手段，如撤退經理等，以發展糖業中的鬥爭，改善糖業。最主要的是消滅糖廠中組織的缺點。無疑義的，毫不憐恤的揭露缺點，纔能促進整個糖業中的改善。

假使不取消工資平等，缺乏個人負責和改善工作的組織，那我們便不能為一九三二年的主要任務而進行正確適宜的鬥爭，和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

二、集體農場的工作組織問題：也要佔一個特別位置。對於黨的取消缺乏個人負責和工資平等的訓令，在集體農場中也應遵行的。但是在集體農場方面，有許多事件，在工廠或是說在蘇維埃農場裏面，是沒有的。

上次蘇維埃大會上，曾經很着重的指出集體農場中的過去：「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工作中主要的和最危險的缺點，是第一集體農場的收入，並沒有按農場中會員的工作質量和數量去分配，而只是按名額分配的。第二收穫時，也沒有很好的組織」。

在一九三一年，對克服上述的缺點，無疑義的我們已獲得相當的結果。但是因為集體農場運動發展如是之快，在短時期內，有成千累萬的新的農民加入集體農場中來，因此蘇維埃大會中所指出的缺點，在現時有許多時候，還是為集體農場的生產工作增進的主要障礙，特別是對於收穫工作。

我們應根據去年集體農場所獲得的成功，經驗，去考查第六次蘇維埃大會所決定的，按集體農場會員工作的質量和數量去分配收穫物的訓令，究執行到如何程度。我們應按生產的結果，去增加集體農場農民物質上的利益，以鞏固集體農場。除去這個，那末，主要的結論是很清楚的。

如果工作的組織不改善，或者換句話說，集體農場如果必需的有組織的經濟不鞏固，那末，便不能保證集體農場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也不能執行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

三、貨物流通的發展：改善工人食物供給的問題，是今年的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問題。整個的黨正努力於這個問題。今年一定可以得着相當的改善，有些商品價格的增

加，并未影響到貨物的流通。相反的，流通的數量，反而大大的增加了。當然我們還不能認這種結果為滿意。

在一九三二年，對於羣衆消費的貨物準備金增加很多。準備金從二百七十二萬萬盧布，增加到三百五十五萬萬盧布（按照去年零售市價）。這便是說零售業轉到社會主義企業部份的增加到了百分之三〇。

同時農業生產和去年同期比較，增加得很多。雖然有些重要區域有旱災，可是今年我們所收穫的穀類較去年要多些。棉花生產量雖不夠，但已超過去年的棉產。蕃薯蛋和馬可克（次等的烟葉）的生產，也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〇到五〇。肉類牛油向日葵種子亞麻子較之一九三〇年增至百分之五〇到一〇〇。家禽苧麻亞麻和烟草較去年增至百分之一〇〇。只有甘蔗較去年為少，農業的生產食物等等，在去年都是增加的很多。

爲了增加這些日用部門的生產起見，一九三二年特建築了許多新工廠，在離中心區域稍遠的地方建立工廠。我們要以衝鋒隊的速率去完成這種建設工作。現已決定在中亞細亞建設一個新的大紡織組合，爲的是改善對於中亞細亞和西比利亞人民的紡織品的供給。

一個規模宏大的建設糖廠的計劃，也在起草之中，準備在克薩克斯坦和遠東建設這

些主要的糖廠。

至於一九三一年所採用的肉類的組合，和甘蔗廠的建立計劃，在一九三二年，還要更努力促其實現和發展。

以上所述，都足證明蘇維埃政權已加緊注意對於工人們和整個勞動人口的商品供給的改善。

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擴大零售網，開設新商店。私人商業在最近幾年來，已逐漸衰落，但尚未盡為合作社和國家商店所代替。因此在去年曾竭力擴大商店的設立，如中央聯合商店和國家商店，以及工人合作社等。這種任務在一九三二年仍然是重要的。至少應組織一萬所商店，五千家應由中央聯合商店管理；五千家由給養委員會管理，另外其他經濟委員會也應擴大他們的商店網。

假使國家商店，合作社和蘇維埃的商業不發展，那末要擴大對羣衆供給到他們所需要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而擴大對羣衆需要的供給，正是我們要執行的任務，和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的先決條件。

四、商業會計制度的完成：一九三一年對於執行商業會計制度却得着很大的進步。我們的資產蓄積，大部份要靠會計制度的完成。但有許多地方，我們對會計制度的採行，尙未能認為滿足。所以現在很嚴重的提出會計制度的任務問題。一九三〇

年信用組織的改革，已建立了消除管理錯誤的先決條件，並鞏固了工業的內部資產的整頓。

關於契約關係的執行，尤其重要。從鞏固各經濟組織之間的關係，和在各工廠各經濟組織中建立商業會計制度起見，在明年我們的工作中，對於契約關係的注意，應佔一重要的位置。

我們知道商業會計制度的原則，並不和我們有計劃的經濟組織相違背。相反的，商業會計制度正和我們所採用的經濟計劃互相關係着，並且是隸屬在我們經濟計劃之下的。換言之，商業會計制度的採用，很顯然是發展和發動各企業和經濟組織中執行經濟計劃的責任。契約制度是將經濟計劃和商業會計的原則聯繫起來的最好方法。因此，各經濟組織，對於這個問題須特別注意。

對執行商業會計制度是有許多的曲解。一方面有許多形式上的官僚主義意見，在實際上是否認黨的經濟建設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對商業會計制度的官僚主義的曲解，如主張各經濟組織中的貨物直接交換，這將引導我們的經濟計劃走向失敗，同時是經濟機關中資產階級傾向的反映（如隱藏國家商店的貨物，和在分配的時候不必須的耗費等等）。黨喚起我們對於糖業托拉斯的注意，這些全是表明商業會計制度的重要。

假使不執行商業會計制度增加我們工業中貨物等的積累，是不可能的。同時，對

管理不良，也不能進行真的鬥爭。結果，對於明年的大計劃，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也便不能執行。

五、最後說到對任務執行的監督。列甯在的時候，很着重在國家機關的改善。無疑義的，我們的國家機關，從那時起，是有很多的改善。努力建設蘇維埃政權的幹部，在國家機關中的數量是增加了，黨員的數量也增加了。但是因為我們建設工作的驚人的發展，我們國家機關特別是經濟機關也很發展，而在這些機關中，非工人階級的份子，和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什麼關係的份子，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列甯指出共產黨人對於國家機關的關係重要。他說道：

「共產黨員參加這些機關，應是這些機關的主人，而不應像時常發現的，變成被機關所管理了。」

在一九二二年列甯已指出：

「管理人和真正的執行這種任務是也只有他是我們整個工作和整個政策的主要點。但這不是幾個月或一年的工作，而是多少年的工作。」

這是列甯在九年前講的。現在怎樣呢？現在我們的整個國家機關怎樣呢？

我要引用安德利埃夫同志的說話來答覆這個問題，安德利埃夫同志在認清運輸機關的現象以後，他描寫運輸委員會道：

「這個機關是任其自然的，對於機關的建設，職員的工作和任務的分工，缺少正確的有組織的工作。雖是蘇維埃進行清除的工作，可是機關中還容有無用的分子」。

他繼續說：

「完全缺乏對整個機關中工作的計算，和個人負責的工人。對運輸委員會中央執行機關的任務執行也缺少監督。」

因為機關缺少有組織的管理，而日見擴大，以致運輸委員會不能確實的知道運輸委員會中央機關，職員以及工人的數目，是有多少，只有運輸委員會的職員，因數量的限制，纔有確定的數目可稽」

當然安德利埃夫同志是不僅限於批評這類事實的，他立刻便開始加緊運輸委員會的工作。

很顯然的，運輸委員會這些事實，不僅是關於運輸委員會一個機關的教訓，我們可引證到其他經濟組織中去。

現在確是停止任其自然和機關組織不健全的時候了。是消除阻礙改善管理機關那種頑梗的意見的時候了。這種頑梗的意見，和對國家機關作用的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過低的估計，對於工人階級利益，和共產黨人責任的執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我們現在已有了改善機關和經濟管理的很好的條件，這不是很難改善的。

在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技術人才和機器工程師的一部分動搖，和反革命行爲發見以後，他們已轉向到有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一方面來。工農業方面，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便足以表現出來。可算是一方面的看法。

在另一方面，是技術人才和工程師的幹部的準備。這可以用簡單的數字來說明的。在五年計劃開始的那一年，一九二八年，我們高等學校裏讀書研究的有八萬七千人，現在却有了三十七萬二千人，是較之前三年增加四倍。在一九三二年高等學校的學生，要增加到三十八萬人。

在工業學校也是如此的。一九二八年工業學校裏有十四萬九千學生，現在有五十一萬一千人。這便是說三年中，學生已增加了三倍半。明年工業學校的學生，估計起來，大約有七十二萬五千人。

講到這些數目字，我們應當把我們當中的同志，有一時期對工業學校問題不同的意見提一提。三年到三年半以前的時候，有許多同志認爲可辯論的，是不僅所有工業學校和技術機關是否應屬於各種經濟委員會，而他們爭論最烈的，是反對這些高等學校和技術機關，隸屬於人民委員會之下，縱然這是一種試驗。黨決議反對這些傾向。我們看得很明白，這個決議還是合乎當時的需要的。誰還能否認，假使當時不採用這種

決議，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需的幹部訓練，是要感受何等困難。

技術幹部很快的增加，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我們應監督幹部的訓練，組織是保證幹部成立的南針。

在另一方面，毫無疑義的，我們應承認幹部的驚人發展。他們經過重要的學校的教育，已經可以——從前是不知道的——對於我們經驗組織和整個國家機關工作的改善，有所供獻了。不僅是我們經濟機關和國家機關中的領袖們，應當布爾塞維克化，應當正確的改善機關中的工作，對工作的聯繫應有適宜的選擇，正確的分配，而主要的，却是對於任務的執行，應有有組織的正確的監督。

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任務的執行缺少監督，却是我們經濟機關和整個管理機關中一個最大的缺點。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在這一方面是很落後的。

因此，我們希望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應關於監督我們決議的執行，對人民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作下列的建議：

「對於執行黨的政府的和他們自己的決議的監督，應在蘇聯的和一切的經濟的機關中（最高經濟委員會，運輸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給養委員會，經濟組合等），應特別加以注意的。蘇聯和一切經濟機關應從文件中的指示建議，而轉向到有系統的監督對於任務和決定的指示的執行」。

這從文件中的指示建議，而轉向到有系統對於任務和決定的指示的執行，應當堅決的和布爾塞維克化的去實現。各機關和經濟機關中的領袖們，應自己去監督決議的執行，這種事，不能交給別人去做。

再者，因監督任務的實際的執行，我們的經濟經驗可以增加，真正的對經濟建設的管理可以產生，而確實的執行黨的任務，也可以得着保證。我們經濟計劃給與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以一種政治的指導，而這種政治指導的生命，却完全寄托在我們對於生產技術的熟練和管理達到什麼樣子的程度（這包含工作組織的問題而言）。也就是寄托在我們對任務執行的監督到什麼樣的程度。

對於監督任務執行的組織和具體的指導的保證，在他的本質說來，是一件事從兩方面來看：因此，最近有些經濟的機關中，有了相當的組織上變更。例如經濟會社的範圍縮小。

因去年或是說前兩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驚人發展，并且明年蘇維埃政權還要有更進步的發展，那末，這些組織任務，特別的是對任務執行的監督，是很重要的。

除非蘇維埃和一切經濟機關的工作有了新的改善，除非對監督任務的執行的工作已經建立起來，以及除非具體的指導已獲得真正的保證，我們便不能執行我們國家經濟計劃中的中心任務——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

這些是前目前的基本任務，在決議案上，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之下，而集中我們的力量。

四 國際狀況和爲和平而鬥爭

在這個報告中，很詳細的說到國際狀況和蘇聯的關係，這不是我的任務。我現在只提到最近幾件最重要的事件。

一般的說起來，最近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并未更變。關於和蘇聯有正式友誼關係的幾個國家，現在我們的關係還是照舊。蘇聯根據他的政策，對這些關係，仍竭力盡他的力量去維持。對於有些關係不大令人滿意的國家，蘇聯政府竭力設法去改善彼此間的關係。這是蘇聯的一般政策。

說到改善和平政策，蘇聯和波蘭正進行締結互不侵犯的條約，現在談判還在進行。我們是希望這種條約的締結，是能令人滿意的。蘇聯對這方面，所能做到的便是如此。

最近我們又收到羅馬利亞，芬蘭和愛斯利亞請求締結互不侵犯的條約。我們認爲和這些國家，或其他國家，特別是和蘇聯鄰近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完全合乎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政策，而爲的是獲得一般的和平。如同過去一樣，我們希望一般的這些

互不侵犯條約能夠實現。對這方面，所能做到的，蘇聯是已竭力從事了。

我們的外交問題中最重要問題，當然是遠東的衝突——滿州的衝突。事實上指明了衝突的地域，有更形擴大的趨勢。

我們知道國際聯盟準備干預滿州的軍事行動，但這毫不影響現在滿州的佔領，也不會能停止滿州軍事行動，而結果却正相反。

有兩次，國際聯盟都預備對侵佔滿州，作一種具體的建議，其結果我們是已經知道了。

當事件初起的時候，國際聯盟定了一個日期十月十四，停止滿州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有許多人幻想滿州形勢或可相當的改善，但後來是沒有這件事。

經過長期的和新的談判以後，國聯決定由五大列強，遣派一個科學的調查委員會到滿州去！換句話說，國際聯盟是已經證明他缺乏意志和能力去停止滿洲的衝突。這第二個決議，證明了第一個決議的無誠意，並事實上，承認滿州的佔領和軍事行動的擴大。

這些是使得我們對遠東問題要很慎重去考慮他的。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邊界，是接着滿州的。我們無疑義的相信，遠東英雄會起來，而保障蘇聯遠東的邊境的。（鼓掌）

蘇聯的工人和勞動羣衆們，對於他們自己內部的事情是太忙了，對於改善我們國家經濟，和他們自己的生活狀況的任務，是太努力了。他們希望別的國家中的工人們也是如此。但是最近國際的事件，使得我們要小心提防。我們再把我們的原則，重行提明一下。我們不需要別國的土地，同時，也不放棄我們一寸的土地。（鼓掌）

一九三二年二月要召集裁減軍備委員會。在這一天，各帝國主義的政府，要耍一些把戲，他們對於裁軍的問題，是各不相讓的。現在他們準備延緩或停止召集軍縮會議。

另外，主要的帝國主義勢力準備把裁減軍備變成增加軍備的滑稽戲。一切都準備好了。軍縮會議要毫不執行他的任務，并不干涉增加軍備，特別是幾個主要帝國主義的國家。主要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在參加軍縮會議的假面具之下，而增加他們的軍備，並造成他們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政治聯盟。

各帝國主義的提議，是一致的。即他們不是要裁減軍備，而是要能自由的增加軍備。

祇有一個真正準備裁減軍備的提議，這便是蘇聯的提議，這個提議，建議各國完全解除軍備。蘇聯相信，這是裁減軍備和一般和平的需要的唯一建議。至少蘇聯建議在最近幾年中，要裁減百分之五十的軍備。縱然這個後面的提議，也并不為帝國主義

列強所採納。同時，蘇聯相信只有一個裁減軍備的綱領，亦即是唯一的和平的綱領，

——這便是蘇聯提議的完全解除軍備。（鼓掌）

和召集軍縮會議相連繫的，是一切表示都是世界戰爭危險的加大。

因經濟危機，而使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更形嚴重。而階級矛盾的加緊，更使得他們內部形勢益加惡劣。經濟鬥爭和保護政策各種方法，已形成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的經濟戰爭。另外一個步驟，便要由爭取市場，而變為帝國主義戰爭。新的帝國主義冒險的軍事危險是一天增加似一天。

蘇聯特別受到帝國主義攻擊的恐嚇。我們聽到現在他們有攻擊蘇聯的活動的外交上的討論。我們不要忘記，那些從前組織武裝干涉蘇聯的人們，還生存着，並且還計劃着，同帝國主義的新代表們計議着，攻擊工人共和國。

和最近滿州事變相聯繫的，在我們的報紙上，外國資產階級報紙上，都登載有企圖把蘇聯也牽連到戰爭的漩渦中，同時攻擊蘇聯的領土的消息。我們對這種的陰謀和變動的宣傳，應準備對付他們。

但是我們仍舊是用我們的和平政策去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回答他們是十分的小心，我們用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和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回答他們。

在我們國家裏，建設的勞動仍是很快的向前發展。大建設工程，業已完成。我

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已是勝利了。因此我們看到不僅我們內部的地位，即是我們的國際的地位都是一天鞏固似一天。國家經濟計劃的勝利完成，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便是我們回答我們的階級敵人的武器。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增進一般的和平，和建設國際的社會主義，以及保證工人階級的勝利。（鼓掌歡呼延長時間很久）

（完了）

書報評論

中國大革命史應當這樣寫的麼？

范元

——對於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的批評——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歷史，不但對於中國的勞動民衆有極偉大的意義，而且對於全世界的勞動民衆，尤其是殖民地的勞動民衆，例如印度高麗南洋羣島等等的民衆，也有極重要的教訓。中國革命的歷史，不但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是最重要的鬥爭的經驗，而且對於國際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正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克服一切種種『中國式』的及非中國式的機會主義的鬥爭的紀錄。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正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之後的四中全會的時候寫好，並且付印；很自然的，——他應當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來總結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經驗

，揭露一切種種錯誤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嚴格的審查和分析中國革命的事實，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的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過去的錯誤。首先，這裡要有堅決的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階級立場。但是，事實上呢？華崗同志在這部『革命史』裏竟沒有這樣的立場，竟犯了腐化的自由主義的錯誤，甚至於偷運機會主義的私貨。

華崗同志編輯『革命史』的方法，根本就不對的。牠沒有根據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一貫的正確路線，來有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中國革命的事變，階級力量的變動，共產黨的政策和口號的意義。他却是根據過去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各種時期的論調，——這些論調之中常常有許多是錯誤的，有許多是只能夠代表當時個別的領導同志的意見的，——他却根據了這些論調，七拼八湊的彙集了許多材料，就算編好了一部『大革命史』。自然，他所根據的材料之中，也有好些共產國際的文件，可是，他並不能夠根據這些材料，正確的去分析中國的事實；他只是機械的把這些正確的論斷，混合在一些模糊的錯誤的意見裏面。這樣，他這部『大革命史』——本身就包含着許多矛盾，沒有統一的，一貫的見解。與其說是『大革命史』，還不如說是『中國革命史材料彙錄』；假使真是這樣編法，那他也應當在每一段每一篇的材料底下，註明白：某人某年某月的論文，或者某一個機關某年某月的決議等等。而他不是這樣做的；他把一切錯誤，都自己擔負了起來，同時，他又想把一切正確的意見，也包含進去。結果，就

表現了對於一切種種『左』右機會主義的腐化的自由主義。這正足以暴露他的立場根本也是機會主義的，他的不一貫，正是他的一貫的機會主義的表現。

二

首先，他的方法論上，根本就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他在『大革命史』的第二版序言裏說：

『老實說，歷史的記述，是沒有所謂「純客觀的」。……但是我們始終以工農階級的解放利益爲前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與革命的教訓爲立場，能夠正確的把握並理解社會發展的本質，也就始終要比國民黨第三黨及取消派更客觀些，根本些，澈底些』。（註——這裏的旁點是我加上去的。『大革命史』的第二版沒有付印，我所引的是華岡同志的原稿）。

這裏，他簡直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和所謂客觀事實對立起來，照他的意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并不是唯一正確的，唯一合於客觀事實的歷史，而只不過是比較國民黨第三黨托陳派『更客觀些』罷了。這種口氣，彷彿是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并·存·起·來，只要求自己的一些自由，而并不要求完全打倒國民黨等等造謠誑騙的歷史，並不指出國民黨等等的歷史根本是違反客觀事實的，——反而

承認他們也有一些「客觀」，只不過比較我們更不客觀些罷了。列寧說的：

「真正相信自己是在推動科學前進的人，並不要求新的觀點和舊的觀點有並存的自由，而要求用新的觀點去代替舊的」。(列寧文集卷五，一二二頁——「怎麼幹」)。

斯達林在反對腐化的自由主義的信裏面也說：

任務是在於「把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問題提到應當有的高度，把我們黨史的研究放在科學的布爾塞維克的軌道上，使大家着重的注意去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以及其他對於我們黨史的造謠的人，有系統的去揭穿他們的假面具」。

可見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不是什麼「比國民黨第三黨托陳派更客觀些」的鬧題，而且要完全打倒他們的造謠歷史，而建立唯一正確的歷史。所謂布爾塞維克的，也就是科學的。反布爾塞維克的，一定也就是反科學的，違背客觀事實的。蘇聯耶洛斯拉夫斯基總編輯的四卷頭的黨史裏面，曾經有了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直接對於這些錯誤負責的敏茨等等，企圖辯護自己的錯誤，他們說：這是「因為太客觀了，所以忘記了政治上的不適當」。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就特別指出這種辯護的荒謬：「問題正在於敏茨編的「黨史」不是客觀的歷史……敏茨同志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自己以為做了一本「客觀的」歷史，其實是一本非常之主觀的歷史，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

他們替那些最惡意的對於黨史造謠誣蔑的人幫了忙」（卞崗諾維支）。

華崗同志的「中國大革命史」，事實也犯着同樣的錯誤，他並且在自己的第二版序言裏，很直爽的說：他的這一部歷史不過比國民黨等等「更客觀些」！其實，一定要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真正階級的，也就是真正科學的，真正客觀的立場，方才能夠正確的·分析革命的歷史；這種布爾塞維克的歷史的目的，應當是完全打倒國民黨第三黨托陳派的造謠誣騙偽造的歷史，而用自己去代替地主資產階級的一切種種主觀的歷史。

三

華崗同志對於中國大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分析是模糊的雜亂的，是一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多元論的觀點。他把發動中國革命危機的經濟基礎，機械的分割成爲三大矛盾，幾乎是互相沒有聯繫的並列起來。這所謂三大矛盾是什麼呢？一、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脫離帝國主義的箝制和束縛，要求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爭取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中國大革命的第一個經濟基礎」。二、是「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的衝突，這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生活之中的第二個大矛盾，也就是中國大革命的『第二個經濟基礎』」。三、是土地革命的鬥爭，「客觀上是在力爭農村經濟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條件，這種鬥爭是反映農民經濟與封建勢力的衝突，

這是中國大革命第三個經濟基礎」。而無產階級呢？工人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呢？

工人和本國的外國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呢？華崗並沒有把這個重要的矛盾放在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裏面。固然，他描寫了許多中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但是，他的結論祇是「中國無產階級也很有利於推翻帝國主義地主買辦軍閥豪紳的反動統治，以保障發展工人運動的德謨克拉西的條件」。

這樣，如果微細的研究華崗同志的意見，那就不能夠不說：華崗同志偷運了陳獨秀主義的私貨。照他的意思：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差不多完全是在「民族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是民族資本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的是民族資本主義，甚至於要求土地革命的也只是民族資本主義。他特別對於「民族資本主義」加上了一個註解，說是：「讀者要注意：不可以把這裏所說的民族資本主義，完全看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意思自然是說，農民羣衆的土地革命也是爲着民族資本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也是爲着民族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在這個「民族資本主義的革命」之中，只不過要求一些「德謨克拉西的條件」。（華崗同志，忘記了加上一個形容詞：應當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條件）。結論是什麼？自然應當和當初陳獨秀的結論一樣：推動資產階級去領導革命和取得政權，而工人自己只要得到一些自由和德謨克拉西的條件好了！固然，中國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主要的經濟基礎，是廣大的勞動

民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統治，固然，這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這還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是，第一，最主要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是工人和廣大的勞動民衆，而不是什麼民族資本主義；第二，最主要的真正澈底反對封建勢力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羣衆，而不是什麼民族資本主義；第三，這種反帝國主義的反封建的革命之中，開展着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用自己的階級鬥爭爭取着革命之中的領導權，——爭取着工農民權獨裁的實現，——這個革命的開展將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促進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中國革命史的敘述和分析，必須着重在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爭取，着重在工人的階級鬥爭對於反帝國主義革命和農民反對地主的土地革命的領導，着重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的必然性和經濟上的根源。而華崗同志的寫法，却是相反的，他十二分的着重在「民族資本主義」的作用，幾十次的證明中國革命不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的範圍，他事實上忽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忽視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中的勞資矛盾的發展和作用。他也許自以爲這是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方法，殊不知道：他自己陷落到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同時，也就幫助了托洛斯基主義，他曲解了列寧的「爭取工人運動充分發展階級鬥爭的自由條件」的方針，而替托陳派想出了一種「理論上的基礎」，可以去辯護所謂國民會議的民權要求，——就是不要參加當時的革命政權，而只要一些「德護

覽拉西的條件」，並且他根本沒有分析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封建地主以及帝國主義的聯繫。華崗同志的這種錯誤和瞿秋白同志以前的錯誤是很相像的，他的全部「大革命史」之中有許多地方簡直是直抄秋白同志以前的文章，完全沒有經過堅決的清楚的批判。

四

關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和革命任務，革命的前途，共產黨雖有明顯的唯一的正確的分析和政治上的路線：

「共產國際的路線 封建殘餘，以及依據在封建殘餘之上的官僚軍閥的上層建築，被各國帝國主義所竭力維持的，——這是中國現在實際狀況之中的主要事實。

中國現在發展着的土地革命，反對着封建殘餘，同樣也反對着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基礎和內容。武漢的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運動的中心。南京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是反革命的中心。「贊助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開展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政策，因此，就有其他許多必要的辦法。因此，共產黨參加武漢的國民黨和武漢政府；這種參加不但不使共產黨員要停止對於國民黨的批評，而且要共產黨員對於國民黨裏的同盟者的不徹底和動搖，

加以努力的批評。共產黨員的參加國民黨和政府，是要贊助無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中的領導作用的，是要促進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的。等到那個時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將要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之中將要發現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那種時候，就要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作為兩重政權的動力，作為爭取新政權的鬥爭機關，作為新政權——蘇維埃政權的機關。（斯達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共產國際的分析，是清清楚楚的認定中國革命之中的主要事實是：國際帝國主義所竭力維持的封建殘餘的官閥軍閥的統治，土地革命的中國革命的基礎和內容，這是反對封建殘餘的，同時也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可是，這個革命之中最主要的力量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無產階級要爭取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自己在革命政權之中的參加，——決不僅是什麼『德謨克拉西的條件』；——而且這種參加，是為着要促進革命的轉變的，為着要開闢民權革命——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之中的革命轉變的道路的。而華崗的分析，雖然也提起『領導權』，也提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可是，他主要的結論只是：這個革命正在『爭取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

五

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中國，封建殘餘的經濟固然是崩潰，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固然是在牠的內心發展出來；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却是地主資產階級和工農羣衆之間的鬥爭的中心問題。中國的地主階級企圖「逐漸的適應資本主義的條件」，而同時保存着地主階級獨佔土地的地位，保存着地主階級的政權。中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個短時間內，曾經贊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但是牠和地主階級的聯繫特別密切，牠在土地革命的問題上是絕對站在地主階級方面的，這也是牠背叛民族解放革命的一個原因。這樣，起先是地主階級，隨後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竭力的企圖適應着帝國主義的統治，使中國經濟的發展，保存着封建殘餘的優勢，而向着殖民地化的道路前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爭取對於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尤其是農民基本羣衆的領導權，要用革命的手段，肅清封建殘餘，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解放幾萬萬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羣衆，而開闢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中國革命史，——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直到五卅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至於廣州公社所開闢的現時的蘇維埃階段，——

就應當在分析上面所說的中心問題的過程裏，來加以詳細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的發見每一時期的階級力量的對比，階級力量的轉變，真正堅定的站在階級立場上面去分析羣衆和剝削階級的鬥爭，真正明顯的着重的指出歷史發展之中的羣衆的作用。而華崗同志却沒有抓住這個中心問題。

因此，他對於戊戌政變和義和團暴動的論斷，完全沒有階級的立場；除出一般新聞記者式的描寫一些帝國主義軍隊的殘暴，描寫一些康梁派和李鴻章張之洞等等的所謂『文人派』、『實力派』的互相勾結，互相鬥爭之外，簡直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分析，更沒有去發露階級鬥爭的背景。列甯對於俄國『農奴解放』之後直到二月革命的歷史的分析，可以做我們分析中國歷史的最好的模範，他說：

『農奴主和自由派之間的著名的鬥爭，——我們的自由派歷史家和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歷史家所鋪張修飾得這樣有勁的鬥爭，——其實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大半還只是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完完全全只是爲着讓步的方法和形式的鬥爭。自由派和農奴主是一樣的，也是站在承認地主的政權和財產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很氣忿的批駁一切要想消滅這個財產，要想完全推翻這個政權的革命思想』。這是一派。這些『自由派要想「從上面」來「解放」俄國，既然不毀壞俄皇的帝制制度，也不毀壞地主獨佔土地的制度和地主的政權，而不過警告他們要對於「時代精

神「讓些步」。……地主的實行一八六一年的所謂「解放農奴的大改良」，一方面是因爲經濟發展的力量，把俄國拉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別方面是恐懼農民的革命。那次「農民改良，是農奴主所實行的資產階級式的改良。這是把俄國變成資產階級的帝制制度的一步」。但是，常時就另外有一派。這就是「赤爾納塞夫斯基，他是革命的民權主義者，他會對於當時的一切政治事變，表現革命精神的影響。表現羣衆要求推翻一切舊政權的鬥爭的思想」。

「這兩個歷史上的傾向，從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之後，一直發展了半世紀，一天天的清楚的分離開來，一天天的確定下來，一天天的堅決起來。自由派帝制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在生長，他們宣傳只要有「文化」工作就可以滿意的了，他們反對祕密的革命運動。而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在生長，起先是混合在一個烏托邦思想裏的，混合在智識份子的民意黨和革命的民粹派的鬥爭裏的，而從前一世紀的九十年代起，就跟着革命鬥爭從恐怖主義和個人宣傳進到幾個革命階級自己的鬥爭的過程，而分化起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裏，這兩個一八六一年還祇不過剛剛發現的傾向，剛剛表現在文學裏的傾向，——就發展了出來，生長了出來，表現在羣衆的運動裏面，表現在許多政黨的鬥爭裏面，表現在一切種種的方面：機關報上，羣衆大會上，羣衆

團體裏，罷工，暴動以及國會裏面」。

「一八六一年產生了一九〇五年。那第一次的「偉大的」資產階級式改良的農奴主的性質，使發展受着困難，使農民受着幾千幾萬種的磨難，可是，並沒有改變發展的方向，並沒有能夠預防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八六一年的改良使爆發的日期延遲了一些，放開了一個相當的出氣洞給了資本主義相當的生長；然而牠並沒有取消不可避免的爆發，這個爆發到了一九〇五年就出現了，這是非常之廣大的戰場，這是羣衆的襲擊，這是對於俄皇的專制和農奴主地主的襲擊」。……：（以上見列甯文集第二版第十五卷一四二——一四六頁）。

「第三屆國會，從新的方面，在新的環境裏，更加證實了俄國政治力量和俄國政黨的主要的分化狀態，這樣分化，從十九世紀中葉就完全確定的發現了的，而從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五年，一天天的更加形成起來；一九〇五——〇七年，這種分化爆發了出來，在羣衆的公開戰鬥的舞台上鋼定了下來，一九〇八——一二年仍舊是這個樣子。爲什麼這種分化到現在仍舊是這樣呢？因爲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任務沒有解決，——這些客觀的任務是民權主義的改革和民權主義的革命的內容，到處都是一樣的，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直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國」。（列甯文集，同上，第四〇七頁）。

我在這裏引了這樣長的列甯的話，目的是在指出整個中國歷史的方法——列寧主義的方法。華崗同志，根本就沒有了解這種抓住歷史的中心問題的方法。他在戊戌政變之中，沒有發見『社會羣衆的基礎』，他反而說這是『因為當時所謂士大夫（官僚與智識階級！）受戰敗的刺激』。這顯然是唯心論的觀點。因此，他也沒有暴露康梁黨的根本目的是在預防革命。

同樣，他也沒有發見滿清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利用義和團運動，目的是在把農民羣衆反對剝削制度的刀鋒移到所謂『洋鬼子』身上去，而自己避開革命的襲擊。他只說：這是當時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而『打着扶清滅洋的尊皇旗號，不免有保護舊制度的反動意味』。他不知道戊戌政變和慈禧太后的利用義和團，原本是『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康梁的維新主義和慈禧的利用義和團，手段雖然不同，而主要的目的却都在於『保存地主制度和地主的政權』，他們內部的爭論祇在於怎樣去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方法。

辛亥革命之中，從袁世凱等等直到各省的督軍和紳士，一方面鬧着所謂『鐵路民有』和『收回權利』的運動，別方面，『非常之迅速的』從君主立憲以及絕對專制的立場轉變到『光復共和』的政綱。這些真的同假的自由派的轉變——怎樣去說明呢？也是當時的地主貴族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預防』農民革命，『預防』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手段。華崗同志對辛亥革命的論斷，却完全着重在所謂『資產階級力爭鐵路商辦』，

說這「實在是一種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他雖然提起了幾句關於「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運動」的話，但是，他並沒有把這種羣衆運動看做農民的革命運動的浪潮，看做客觀上反對紳土地主的一種運動，看做和紳商階級的傾向絕對相反的，互相鬥爭着的一種運動。這和以前彭述之的議論有相同的錯誤。

六

因此，華華同志對於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心問題，也就不能夠抓住牠的樞紐。一切革命的中心問題，是階級的政權問題。中國辛亥革命的失敗，在於政權仍舊保持在封建殘餘的地主官僚手裏。所謂軍閥制度就是這種封建殘餘的統治和商人資本結合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斯達林說：

「這種最初積纍式的商業資本，很特別的在中國鄉村之中和封建主的統治結合着，而且商業資本繼承着封建主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同志們問題是在這裏。拉狄克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他沒有了解這個特點，沒有了解這種結合——封建殘餘的統治和中國鄉村之中商人資本的存在結合着，而且保存着對於農民的封建中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軍閥制度，督軍省長，一切種種現在強盜式的魔王似的軍事官僚和非軍事官僚，正就是中國這種特點之上的上層建築

。而帝國主義，是在維持并且鞏固這整個的封建官僚的機器。至於說軍閥佔着土地，同時又是工業企業的主人——這種情形並沒有根本改變軍閥的實質。許多俄國的地主當時也管過工廠，以及其他的工業企業，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仍舊做封建殘餘的代表。如果在許多區域裏面，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要歸紳士和地主；如果地主在經濟上，行政上，司法上都有實際的政權；如果直到現在，在許多省份裏面，還有販賣婦女和兒童的事實，——那麼，就要承認這種中世紀的環境裏面：統治的力量是封建殘餘的力量，是地主的力量，是地主性的官僚的力量，是軍事官僚和非軍事官僚的力量，他們很特別的商業資本的力量結合着。」（斯達林：「和孫中山大學的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但是，華崗同志怎麼說呢？他說：因為辛亥革命的領袖「尊重外人在華的條約權利；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帝退位，而政權依舊移入另一個反革命勢力——封建軍閥袁世凱手裏。」。固然，放棄反帝國主義的任務，是辛亥革命的領袖的最嚴重的罪惡，但是，問題還在於爲什麼這些「革命領袖」這樣妥協和不徹底！這就因爲大多數的辛亥革命「元勳」，本來就不要革命，他們的出現，根本是爲着要挽救地主階級的政權的，根本的爲着挽救帝國主義的統治的。辛亥革命時候的平均地權的口號和農民羣衆的暴動，却表現着另外一種力量，另外一種社會階級。這種力量在當時

是被反動勢力鎮壓着，出賣着，蒙蔽着。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鬭爭的分析，應當是辛亥革命歷史的中心。

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政權仍舊保持在地主階級手裏，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這些稍稍改頭換面的地主性的官僚軍閥，必然的尊重「外人在華的條約權利」。而當時的資產階級，主要的土著的商人資本，完全不要反對地主的封建勢力，却正在這個時候，進一步的和封建殘餘結合，形成割據的軍閥制度的經濟基礎。

五四運動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上發展出來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向新的浪潮。這時候，工業無產階級逐漸的表現自己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一直到爭取革命的領導權。革命的中心問題，是無產階級要聯合農民羣衆去推翻帝國主義所維持的一切南北軍閥的政權，而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最初一期是贊助這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是想利用羣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許多小軍閥，尤其是南方的軍閥，跟着羣衆的革命鬥爭的發展，也在混進革命的營壘。從楊希閔直到馮玉祥唐生智，都又成了「革命軍人」了！這是辛亥革命時候的老調，這又是企圖用欺騙的手段，來預防農民的土地革命，想改換一些形式而實際上保存買辦地主的政權。華崗同志對於這種現象怎麼解釋呢？他說：「固然這種軍閥地主爲吃醋爭風而『參加』革命……但在客觀上，這種資產階級南方軍閥地主對北洋軍

鬧反抗之中，必定要叫出些革命口號，客觀上在一個相當情形之下，是有助於革命之發展的。這和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同志主張『西南團結，暫時不必北伐，而要在南方做出革命政府的模範』的理由，是非常之相像的。這明明白白是機會主義的觀點。這些南方軍閥爲着反革命的目的而混進革命的營壘，他們被羣衆鬥爭威迫着逐漸混進來，以便從容佈置抵制和壓迫土地革命的步驟；而華崗同志不暴露他們的階級的實質，不指出對於這些軍閥的容忍妥協和不敢批評——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過去機會主義的根源之一；他反而跟着過去的錯誤，再來說明一次這些軍閥怎樣『有利於革命之發展』！

七

華崗同志對於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本身的敘述，因爲上面所說的階級觀點的模糊，也就重複着過去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各種錯誤。關於五四運動，關於海員罷工，和二七屠殺，關於國民黨改組，關於商團事變，關於國民會議運動，他都祇收集了每一個時期的當時流行的意見，用一種庸俗的新聞記者的筆調，隨隨便便的描寫過去。這裏，我們看不見階級的立場，看不見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分析——對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的變動和革命口號的轉變，都沒有抓住了中心問題做分析的樞紐。

至於五卅前夜的罷工浪潮，一直到廣州暴動的革命事變的經過，在華崗同志的敘述

裏面，也同樣沒有清楚明瞭的階段。而最主要的，是他的敘述沒有把中國革命裏階級關係的變動來做中心。我們簡直沒有可能每一段的詳細的來批評。舉例來說，他簡直完全忘記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南京屠殺——而那次英日美帝國主義在上海暴動之後，聯合進攻中國革命而砲轟南京的事實，是中國大革命之中的一個主要關鍵。

同樣，像廖仲愷被刺的事變——關係到整個所謂「廣州時期」的事變，他也會完全忘記的。他的敘述，有些祇是抄襲當時新聞記者的「生動的文章」——例如說到國民黨第一次東江之戰的時候，他隨隨便便的寫了幾句：「香港政府至此態度為之一變，報紙都罵陳軍「搶了就跑」，並盛稱「國民政府」是受過教育的人。」；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而「廣州時期」的南方「革命軍閥」怎樣一批一批的反叛，農民羣衆怎樣一天天的起來鬥爭，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怎樣影響到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國革命怎樣從這個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他都沒有分析的。同樣，他對於「武漢時期」和蘇維埃時期的轉變過程，也是沒有辯證法的論斷和敘述的。

關於中國大革命的階段，必須要根據中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來做整個許多豐富的事實材料的方針，這樣，才能夠寫出真正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大革命史。斯達林說：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時期，當時的革命是全民的聯合戰綫的革命（廣州時

期)，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中的一個，正是這些階級的代表和共產黨員共同工作，都包含在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裏面，這個組織就叫做國民黨。這些同盟者不是同樣靠得住的，也不會是同樣靠得住的。他們之中，有些是少總是靠得住的（農民、城市貧民），有些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是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第三種是簡直靠不住的（民族資產階級）。當時的國民黨，多少總是一個羣衆的組織，這是沒有什麼爭論的事實。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使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右派）孤立，爲着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們，推動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左派），使他們左傾，而使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當時的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呢？無條件是的。……

革命第二階段的時期，當時蔣介石和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轉變到了反革命營壘裏去了，而革命運動的中心從廣州移到了武漢，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爲什麼民族資產階級走到反革命營壘裏去呢？因爲民族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革命運動的規模——這是第一，上海方面帝國主義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壓迫——這是第二（斯達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國革命的問題」裏說：「南京的砲火，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中國互相鬥爭的力量的新的轉變的信

號。帝國主義他轟南京，並且提出哀的美敦書，他們是要說明：他們正在找尋民族資產階級的贊助，爲的要共同來反對革命。蔣介石屠殺工人而實行政變，這就是答覆帝國主義說——他願意民族資產階級也勾結着帝國主義去反對工人和農民。——。這樣，革命失掉了民族資產階級。這是革命的部分的損傷。然而正因爲這個緣故，革命進到了更高的階段，進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更加接近的吸收了廣大的農民羣衆。這是對於革命的優點。當時，在第二階段的時候，國民黨不是羣衆的組織呢？無條件是的。牠比廣州時期的國民黨更加是羣衆的組織了，這是沒有什麼爭論的。當時，武漢是不是革命的中心呢？無條件是的。只有瞎子才會否認。如果不是，那麼，在武漢的區域裏（湖北湖南），就不會是共產黨所領導的最大限度發展的土地革命的根據地。共產黨員對於國民黨的政策是：推動牠使牠左傾，使牠變成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幹部。當時有沒有這種轉變的可能呢？有的。至少，沒有理由認爲這種可能是不存在的。我們當時簡直就說得明明白白的——爲着要使武漢國民黨變成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幹部，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國民黨的極端民主化和國民黨的直接贊助土地革命。假使共產黨員放棄這種轉變的企圖，那才是蠢呢。

現在的時期的特點，是武漢國民黨的領導機關走到了反革命營壘裏去，小資產

階級的智識份子離開了革命。這種分離的原因，第一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害怕正在生長的土地革命，以及封建勢力對於武漢領袖的威迫，第二是帝國主義在天津方面的壓迫，帝國主義要求國民黨和共產黨員分裂，作為放任國民黨往北發展的代價。反對派（托洛斯基——齊諾維耶夫派）懷疑中國有封建殘餘。但是，現在人人都明白了：封建殘餘不但在中國存在着，而且在現在時候還比革命襲擊的力量強些呢。革命在這一次暫時失敗了。革命失掉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

這正是革命暫時失敗的徵象。然而正因為這個緣故，革命更加密切的把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因此而造成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礎。這是對於革命的優點。」（斯達林：「對於時局問題的雜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報。）

大家讀過了斯達林的這一段話，一定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中國大革命的過程，看出中國革命之中各種階級力量轉變的關鍵，帝國主義壓迫革命的力量，封建殘餘維持自己的統治的企圖，以及無產階級團結自己的同盟者，進攻反革命，進攻背叛革命的靠不住的革命同盟者……等等的路線。而華崗同志的『大革命史』寫了二百五十頁的『中國大革命的經過』，還是不能夠給讀者一個清楚明瞭的印象。

最後，要說到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之中的作用的估量。固然，他說了一句：「中國共產黨顯然都演着極重要的作用」。固然，他時時提到共產國際路線的正確，提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

但是，照他的全部敘述來看，中國共產黨祇有消極的作用，沒有積極的作用，或者，共產國際的路線雖然正確，可是完全因為共產黨對於共產國際路線的怠工，所以並沒有實現。對於整個共產黨的作用，沒有正確的估量。這種敘述是不正確的——他的題目是「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而他的文章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錯誤路線。

中國共產黨的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就在國際執委的領導之下，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獨秀，述之，秋白，國濤，和森等等。）的極嚴重的機會主義路線，但是同時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羣衆，整個共產黨是革命的戰士，是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爲着革命的前途而鬥爭的。共產國際的路線，在一九二三——二七年之間，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而領導着中國革命的向前發展的。斯達林說：

「共產黨在這第一時期的成績是什麼？革命地域的推廣 廣州軍隊達到了長江；無產階級公開組織（工會、罷工委員會）的可能，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形成了黨

；開始建立農民組織的支部（農民協會）；共產黨員參加軍隊。」

「可見，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

「共產黨在這第二時期的成績是什麼？中國共產黨在這時期從五六千黨員發展到五六萬黨員。工人的工會組織了全國的總會，總共將近有三百萬的會員。最初的農民組織也發展成了極大的團體，包含到幾千萬的農民。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發展到了極偉大的規模，在中國的革命運動裏佔了中心地位。中國共產黨爭取了公開組織革命的可能。共產黨成爲土地革命的指導者。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已經從一種願望開始變成事實。固然，中國共產黨沒有會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固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一時期做了極大的錯誤。然而想要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就一下子成爲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那才可笑呢……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不是一下子就生出來的。」

「這樣，可見這一時期共產國際的領導完全是正確的。」……

「無產階級在這時間能夠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從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那裏奪過來，使他們圍繞着自己的旗幟。共產黨，經過廣州的第一階段的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擴大了革命的地域，變成了羣衆的黨，創造了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開闢了接近農民的道路。共產黨，經過聯合武漢國民黨的小資產

階級智識份子的政策，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增加了自己的力量，擴大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從國民黨領導方面奪取了廣大的農民羣衆，而創造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條件。

民族資產階級，喪失了和廣大民衆的聯繫，而走到了反革命營壘裏去了。武漢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被土地革命嚇壞了，在幾千萬農民羣衆的眼光裏完全喪失了自己的信用，而跟着民族資產階級去了。然而正因為如此，幾千萬農民羣衆看見了無產階級是他們的唯一的靠得住的領袖和指導者，所以更密切的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見同上）

這裏，我們可以看見一方面共產黨領導機關過去錯誤的嚴重，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之中的真正的作用，牠在鬥爭的過程之中，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改造着自己，鍛鍊着自己，肅清一切機會主義的份子，提高自己的鬥爭的力量。可是在華崗的「大革命史」裏，我們只看見零零碎碎的沒有系統的關於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錯誤。而且華崗同志對於這些錯誤的認識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在許多地方偷運了機會主義的私貨：

第一，他說：「當時廣東的黨一方面反映着階級鬥爭的發展，別方面在廣東的國際代表鮑羅廷在那時還能相當執行國際的指示」。這是機會主義者企圖把所謂廣東路線和上海路線對立起來，說當時上海的中央雖然是一貫的孟塞維克的路線，而廣東的黨部

却有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其實，廣東黨部雖然在當時（一九二五——二六年）做了很多的羣衆工作，而政治路線上却也是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鬥爭，想要請左派國民黨去做「唯一的領導」的。

第二，他說：「上海三次暴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偉大的一頁，是暴動的藝術上偉大的成功，可以垂爲歷史的教訓」。這也是錯誤的估量。固然，上海暴動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的一頁」，然而上海暴動之中錯誤很多，決不能夠說是「藝術上的成功」。

這是機會主義者彼彼爾（現在已經被共產國際開除了的，以前是美國共產黨右派洛夫斯敦一派的一個領袖。），他企圖說廣州暴動是盲動，所以故意把上海暴動的「藝術上的成功」描寫出來，去和廣州暴動對立起來。

第三，他說到瞿秋白的「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的錯誤，但是，他所指出的錯誤僅僅是秋白同志自己在六次大會之前承認的錯誤，還沒有根本發露秋白的盲動機會主義的根源。因此，他不但沒有指出六次大會上秋白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之中的錯誤，並且差不多完全繼承秋白當時的錯誤：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完全只着重在民族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之間的種種矛盾，而不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當做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固然，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當前的階級對抗——主要的還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列寧所謂封建社會裏階級對抗，——然而如果無產

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還沒有了相當的發展，那末，這個革命的動力之中怎麼會有無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還會是革命的領袖階級呢！那末，這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怎麼會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呢？華崗同志繼承着這種錯誤的分析，這就難怪他一方面引着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的議決案說：『中國革命如果不超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決不能夠推翻帝國主義的』，而同時，他在另一方面，對於中國經濟和階級的全部分析裏，却幾十次的說明：中國革命『所要直接與可能完成的任務並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存在的範圍，反之，在客觀上他正是爭取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

這樣，華崗同志事實上偷運了『廣東路線』，『彼彼爾理論』，『秋白主義』……的機會主義的私貨。

總之，華崗這部『革命史』，因為上面所說的許多原因，所以包含着無數的大大小小的錯誤，——簡直沒有辦法詳細的批駁，因為這樣一來，可以寫出一部比他的原書還要大的『大作』。我們這裏所指出來的，只是些例子罷了。而綜合起來，應當肯定說：這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史』。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范亢同志這篇批評文章雖是打擊了華崗同志在他的『大革命史』中所犯的嚴重

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提出了如何去研究『中國革命史』的中心問題，但是他對於中國革命史中階級關係的轉變問題，還缺乏清楚的了解，把許多重大的革命事變簡單的看做了是地主資產階級上層領袖們的變動，而不看到在某一時期，某一上層階級（如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有的羣衆基礎與他們所領導的運動的革命意義，因此他不能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問題，加以明確的解釋。

其次，范亢同志對於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教訓究竟在那裏，可惜沒有能夠在批評華崗同志的『大革命史』中指點出來。同時范亢同志也沒有能夠把中國共產黨過去陳獨秀瞿秋白時代機會主義的根本錯誤在那裏指出來。而這兩個基本問題的指出，在批評華崗同志的『大革命史』時是完全必要的。

編者 —— 五月二十五日 ——

最新
出版

論反對派

斯達
林著

□ 實 價 大 洋 一 圓 □

左派反對派，是革命中最狡猾的一個騙子，是反動統治的最乖巧的一隻走狗。他常使用「革命」的言詞來破壞革命的陣線，阻止實際行動的前進。他用些無處兌現的空頭支票來引誘革命放棄切合目前條件的鬥爭，好讓反革命勢力有時間有機會來把革命壓碎。他這些空頭支票，常是造得這樣的五花八門，這樣的「美觀」，以致許多辨別力欠精確欠堅強的人們常要受其誘惑。目前，中國革命正走到了尖銳的頂上，他也就在這裏大施騙術。「謹防小偷」，是目前中國革命隊伍中每一個戰士最需要留心的一件事。這一本書，論反對派，是從歷史上把反對派沿路所做的「把戲」逐一揭出，從各種具體問題上揭出其欺騙的「巧妙」手段和幫助敵人的真面目，使讀者懂得怎樣就可識透他的奸計。這裡，講到了革命性質的問題、力量問題、轉變問題、「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中國革命問題，內容異常豐富，言論異常警闢，欲要免受「小偷」的欺騙的革命戰士不可不讀。

革命與考次基

□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

這是烏里諾夫指出考茨基在批評蘇維埃這一問題上如何卑鄙，如何背叛革命的一本異常尖銳的小冊子，在揭發考茨基在這一問題上的叛徒性中，作者闡明了許多重要的基本的問題的精義，使讀者得到深刻的、正確的認識。這些問題是：什麼叫德謨克拉西？什麼叫專政？什麼蘇維埃是更高形式的德謨克拉西？立憲會議是什麼？為什麼要把它解散？使十月革命必然的要是社會主義的底條件是什麼（即革命轉變問題）？蘇維埃憲法中所剝奪的是什麼樣人的選舉權？為什麼要這樣做？什麼叫民主資產階級性革命？怎樣把它幹到底？……這些，都是目前革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此外如土地國有問題，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問題，革命轉變中的農民問題，國際主義問題等，在這一小冊子中都講到。這一本不滿一五〇面的小冊子，內容是如此豐富，解釋是如此精彩，它確能使前衛的戰士，在百忙中抽出幾個鐘頭就可獲得堅固而銳利的武器是目前每一個戰士不可不讀的「聖經」。

兩 大 名 著

一九一七年革命文選

列 甯 著
實價大洋一圓

這本書，搜集了關於那時俄國革命中各種具體問題的討論的文章，雖不能說搜羅無遺，但所有重要一點的，確都收集在裏面了。這些文章，大都對於目前中國革命中各種問題的了解與解決，很有幫助的，如政權問題、轉變問題、農民問題等等。

列 寧

斯達林 著
實價大洋八角

這書的內容，如書名所已指示的，是列寧主義的要點。列寧主義，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要有好幾本大書才能講清楚。但這一本小冊子——不滿三〇〇面，却把列寧主義的幾個主要的基點指給我們了。這裏所講的幾個問題是：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方法論；階級專政問題；農民問題；民族問題；戰術與策略；黨的問題；「不斷」革命的問題；一國中革命首先勝利的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第五卷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